

第三章 在土改舞台上的各色人物

他们曾经是土改时的民兵队长、工作队员、土改积极分子，或是旁观者、见证人、亲历者。

他们穿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迷瘴，揭示了“共和国”天空下那一段血红的真相。



当年，在忠县西山公园附小，有一个叫梁文华的年轻女教师，她的父亲梁树棻是忠县的绅士，县银行经理，也是有土地的地主。土改工作组和民兵们在斗打梁树棻追逼财物时，决定把梁文华也抓来斗。

十多个民兵前去执行任务。

但是，梁文华未能解押到斗争会场，她死于途中一个山坡上。

梁文华是当时忠县城里一大美女，见过她的人都赞叹她的美貌。那天晚上，美丽的梁姑娘落入那群如虎如狼的土改民兵之手（犹如“花姑娘”落入日本鬼子之手）。那十多个民兵将梁文华押到一个山坡上，将她轮奸致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听说，当年参与的民兵中还有一个人健在（那十多个土改民兵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惩罚），我们便决心找到他。经过了许多周折，我们终于同他见了面。

“我没有参与”

讲述人：李朝庚
土改时的民兵连长



土改的时候我当民兵连长，站哨、防空降特务、掌握（斗争）会场。斗争地主的时候把梁树棻弄来斗，要他的钱。其实那时他已经没得钱了，他虽然是银行经理，但是银行已经被共产党接管了。还是斗，他没法，就说钱在他女儿那里，于是就去抓他女儿……只有一晚上（他女儿）就莫得事了（就没命了）……是轮奸，不是20多个人，是10多个人，10多个人把她弄去，一晚上就莫得事（命）了……

问：李师傅，据有人说你也参与了（轮奸）的。

李朝庚：没有，我没有参与，我没有做那个事。人民政府成立了，缺人手，我进去做事，送信，每天挣六斤米。当时我是掌握会场，他们去抓人。人呢？没见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她死了。我是在事情出了之后去了解情况，事情出在官家院子，就是现在的污水处理厂后面那个山坡上。她躺在沙沟沟里，仰天躺的，身上有血，头发散在地上，根本不成人样了。……不过，衣服还是好好的……

叫她站她就得站，叫她躺倒她就得躺倒，否则她遭不住打。喊救命？她敢！喊了就要挨打……不准她翻身就要死，有种说法叫“过七不过八”，就是说七个人（轮奸她）还可以活，八个人就不行了。如果让她翻身起来走一下，只是人吃亏，不会丢命……我怎么懂这些事？我十一、二岁就上重庆，在栈房里男女的事听得多。



“男女的事我听得多”

用杠子压她肚子排污？那不是她，那是另外的事……梁文华我见过，相貌是很不错，那时她还没结婚……说哪个她就得哪个……过火了……当时找床席子就在那个坡上把她埋了。

受处分？那时有个啥子处分，只不过事没有办好不受信任了。

现在哪个看？说不清楚，龟儿毛泽东的事情说不清楚。那杂种，说不清楚……这个运动没把你打倒下个运动就把你打倒。同志之间自己整自己也扎实（“扎实”，忠县方言，意思是“厉害”），想不出的法子都想出来。三反五反时，你把我吊起来打，然后我又吊你，互相整。一个单位10个人，两个人在台子上互相打耳光，下面8个人参加批斗，其中有几个积极分子，要想往上爬、想升官就得积极整人。经过这么多运动，那些离休、退休的，没有被整过的稀少得很。现在说毛泽东好，那是嘴上说说，你不说他好脱不到手，怕一个运动来你跑不脱……

哪个看土改？过火了。我在县政府干事，送信，看到的、听到的多，还看到一些材料。城关镇里打（这儿指“杀”）的人多，打了几十个，张大柱（音）、孙达X（音）那些人都是在这儿打的。一般在河坝打，画个圈圈，人跪在里面。有的偏不跪，就强迫他跪。毛泽东要杀人，不杀人他坐不稳。土改也是这样，毛泽东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全部收了，地主没势力了，只有去讨口要饭，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毛泽东才坐得稳。

土改打人？是的，我见得多了，几句话不对头就开始打，一般用



“吃啞酒”



点“天灯”

棍子打。刑罚？刑罚就多了。就拿梁树棠家的亲戚方长辉（音）来说，方长辉是个40来岁的女人，破产地主。在黄金滩100多人的斗争会上，当众把她裤子脱光，用“火马草”（一种刺激皮肤、产生火辣辣灼痛的植物）再加上柑子刺在她下身来回拉。不过她没被弄死，后来还嫁了人。另一种刑罚就活不出来了。那叫“点天灯”——用黄泥巴在地主头顶上围一圈，中间倒上油，点“天灯”。我看见就这样把人整死的。还有“吃唾酒”——把两个大拇指用麻绳捆起，中间用木棍往下打，当场把指头整断了的都有。

我打过没有？没有，我没有打过人……干革命？啥子革命？！老子跟着跑一辈子，一分钱没得！现在饭都没得吃的！说打倒了地主富农过好日子，那是嘴上说。一个生产队，20多个公社社员，才一双胶鞋。我一没得饭吃就回想起当年那些事，过火了……梁文华那个妹子，样子长得可以……

采访时间：2006年9月22日

地点：忠县香山宾馆

采访后记

2006年5月，通过忠县周康杰先生，我们（我与朋友陈先生）找到了李朝庚的家。从那时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同他谈谈，但李朝庚心存戒备，一次又一次地拒绝。2006年9月，在周康杰先生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一番曲折，我们终于从大街上把他“拦截”到了我们下榻的旅馆。

采访是很艰难的，尤其是提到那位美丽少女的死。在我们直截了当的追问下，李朝庚要嘛矢口否认，要嘛顾左右而言他。

他究竟参与没有呢？与他有交往的周炳昌老人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当年李朝庚曾亲口对他说过，他参与了，几十年来他还多次梦到过那个女娃。周康杰告诉我们，他在河边曾问过李朝庚有没有这回事。李朝庚点点头，以一种很得意的心态说，他还很年轻时就搞过漂亮的地主小姐。

李朝庚的否认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其实，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追问他呢？当时和后来的几十年，没有任何人去追究那一群强奸犯的罪责。土改杀人劫财是毛泽东、共产党发动的一场“国家行为”，那些土改积极分子和民兵们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李朝庚有些不幸，他现在吃着“低保”，过着如他所说的“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日子。）

现在，已无法证实李朝庚到底参与没有，其实，这一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无辜的、如花似玉的鲜活生命，在那一个漆黑的夜晚，被宰杀在“土地改革”

的血腥祭坛上。我们希望历史不要忘记梁文华这个无辜的少女，不要忘记民族苦难史上的那一幕罪恶。这是我们坚持要找到李朝庚的主要原因。



梁文华遇难处——忠县长江边的关家院子——现污水处理厂

梁文华全家在土改中的遭遇：

父亲（枪毙）、母亲（整死）、祖父（整死）、外婆（饿死）、弟弟（失踪）、
妹妹（失踪）

补记：

采访李朝庚非常艰难，除了周康杰先生外，朋友陈先生为这次采访出力不少。

“贫下中农硬是发明家”

讲述人：周文谦
忠县城关镇人，80岁



我解放后的成分是贫民，那时我还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1951年正月十八，派出所把我抓来关起，那屋里就关有地主——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地主，反正是一些有钱人，什么朱光清等等。半天后把我解到公安局，就是朱耀庭的院子里，那里关了50多人，有张国锦、马剑秋、伯永梁，还有冉良臣的夫人朱惠卿等等，其中有一贯道十几个人。公安局的说我是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要审查。关了50天，等到把张国锦、马剑秋、伯永梁、朱惠卿等都枪毙后就把我放出来了，也不说我们有罪无罪，也不判个什么，抓抓放放很随便。

一贯道被枪毙了11个，有赵西千（音）、冯启全、高化东、石大军、赵洪儒、赵洪烈等，他们不是忠县人，都是外地人。张国锦的罪名是特务。

枪毙罗介仙我亲眼见的，枪毙另外的人时我已经被关起了。我父亲说，枪毙一贯道时还点名要他去控诉发言。父亲还说，枪毙伯永梁那一批，只有伯永梁胆子最小，吓得打抖，马剑秋就胆子大，还说他曾经为共产党做了什么什么，包庇（掩护）过地下党员李镇宇。张国锦则大声说：“我不是特务，我是125师留下来的……”

我放出来后摆了一个烟摊为生。我有文化，会写字，居委会——那时叫“段”，找我帮他们抄写一些东西，我表现很积极。

1952年找一些积极分子下乡征粮，我又去干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填一些证和表格。当时正是土改时期，耳闻目睹了一些事。

田地怎么分？先分成上中下三等，插上标，按人口分，大人该多少，小孩该多少，该分多少好田地、多少不好的田地，我负责填证。

城里的贫民怎么分胜利果实？分房屋分财产啊，不是农村的财产，是在城里的这点财产。像秦月浦啊，梁伯仙啊，梁树棻啊，吴泽山啊，财产都被分了，什么罗汉椅子啊，床铺啊，箱柜啊，都拿来分，房子也拿来分。工商兼地主就是把

属于地主的那一部分财产拿来分，属于工商联的财产一点不动——暂时不动，到公私合营时再来整。如果是地主兼工商联，所有财产就全部分了。

土改搞得惨啦，不光是我说，你现在问那些老人，哪个不晓得嘛。当时农会的人来要地主，城关镇都积极支持。只要弄到乡下去就没得轻松了的，那些刑罚没得松活的。

斗争地主熊实之我是亲眼见的。熊实之这个人长得比较胖，喜欢说点趣话。斗他的人把一个粪桶挂在他颈子上，里面装上大半桶粪，叫他跪倒，头俯在粪桶上闻臭。熊实之这个时候还要说趣话，他说：“闻一会就行了嘛，不要老搞。”

一些农民们对他有好感，恨不起来。斗争会上有工作组的干部掌握会场，他们专门看哪些人斗地主不积极，不积极的记下来，积极的也记下来。他们看见群众不积极，就吼叫着说：“你们阶级觉悟不高呀！地主剥削压迫你们……”等等。

运动一直没歇气，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改、三反……一直没歇气，共产党夺了政权，要使出各种手段保他的权，你不服从我就要杀，要你死，农民们还是怕。虽然一般农民没得生命之忧，但是你得了他（党）的好处，得了土地，你就要听他（党）的话。你要不听他的话，一样是反革命。

会场上，被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上去打熊实之的耳光。这还不够，当时正是六月火烧般的大热天，给他穿上皮衫子再拿棉絮来裹起，放到太阳底下晒，还在周围烧杠炭火烤，那哪个不死嘛，捂也要捂死。熊实之大汗淋漓，出不了气，活活憋死了。

秦月浦是大地主，忠县的公永（音）茶楼、鸿宾旅馆是他开的，他儿子是征收局长秦思明——我父亲的学生。秦月浦被弄到乡里去斗争，除了打以外，还不准吃饭。又挨饿又挨打，他实在受不了，就在关他的柴屋里吊死了。其实他在忠县城里算得上是一个著名的开明绅士。

斗争秦桂云（音）我也是亲眼见到的。她是秦汉山的女儿，女中毕业在忠师当老师。秦桂云被四肢分开，吊在一个大八仙桌的桌底，四肢绑在桌子的四角，背又不能挨地，就像农村滤豆花。哎呀，好造孽哟。想不出来的法子贫下中农都想得出来。秦桂云的丈夫饶顺照是地下党员、忠师校长，也照样斗，地下党员还要支持斗打才行。秦桂云吊得受不了，就说，房子、家具拿去分就是，当时叫“分胜利果实”。

听说过的刑罚就多得很多了，比如把女的弄来斗争，把裤脚扎紧后往裤裆里放进黄鳝、癞蛤蟆等等，唉呀，难得过日子呀，男人都受不了。还有“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了强迫地主去抱，那个都抱得？不烧个皮开肉烂？！不

去？不去就烙你！

.....

我虽然读书不多，还是读过《酷吏传》，小说也看了不少，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多刑罚。对了，“抱火柱头”在《聊斋》里见过，书中描写的阴间地狱里的刑罚很多，习方平就受过这种刑。不过，比起来都不如土改，土改时，贫下中农硬是发明家，任何折磨人的东西都想得出来。

当时没有斗争死的后来也苦死了，像蔡捷三呀、熊德国呀、州屏山的陶中华呀，等等。

采访时间：2006年5月5日

地点：忠县百姓厨房酒

采访后记

周文谦老人是在酒席上即兴说到土改的，他讲述得很零碎，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土改时，周文谦先生是贫民成分，按当时的政策是属于无产阶级，他在土改中一度还是积极分子，参加了分果实的运动，但是，说到当时的种种刑罚，他突然说：贫下中农硬是发明家！

是谁让“贫下中农”一夜间突然成了“发明家”？而那些创造发明的刑罚可能让历史上任何一个酷吏为之逊色。

周文谦老人说：只有《聊斋》里描述的地狱才有那些刑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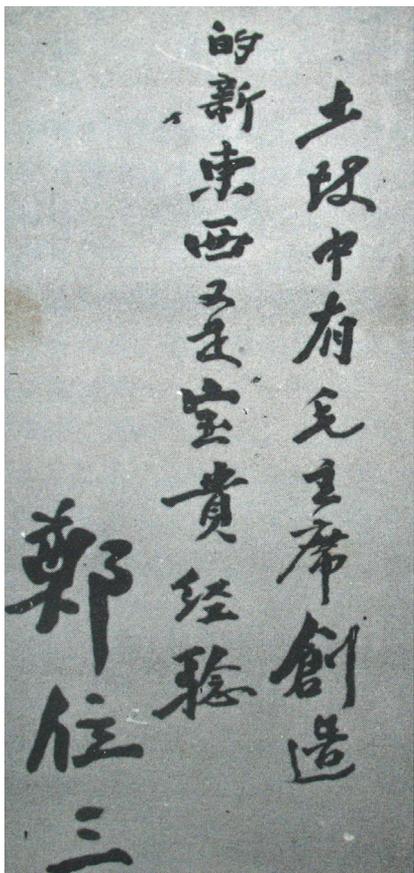
事实上，在“土改伟大胜利”的时代，那些恐怖的刑罚已经是《聊斋》里地狱的情境。

补记：周文谦老人已去世，具体时间不详。

中共官员的题词：

“土改中有毛主席创造的新东西又是宝贵经验。”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我曾经是个傻子、疯子……

讲述人：**张先痴**

土改工作队队员

1934年生



我出身在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48年我刚满十四岁就参加了进步的武汉学生联合剧团，剧团里教唱的歌曲解放后我才知道都是共产党的歌曲。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我作为未成年人随父母来到重庆，在江北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我是学运的积极分子，我参加罢课，宣言都是我起草。在学校里我邀约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号角”文艺社，我任社长，胡俊德（长寿县渡舟乡人）任文字编辑，项廷柱（湖南人）任美术编辑，在我们不定期编出的墙报上，不论文字和漫画都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朽现象尽情嘲讽。比如，项廷柱画了一幅漫画“青天白日满地红”，画面上天空一片漆黑，一个小小的白太阳，地上满是杀害的进步人士的鲜血。校长拿我很头痛，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他不便处理。后来我进入黄埔军校24期，那时，24期的总队长早已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49年12月20日，我们在大邑县苏场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随营学校。

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什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象共产党说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什么：“正月是新年哪，干（穷人）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50年代在部队时的张先彪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什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同样的名字。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象。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

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人，这种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刺，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了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象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象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分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象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象，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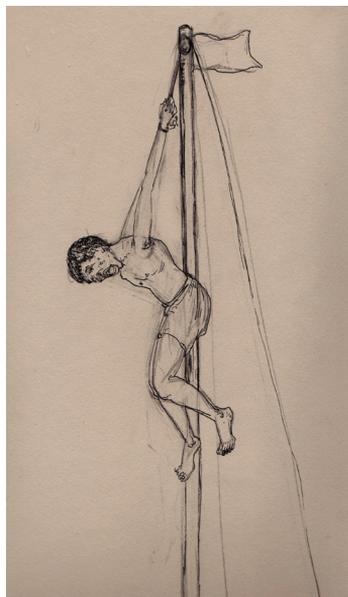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

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什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什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着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

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的事。还有很多地主看到自己省吃俭用，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望蒋台”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一统天下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我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出身的人，我看到那些地主比我家当年的佣人生活都差得多。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

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着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



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农民喜领“土地证”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 1953 年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着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什么政府？！叫什么政权？！叫什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象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采访时间：2007年2月4日
地 点：成都双林中横路

采访后记

2006年8月，从朋友处得到一份30多万字的打印稿《格拉古轶事》，展开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在我所读到的记述右派遭遇的文字中，《格拉古轶事》无论是

经历的曲折惨烈、思想的独到深刻、情感的回肠荡气、文字的生动活泼诸方面，都堪称一流。

作者张先痴，1957年被打成极右，抓捕入狱，他在书中写道：“从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开始当犯人到雷马屏农场结束，我先后蹲过的看守所、劳教和劳改厂矿企业农场等总计11个，时间共计22年另7个月加13天，它几乎占用了我全部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背叛家庭，为追求光明而全身心投向共党革命的人在狱中耗尽了“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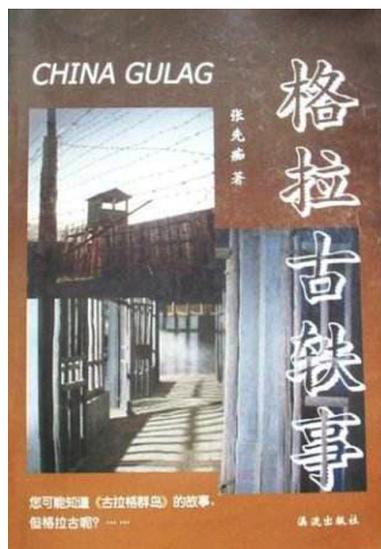
我当即给他打电话，表示希望拜访他。老人欣然同意。

半年后我到成都，两次登门与张先生长谈。老人虽然在狱中20多年，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但依然腰身直挺，声音硬朗，言辞直率，不仅颇有军人的气度，而且不乏知识分子的良知。更难得的是他毫不隐讳地谈起自己在土改中的所作所为，并为此充满了忏悔之情。

我在这样的老人面前脱帽致敬。

《格拉古轶事》即将在美国出版，这是张先痴老人几十年血泪经历的凝结，更是他对那段历史的珍贵贡献。

如此，真心地为张先生祝福。



川东忠县土地房产所有证

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证”之规定，本户农家（本人）所有土地共计……转让赠予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1952年）

土改时，我曾写过杀人布告

讲述人：曾真

忠县石宝寨中心乡土改工作队政治干事

1933年生



我进入土改工作队是因为我有文化，我毕业于忠县师范，土改时我18岁，在工作队里搞统计和文字工作，也起草杀人的布告。同一个队的还有谢宝桃（音）、王运生（音），都是年轻人，我是政治干事，此外还有财务干事、总务干事等。

石宝寨（长江上的一个著名景点）与万县相邻，同属于川东地区。当时在川东负责土改工作的是阎红彦（川西是李井泉，川北是胡耀邦，川南是李大章）。万县要搞得早一点，1950年肃反、杀人、土改一起上，忠县晚一步，人杀得没有万县多。我们先是搞征粮剿匪，主要是征粮，没得匪剿，还发了长枪，那个枪重得很，象是汉阳造。

忠县的土改在1951年的秋收时开始，主要是搞地主的财产，什么都要，有好多拿好多，搜刮干净为原则，反正把他们整光、整穷。我记得当时整得地主衣服都没得穿的，赶场只得披件蓑衣出门。

吊、打地主主要是为了逼财，杀得并不多，中心乡杀了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叫江远璋，说他是恶霸地主，另一个叫胡德武（音）。

我后来在区上搞统计，各个乡汇报上来，有多少金银、死了多少人，我作记录，然后向县上汇报。我记不得具体数字了，只记得石宝寨自杀的多，投井、上

吊……那个12层的石宝寨寨楼每一层都吊死过人。

为啥自杀？怕呀，挨整不过呀。中心乡有个叫王朝忠（音）的人，这个人是农村的二流子，或者叫“流氓无产阶级”吧，他最喜欢打人，成了土改



石宝寨旧景（1909年）选自《老忠州》陈储德主编

积极分子。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他把一个地主婆反吊起来，拉到屋梁上，一松绳放下来，又拉上去，又放，还打，黑起心整。我看不下去，扭头走了。

有一种整人的办法是这样：先把人打伤，再用竹凉棍（细竹棍编成的竹床）和谷草把人裹起来，用绳索捆紧，晚上放到外面，淋上水，寒冬腊月，你活得出来？第二天人已经冻得硬邦邦的。曾朝如（音）的儿子曾庭玉（音）就是这样被整死的。

整女的还有另一种方法。把碎瓦块、碗渣滓和刺铺在地上，把女人的衣服裤子脱光，睡在上面打。你痛？翻滚？怎么滚？到处是刺！活生生把人整死。我们那儿有个叫曾长天（音）的，他当过乡长，他的女人（妻子）就是这样被打死的。

我家那儿，大家都姓曾，乡里乡亲，但土改要“翻身”，要“分胜利果实”，管他姓不姓曾啰，整！整死的人多得很。曾朝轩哥哥的儿子叫曾庭定，还是个十多岁的娃娃，说他偷了别人的包谷，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由他分辨，活活把他打死了！

我见的杀人最多的是1951年2月，在石宝寨对面那个河坝开公审大会。那个地方夏天被水淹，是个水沱，冬天水退后就是一个坝子。那次一共枪毙了30多个人，有地主，也有国民政府的区长、乡长、保长。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父亲马玉芝当过县长，但他1950年春乘船到石宝寨赶场时翻船淹死了，否则他肯定跑不脱。我为什么清楚地记得是30多个人，因为那时杀人要贴布告，一人一张，



青年时的曾真

30多人就是30多张，而我正是写布告的人。写些啥内容？某人，出身，解放前有啥罪行，解放后做了些啥。罪行？罪行随便罗列几条就是。什么“一贯欺压群众”、“霸占土地”、“抢占民妻”等等，抗粮不交也是杀人的理由。杀保长的理由是他们派过款、拉过壮丁。其实这冤得很，拉壮丁是为了抗日、派款还不是为了支援抗日。国民党抗日有错哟？最后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然后打个红勾勾。

我记不起30多人的名字了，记得的有吴持恒，他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把他家的财产弄干净之后杀的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郑必夏。他是川东地下党的，当时有人说他是国民党，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干脆就把他当国民党杀了。刑场上他使劲吼：“共产党万岁！”民兵们上去打他，不准他喊。二十多年后，终



于弄清楚了，他真是共产党！怎么弄清的？说来是个偶然。郑的家当年已经被抄得一干二净，像水洗过，但是，有一张大床没有被搬走，因为它太大了。那是张六柱床——就是有六根柱头的床。那张床有踏板、两边还有柜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人想把床拿去卖，床太大，只得拆散了搬出去，在拆除时，从床栏里掉出一张纸。是啥子哟？读后才知道，原来郑必夏是真正的共产党。一层层汇报上去，哟，杀错了。这才正式给他平了反。有啥用？人都死了二十多年了，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那次杀人我就在现场，一人画一个圈圈，人跪在圈里，后面枪对准脑壳。枪响之后人倒了一坝，江风吹来那个血腥味浓得很。对了，有一个人第一枪没被打中，子弹从他耳边划过，他还扭过头对打他的人说：“你对准了打。”

有些人没人去收尸，农民不敢去，怕别人说是同情地主，脱不到手。于是晚上就发生了割死人的事——有人去把死者的心脏、肝脏、睾丸等器官割下来。割去干啥？我没看见，反正是拿去喂狗——两只脚的狗！

人吃不得？三年“自然灾害”就有人吃人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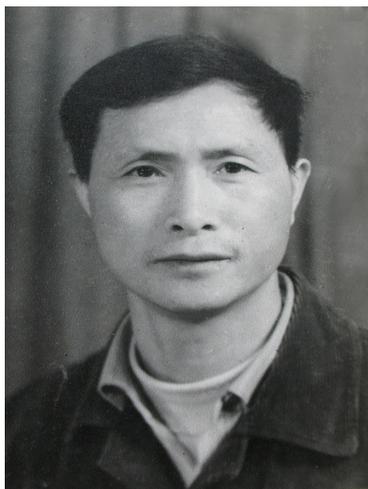
区委里有个当兵的，姓毛，毛泽东的毛，毛什么记不起了，这个人毛森森的，他去割死人的睾丸。人死之后睾丸看不见，缩进去了。他踩死人的肚子，把睾丸挤出来，割下，切成片，贴在腿上。民间有种说法，把睾丸切成片，用人的体温烤干，磨成粉吃，可以治阳痿。

当时杀人权在区上，由区法庭判决死刑，但区长、区委书记是南下来的干部，对当地情况不了解，乡里面要杀哪些人全凭一个姓秦的公安员（他是当地人）整材料，他整出的材料认为该杀谁就杀谁。那个人二冲二冲的（方言，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

我读了点书，认得字，去帮共产党写杀人布告，相当于帮了共产党杀人。杀人那个过程，少了张布告怎么行呢？我这一生，就是土改这桩罪恶，所以我后来该去劳改。

我为啥劳改？1957年，我已经对这个社会有了相当的认识，我同一个大学生的通信，谈了我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党的一些看法。那个大学生当了右派，把我供出来，抄我的家（当时我已经在重庆长安厂工作），搜出八个笔记本和300多封信，以我信和笔记本中所记的话作为罪状，说我是反革命，妄想资本主义复辟，以此判了我12年徒刑。

土改时需要用我，反右时需要整我，管你那



中年的曾真

么多，刘少奇、彭德怀还为共产党打天下，要整就整，我算什么？

我1958年初开始服刑，1981年才回来，共23年，为什么这么长？因为刑满后他们不准我走，继续在煤矿干活。那个煤矿位于宜宾南面的珙县，叫芙蓉煤矿，里面干活的全是犯人。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监狱怎么怎么坏，有没有人来写共产党的监狱？那里面坏得很，可以活生生整死人，整死了就整死了。他上报，说你畏罪自杀。哪个来证明不是？！哪个来揭露是他整死的？！

我下矿15年，挨斗挨打是经常的事，我还坐过3个月的水牢。那些年九死一生，里面的事可以写出一本书来。

我爸爸就死在劳改队，他的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他先在奉节县劳改，炼硫磺，后来转到永川新生茶场（劳改农场），1960年2月饿死在那儿。我一直不知道父亲的情况，1981年我出狱后向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发了上百封信，只有东北回了信，说名字相同，但不是我父亲。最后查到，原来父亲就死在永川新生茶场。

我们那个煤矿死人多得很，仅在自然灾害——什么“自然灾害”？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害死了几千万人——矿上最保守的数字是饿死了380多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死了人要做个匣匣（即几块木板拼成的薄棺材），就用井下的木头，叫附近的农民做。农民共做了380多个，全部用完了的。

死人埋得很浅，因为埋的人没得力气，挖点土掩上就完事。埋的人可以吃一点稀饭。埋一个人挖了土旁边就有一个槽槽，又死了人就放在槽槽里，旁边再挖土，又留下槽槽，又埋，一个一个埋下去，都埋得浅，好多尸体都被狗掏出来吃了。后来在那块地上种南瓜，嘿，那个南瓜才叫长得好，又多又大。但是不好吃，水垮垮的，不象其它南瓜又甜又面（面：方言，指口感很好）。

现在听到有人说毛泽东好我就来气：这几年吃了点饱饭就忘了？忘了饿死几千万人了？！他要不死，再来一次、二次“文化大革命”，早就把你整死了！

再回到土改上说，说个实话，土改那些作法就是土匪抢劫，只不过口号喊得响：“你为什么穷？是因为地主剥削压迫。走！去整地主，挖他的财！分他的地，翻身得解放！”

哪个农民翻了身的嘛？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欺骗，他说话不算数的。我记得很清楚，土改还没结束，还没有到复查阶段，就开始办合作干部训练班，当时简称“合干班”，就准备要搞合作社了。我调到万县地委，就是去参加准备收回土地的合作干部训练班。分土地那是假的呀，骗农民的，是为了把农民发动起来帮共产党打江山、夺政权。农民为了得土地，为共产党打天下，命都不顾，结果哪个得了土地？

同样的，说把资本家打倒，工人当家作主。哪个工人当了家作了主？共产党说地主是剥削阶级，要消灭，把农村的地主消灭了；城市里做生意的、开工厂的，是资本家，也消灭了。那么财富到哪去了？到那些权贵们手中去了！那些人大把大把地把国家的钱捞到包包里，他们既不叫地主，也不叫资本家，但他们财富多得惊人！不是几百万、几千万，而是几亿、几十亿、上百亿，据说，那些最有权势的家族，已经是上千亿了！

将来不清算呀？就这样算了？恐怕不可能吧。

刚解放时，石宝寨有个干部，他一个儿子加入了国民党，一个儿子加入了共产党，国民党说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党说国民党是蒋匪，共产党亲苏（联），国民党亲美（国），他据此写了个对子：蒋匪共匪谁是匪，亲美亲苏孰亲民？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谁是匪？

采访时间：2007年3月20日、2007年7月3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重庆市江北区长安厂宿舍

采访后记

偶然与曾真老人相识，提到过去的事，老人说，他有很多亲身经历。

第一次采访很不顺利，老人突然身体不适，折腾大半天下来，只拍了几张照片。

第二次来到老人的家已经是几个月后。

老人孤身一人住在一套陈旧而狭窄的房子里，他这辈子没有成家，漫长的牢狱之灾后，老人已年近半百，从此他与书法字画为伴，独自度过孤单的“自由时光”。

采访时，老人拿出了当年（1958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他12年徒刑的判决书，那上面的“罪行”全是他私人信件和笔记本上的言论，其中有“横加污蔑我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沉浸在苦难中，蒙受着精神奴役，自由民主平等遭到



土改尚在进行的1952年，中共已经开始了收回土地的工作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1953年

不幸。’”和“将我劳动教养条例污蔑为‘打人的鞭子，到处打人’”等等。

老人说，这的确是他当年的看法。看来，早在50年前，老人对这个社会、这个政党就颇有认识了。

只是，他为这种认识付出的代价太惨重。

1981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一个鲜红的印章表明，那23年是整错了。（该判决书写道：“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应予纠正，特依法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58）刑字375号刑事判决书。二，对曾真宣告无罪。”

中共国营长安机器厂委员会给他的改正结论上写道：“按照中央（79）65号和川委发（79）98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应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职安排工作……其工资不补发。”

整了就整了，整错了就算了，一个人的青春、20多年的自由、一辈子的苦难，在暴虐的专政机器面前实在是轻如鸿毛。

曾老人自嘲地说：“我土改时帮共产党写了杀人布告，所以后来该去劳改。”不管怎样，曾老人活出来了，虽然孤身一人，但总比他死在狱中的父亲幸运。



老年的曾真



1951年9月9日，在土改仅仅进行了大半年时，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由毛泽东主持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中共年年召开这种会议，紧锣密鼓地收回了土地。

羊角古镇： 地主杀了，环境毁了

讲述人：李世芬
78岁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 1030 公里。2005 年春，我走访了沿江的几个古镇，采访到了一点即将被江水或岁月淹没的“历史刻痕”。

羊角与龚滩、新滩、潮砥是乌江下游的四大断航险滩。有险滩便有古镇，有古镇便有古迹。然而，走了一回下来，两条凹陷的青石板，几乎是这个著名古镇的全部遗迹。

从峡谷口的公路下去，迎面是一座破落的小桥。站在桥上，面前是狰狞滩石、滔滔江水，两边是曲折的石板小路和沿街而建的平房。

羊角镇曾是一个热闹的大镇，由于江边石多水急，滩长数里，货船不得不在此易船通行，羊角镇因此繁荣起来。但现在，老街冷冷清清不见人踪。顺着石板街走去，一间破旧的木板房前，卧着一只慵懒的花猫。花猫“咪呜”一声，惊动了老婆婆。看到陌生面孔，她稍稍有些意外，但有人来同她说话，婆婆十分高兴，主动提出要陪我走走。她说：“难得有人下来看看，造孽哦。当初这里也是个繁华的地方，今天落到这个样子也没人晓得。”

婆婆名叫李世芬，今年已经78岁。她家百余年的木板房如今也是老街上唯一的一间了。李婆婆说，当年羊角镇兴旺得很，每天都有好几条船从这儿过，一条空船拉过滩要两个多小时，货在这儿上岸，用人拉车在岸上拉过滩，这两条青石板就是铺来拉车的。

我问镇上还有没有以前留下来的文化遗址，李婆婆摇摇头：“没得了，没得了。你刚才过来的那座石桥，原来很好看，雕得有龙凤，活灵活现的，可惜在文革时把它打烂了。”

问起地主的情况，李婆婆说，羊角镇主要是下力人聚集的地方，大家都穷，日子都苦，一天搬几条船的工钱也不过刚刚够买斤把米，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

解放后（1950年）要抓地主，打“剥削阶级”，于是就从矮子群中找高子，抓了几个“地主”。

“其实那几个地主日子过得也苦，”李婆婆说。“地主也不一定有田地，也不一定有好多钱，他们同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不下苦力有口饭吃，跟我们搬滩的比起来就算是地主了，日子还不是紧巴巴的，比现在一般人都穷。比如，有一个叫李本芬的人，一辈子靠拣（拾）狗粪攒了点钱，置了几亩地，也把他划成地主，幸好他在解放前一年淹死了，没遭枪毙。只是地主成份让他后人遭了罪。”

“羊角镇有没有被枪毙的地主？”我问。

“有哇，我记得名字的有三个：曹尽成、张尽如、高占田（由于李婆婆不识字，名字只记下了发音），都是抓到下面河滩上去打的。我还记得曹尽成的儿子在解放前写信回来，叫他爸爸不要聚财，把家产分给穷人。他儿子现在还在。”

说起那段红红火火的日子，李婆婆思绪清晰，精神亢奋。她说：“那时，上面组织我们开大会，唱腰鼓歌，我还记得唱词：

一想朱司令，领导闹革命。二想刘伯承，他是四川人。

三想毛泽东，他是大英雄，全国成了功，人人有田种。

四想解放军，人人把粮征，征粮为我们，解放台湾省……

还有：

本场有个王保长，做起事来像狗狼……”

不过，提到现在的日子，李婆婆黯然神伤，一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失了业，二是羊角古镇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

在石板街靠近河滩处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个古老的水井，上刻“清泉井”三个字。井边有个石刻神龛，右边镌刻着“宣统三年秋月立”几个小字，还有一副石刻对联：“井水同三官谨备，泉源养万民全生。”神龛里供奉的菩萨早已不知所终，李婆婆说，以前每月初一来井里挑水前，都要恭恭敬敬地给菩萨上香，以保甘甜的清泉不断。

我想掬一把清泉尝尝，李婆婆大惊：“喝不得！喝不得！”



古镇上惟有当年盐车的石板路还残存

原来，这“清泉”已经有毒了！

在“清泉井”上方，有一个磷肥厂，它日日夜夜向着古镇、向着乌江倾吐着它的威力，在它经过的路上，寸草不生。李婆婆说，连百把年的石头都受不了，老街下面原来还有几十级梯坎的，都叫污水废气腐蚀垮了。

采访时，不时有粉尘飘飘扬扬洒下，眯着眼抬头望去，一个气势不凡的水泥厂威然耸立在古镇右上方，巨大的烟囱正滚滚滔滔向天空倾吐着满肚子的浓烟。风从峡谷口吹来，浓烟遮天蔽日，映衬着乌江峭陡的峡壁，颇有悲壮的气势，真是古镇一道现代风景。

“井水不能吃了还能换自来水，但空气怎么换？每天都闻着呛人的味道，肯定要少活好几年。现在老街上年轻人全都搬走了，只剩几户老年人……向上面反映？反映有什么用，要挣钱呐。还有，工作不好找，全镇的人都指望着进厂打工挣点钱呢，哪个敢叫政府把厂停了治理？”

采访时，正是4月“春半”时节，河滩上和河对岸，油菜花在春风中轻摇，但空中没有清香和清新。只有江水，依依还有几分旧时模样。它翻滚过滩，哗哗诉说着人们不愿听的语言，冲洗尽被杀掉的地主们的血迹，忍受着倾泄给它的毒水和烟尘，伴着颓败古镇和古镇里仍在坚守的几户寂寞人家。



在烟尘笼罩下的李婆婆



1950年，在羊角碛河滩上，张尽如、高占田、曹尽成三个地主血染乌江。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2日
地点：重庆市武隆县羊角镇

淇滩古镇，“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讲述人：崔照丰
72岁



网上（2004年8月）说：贵州沿河县淇滩镇发现一个保存完整风格独特的四合院建筑群，这一建筑群最早修建于清代道光年间。

网上没说，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清代闺女，刚出闺房就面对她的葬礼——两公里外的沙沱电站将把她深深埋葬。

汽车驶过横跨乌江的一座大桥，拐上一条破烂不堪的沿江土路。刚下了一场大雨，车在坑坑洼洼中蹦跳，把污泥和浊水溅向雨后江边清新的天空。

插入一条更窄更烂的小路，斜刺下去，远远便见一群层叠的老宅。



即将被淹没的淇滩古镇

它依山临水，静静躺卧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中，陈旧的黑青色房屋，杂乱的木石街巷，展示出它的古老与破败。来前曾读到介绍，说淇滩保存了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无论从建筑风格、建筑工艺，还是实用功能来看，淇滩集乌江土家族文化特有的精华，成为千里“乌江画廊”上独特的风景。还有，淇滩自古就是沿河南部片区以及毗邻县的水陆交通要道和货物商运的集散地，有“江面上船只如梭，商贾集市繁荣”之说。

一位叫崔照丰的72岁老人，指着一条冷寂的通往河滩的石板路说：“当年，这儿热闹得很，是方圆百里著名的水码头，盐巴、桐油、集市、商贸，兴旺得很……”

既然是商贸集散地，水运大码头，便一定要生出些富裕人家；生出了富裕人家，便一定要修高宅大院；修起高宅大院，便要请匠人雕刻些文化艺术。在千年古镇里，一座富家古宅，便是一段历史，一件建筑艺术。

崔照丰老人为我指点四座古宅。



张布月旧宅



王永涛旧宅

杨光宝的旧居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百年风雨如晦，新、旧社会沧桑，它竟然还保存完好，尤其是木窗上的雕刻，倒悬的蝙蝠，盛开的花果，一个个生动而完整。张布月（音）的旧宅也是如此，虽朱颜已改，但雕梁画栋犹在。

崔老人说，古宅中最有气势的是肖达辉（音）家，雕刻得最好的是王永涛（音）家。可惜，这两家大门紧闭，主人不在，未能进门一睹芳容。

其实，现在这几家大院的住户早已不是房子的主人。杨、张、王、肖都是地主，1951年初的一天，杨光宝、肖达辉两人，被押到淇滩河坝上，枪声响后，杨、肖二人魂断乌江，从此再没回到他们祖传的大院；王永涛要幸运一些，没有死在淇滩河坝，他被抓进大牢，后来死在狱中。最幸运的是张布月，崔照丰老人说，她是个女人，土改时还很年轻，“剥削”不大，农会于是贵手高抬，张布月于是弃宅飞奔，后来在贵阳城里去世，算是善终。

几个地主的古宅大院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户，但不久又被收回作为“国家财产”。张家成了食品站，肖家成了税务所，王家做了银行，杨家作为收购站。

近年来，某些单位（企业）效益不好，于是，散伙卖房（这次不是无偿的



肖达辉旧宅



杨光宝旧宅

分“果实”了），古院老宅又被“国家”作为自己的财产卖给了私人（如张家大院）……

如今好了，

下游几公里处要修100万千瓦的水电站，到时大水一来，一了百了。

地主们早已被“政府”杀光灭光了，院宅群是被“国家”分光卖光了，历史的记忆，河滩的血斑，连同大量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起水葬——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徐志摩诗句）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0日

地点：贵州省沿河县淇滩镇



这是淇滩古镇后面山坡上一座古墓的雕刻，他们的下面，便是肖达辉、杨光宝两地主被枪杀的河滩。



河滩

那时杀人十分随便

讲述人：谭竞平

1950年万县专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
1918年生



我是万县高粱乡人，到成都读书时，刚好遇上“一二·九”运动，那时我满腔爱国激情，“九一八”事变对我们这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年轻人刺激很大。我立马投身革命，并在1938年1月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没跟随国民党？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它专横腐败。

我担任了川康特委的联络员，跑川西十几个县，干送党的文件，收集情报等工作。邛崃县的党组织散了之后是我去清理的，后来我担任了邛崃县的县委书记。没多久我暴露了，要抓我，我跑到仁寿县，那时仁寿、彭山、华阳三县成立了一个特区，我担任特区书记，组织了一支700多人的游击队，有300多条枪，搞武装斗争。但敌强我弱，打不赢，我准备撤到邛崃山区，省委没同意，把我调回成都。这时我被国民党通缉，省委又把我派回万县，给我的任务是做统一战线和收集敌特情报工作。

我们谭家是个大家族，出了很多能人，其中我的堂兄谭显炽就非常能干。当时他在万县很有名气，是一个有钱又有地位的企业家，我到他开的永运钱庄去任职，通过他的关系结交了不少达官贵人，也因此收集到很多敌特情报。说来好笑，我结婚时的证婚人就是一个特务头子——国民党万梁警备司令部缉查组的组长唐伯均（音）。

万县解放时，我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军事代表、接管研究领导小组组长，参加接管万县。后来我负责财经方面的工作，成立了万县人民银行，担任了川东畜产公司经理。

土改时我没有下乡，但我知道搞得很血腥。那时把杀人权下放到区上，没有法院，也没有什么逮捕、审判，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生死。杀人没有标准，说谁是恶霸地主，不调查、不核实，抓来就杀。有钱的，杀；得罪过农民的，杀；当过乡长、保长的，杀……我们高粱乡我知道的杀了地主谭迅如和谭尧

父子俩。另外我的姑爷冯宗山（音）自杀了。冯宗山只有20多亩田土，一个小地主，斗他，他害怕，投堰塘死了。我们谭氏家族里戴地主帽子的就多了，当时没被杀的后来日子都过得很惨，他们被赶出来住在烂棚棚里，很多人都在六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里饿死了，比如同我一辈的谭显碧。谭显碧其实很冤，她是万县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我二伯的女儿。解放前两年她同贺家的贺启坤（音）结了婚。贺家是地主，土改时把她也划成地主。贺启坤被抓进监狱，后来死在劳改队。土改虽然没杀她，但后来那个悲惨……我去看过，她住在一个茅草棚棚里，一张破床，上面睡她，下面睡猪。唉，受了好多折磨，真的是非人的生活。1961年大饥荒时，她饿死了，她死时才30多岁。

我那个堂兄谭显焜也没跑脱，他本来属于民主人士，又掩护过地下党，解放后担任了资讯委员会委员，资讯委员会是政协的前身。但“三反”运动时把他判了两年徒刑，后来又开除了他的公职，他生活没着落，大饥荒结束后一年多他就死了。他是个很能干的企业家，20多岁办企业就很有名气。

我见到杀人最多的是与土改同步的“清匪反霸”运动，也就是“镇压反革命”。万县专区杀了几千人，开县一个区就枪毙了100多，奉节县杀得也多。1951年有一天我亲眼见到，就在下面河坝上，一口气枪毙了30多人，其中还有一个17、8岁的姑娘，她姓王，说她是一贯道成员（一贯道当时被定为是反动帮会组织）。资讯委员会的人因此提意见，说还是应当刀下留人，不该把十几岁的妹子都杀了。

那时不象现在，还有个审判，那时捉来说杀就杀，完全乱搞，所以，错杀的不少。我们单位的刘志齐（音）就不该杀，他没什么罪恶，无非是解放前耍了几个女人。当时我不在，等我开会回来，人已经枪毙了……其他不说了，就连我们地下党的人也错杀，陈太侯就是那时冤死的。

你知道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吧？陈太侯就是同彭咏梧一块打仗的。1947年底，彭咏梧、江姐等在奉节县组建了川东游击队奉大巫支队，“奉”指奉节，“大”指大宁，即现在的巫溪，“巫”指巫山。彭咏梧任支队政委，陈太侯任支队司令员，蒋仁风任参谋长。1948年1月，他们从奉节的竹园镇走到与巫溪交界的鞍子山，在一个叫十王殿的小庙吃饭，饭后敌人追上来，彭咏梧在突围时，为救他的警卫员中弹牺牲了。陈太侯则逃脱了。解放后陈太侯在奉节县公安局二科搞侦查工作。1951年镇反时说通土匪，不由申辩，抓起来就枪毙了。他的冤案直到1985年才平反，给他恢复了党籍。有啥用？人都杀了几十年了！

还有梁平县的雷夏殿（音），他是1927年的老党员，镇反时也被枪毙了。后来他在成都工作的女儿还来找我了解他爸爸的情况。云阳县的姚达九（音）虽没被枪毙，但被抓去陪杀场，又劳改好多年。有一个整得最惨，他是巫溪的廖迪生（音）。地下党派他打入国民党，他在国民党里当了县参议长。他利用他的权

力，出钱又出力，救了不少共产党人，比如前面说到的奉大巫支队的参谋长蒋仁风就是他救的。在彭咏梧牺牲的那场战斗中，蒋仁风被俘了。廖迪生设法把他弄到巫溪来审理。蒋仁风说他不是共产党，是个草药先生，上山采药时被游击队强迫留下来为他们治病。廖迪生借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把蒋仁风放了。

解放后廖迪生担任了百货公司和粮食公司经理，镇反时说他是混入党内的敌特分子，判他15年徒刑，押到新疆去劳改。刑满时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上上下下没人管他，他只得继续在牢里呆着，一直到华国锋当公安部长释放国民党县团级干部时，才把他当作国民党县团级干部释放出狱。他出狱后，家早已没有了，妻离子散，一个侄儿收养了他，没几年他就死了。后来给他落实政策，定了一个“17级干部”。

你也听说过我的事了，“三反”运动时我就被掀下来，后来又当右派，挨整几十年。为啥？这也是党内搞宗派。当时万县掌权的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他们文化不高，业务不熟悉，对地方情况不了解，但他们有权。他们排斥地下党的干部，借一个又一个运动把我们这批人整下去。

（注：在一篇标题为《红岩英雄悲喜人生：游击纵队40多人解放后被处死》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接着而来的便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三反”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在“宗派主义者”和“左倾顽症患者”的指导下，原川东游击纵队指战员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与处理：以“土匪”、“恶霸”、“反坏分子”等罪名判刑的有100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40多人，142人被开除党籍，460人被开除公职，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更叫人痛心疾首的是，原奉大巫支队司令员陈太侯，在1951年“清匪反霸”中被人诬告为“土匪”、“反革命分子”，竟不由他申诉，便被判处死刑。陈太侯惯使双枪，枪法极准，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之一。有关部门、人员知道他的厉害，先把他的枪卸下，再由人左右前后的架着，押回老家枪决，当众宣布的罪状是“土匪”、“恶霸一方”等等。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后又兼任纵队政委的赵唯，在“反右”期间也被打成“大右派”，被监督劳动改造。”——打扁阿扁发表于2006年4月20日）

我们这批地下党的人当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说不准哪天就没命了。我这条命算是江姐救下的。1948年，江姐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关在国民党第十八保安司令部，她在被押到重庆去时，从电报路走下来，一路高喊：“我是良家妇女，不是共产党，你们冤枉我。”她这样高喊，就是要给我们这些还没被抓的人放信，让我们知道大事不好。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当天就跑到武汉躲起来。我算是1948年万县大逮捕中的“漏网之鱼”，否则，我也会同江姐一样死在渣滓洞。

可解放后，川东地下党象我这样的“漏网之鱼”，被共产党一网打尽了。

现在，在万县地区，红军时期的川东地下党员只剩我一个了。前些年他们找我写回忆录，我写了7000多字，发表出来只有一半，后面蒙冤部分被砍掉了。我在看反映潘汉年的电视剧时很有感触，因为我当年也是在敌区搞情报工作。我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是非颠倒千秋恨，皂白不分万载冤。一片丹心耀日月，招魂何处问苍天？”

你问回想这场革命的感想？怎么说……那时国民党的官员嫖娼赌博还是自己掏腰包，现在共产党的一些官员嫖娼赌博花公款……算了！我已是垂暮之年，一切都无能为力，不关心了！每月拿二、三千元的养老金过最后一点日子。

采访时间：2007年3月9日

地点：万州儿童医院老干科

采访后记

“老革命”谭竞平已经89岁高龄，是我到目前为止采访的年岁最大的。

采访时，他躺在病床上输液，护士不时进进出出，他也讲得断断续续。但是，感觉得到，老人一生经历的和积累的东西很丰富，可惜的是，由于身体和时间等原因，我只采访到冰山一角。

谭竞平老人从“三反”运动时就蒙受冤屈，并被判了几年徒刑，1957年又划为右派。由于他是我的大伯，我知道那几十年的日子他和他全家过得十分艰难，他妻子因为他而失去工作，全家8口人每月只有30多元收入。那些年，政治上的压迫不说，仅经济上就让他全家长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是，采访时，他一点不提自己的冤屈和苦难。

同那些冤死的战友相比，同他所目睹的那些惨烈相比，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当我问他现在对他参加的这场革命有何看法时，老人突然显得很烦躁，匆匆说了两句就不作声了。



“我已是垂暮之年，一切都无能为力，不关心了！”

补记：谭竞平老人于2012年2月去世，终年94岁。

档案上记载的重庆市南岸区征粮和土改情况

第二节 征粮反霸，镇压反革命

南岸解放，百废待兴。新政权首先面临的是上级下达的公粮征收、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斗争任务。特别是征粮工作是当务之急，早在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南京给西南服务团的干部作报告时就说过：“这次到西南，遭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不仅我们进去的几十万部队要供应，而且，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有的还要暂时养起来，还有国营企业的20多万职工也要吃饭，能不能把西南搞好，首先就看我们能不能养活这批人。”（参见《西南服务厅团史》第三章·走向大西南·第二节·征粮剿匪）

.....

（一）、举办农训班，教育农民，整顿农会

南岸各区公所按派出所辖区组织派出了工作组，在农村进行政治宣传，物色农村积极分子，教育农民当家作主人，成立农民协会。通过动员、学习《减租条例》《农协组织通则》、听领导作报告、看电影《踏上生路》、召开诉苦会等形式，对首批农训班77名学员（男60、女17）进行阶级教育……通过大力组织开展诉苦活动，学员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鸡冠石王新荣说：“我们穷不是命不好，不是菩萨降的罪，原来是恶霸地主把我们整穷了的”。大兴场阙利源说：“我们回去也召集大家来诉苦，使他们认清哪个是我们敌人”。汪山蔡正常说：“回去不单要整顿农协会（的阶级成份），还要把妇女组织起来大家共同斗争”。42岁的妇女刘天福经教育提高了认识说：“过去我还认为我的老板厚道，因为他常给我小东小西，现在才晓得他剥削我们的多得多呢！过去认为穷是命，现在找到穷根了。”

第二期农训班9月25日开班，学习11天，学员119人（男78人、女41人）。第三期农训班12月8日至12月18日，学员104人（男68人，女36人），学习10天。尽管学员中三分之二的人不识字，但经过启发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后，加深了对地主的仇恨和回去开展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六区共举办了四期农训班，培训学员650人（男515人，女135人），组织了27场诉苦会，动员了40—50人上台诉苦，举办了15次座谈会，召开了14场斗争地主会，有21000多人参加了斗争，斗争中对不法地主采用了捆、吊、跪煤炭花（煤渣）等形式，让地主低头。六区农会会员后来发展到5229人（男3327人，女1902人）。

（二）、公粮征收任务繁重

南岸地处郊区，地少人多土地不够耕种，种一石或两石，甚至几斗地的农民占的比例相当大。由于建国初期粮食紧张，公粮征收任务大，西南地区中央规定农民每户年产150市斤粮食为公粮征收起征点，所有农产品产量都要折合成粮食评定，以石为单位，折合标准是：麦子每石折合黄谷一石四斗；高粱、大麦每石折合黄谷五斗；包谷、胡豆每石折合黄谷一石；白菜、四季豆每百斤折合黄谷九升；韭菜每百斤折合黄谷一斗八升；青菜萝卜每百斤折合黄谷一斗四升。尽管如此，当时干部的任务观点强，实际征收量与上级下达的任务数字差之太远，缺口大，征粮工作组不得不突破中央公粮征收起征点的规定。如南岸六区玄坛庙工作组把每户150斤的起征点降至100斤，甚至80斤以下。农民吕海章全家5口人，农作物收入共折合粮食3.57石（386斤），人均77斤，调整公粮0.178石（19斤）。农民生活很苦，只有贩菜、下苦力，或兼做其他事情，以维持全家最简单的生活。

.....

南岸农村各阶级承担公粮比例，地主承担公粮大半都达到政策规定的60%（上级规定超过而已缴齐者不返还），余者由其他各阶层承担。

.....

南岸六区各阶层公粮负担情况如下表：
南岸六区各阶级公粮负担情况

成份	户数	人数	负担公粮数（石）	负担公粮百分比	负担占总收入百分比
地主	289	1253	1370.835	52%	72.6%
富农	107	678	1051.722	39%	17%
中农	14	94	377.442	16%	8.6%
贫农	191	1017	200.381	16%	1.6%
佃富	135	731	146.7	24%	17%
佃中	369	2615	707.4	11%	8.6%
佃贫	1490	6843	27.9	0.7%	1.6%
合计	2748				

（三）、减租、退押与斗争地主

1950年下半年，根据[重庆市委字1950第042号文件]《关于郊区工作几项具体工作的决定》第二条：“减租与退押应分开，同时应连续进行（但不要划分阶段）。反霸斗争一般与减租退押结合进行，而斗争的广泛展开将在退押时期内。”的指示，南岸地区的减租、退押基本上是按市委指示安排的。工作组首先组织各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学习减租退押法令文件，依靠农训班学员为骨干，发动群众广泛

收集地主剥削农民的材料，做好退押与斗争地主的准备。农村减租工作全面完成后，斗争的重点主要放在了退押时期，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以各乡农民协会为单位，下设讲理、立约、算帐、监察四个组具体开展工作，在各乡各保充分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开展诉苦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并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当选择的斗争对象被斗倒以后，其他地主便纷纷表示愿意遵守法令退押，如黄桷埡斗争了恶霸地主谢颐若后，海棠溪、南坪场和四公里等地的地主说“不带押金去开会要受气，倒不如先交押金免得受绑”。

至减租结束时，五、六区共退押金4830982850元，减租133024.58市石，另外还有黄金、银元、白银、宝石、金戒、布匹、棉纱、肥猪等若干，平均减低了原地租的25%，将土地所有者所收押金退还给了佃农。在减租退押的基础上，成立了村一级的基层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同时，着手筹备土地改革。退押的工作步骤是：1、工作组依靠农协召开富农会，指出富农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动员他们自己起来开展退押斗争，要求他们自觉自愿先拿出一部分押金作调济；2、干部开展退押学习，了解押金材料，听取群众对退押的反应，作出下一步工作安排；3、召开斗争地主会，对群众进行教育，讲明人民政府对退押的态度，对不法地主是不会放松的，令其准备押金，同时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对不法地主进行镇压。

具体退押时，选出保管组、算帐组，召开斗争地主退押群众大会。斗争地主退押大会规模一般在1000人以上，如汪山斗争地主丁尔康、丁易辉，会场约1000人；大兴场斗争地主张伯函，会场有3000人，苦主20人—30人；鸡冠石斗争地主江聚原、曾道成，会场各1000人；大石坝斗争了地主聂秋汤、吴华廷等。斗争之后，其中一些地主人民法庭当场宣布执行枪决，以增加震慑力量。地主都在地上跪成一排，苦主现场诉苦后，马上进行算帐，如果地主捣蛋，农民就当场将其捆起来，或关押，或找人取保限期缴清押金，收到的金钱暂时保管在农民手里，增强了农民的积极性。大石坝工作组一夜就关了20几个人。对不法地主工作组放手让群众自己处理，如：55段地主童炳然应退押金2000多万元，十几天一钱不交，农民就将其捆起吊在树上令其受冻，见此情况，20段地主莫家玉第二天缴来1000多万元，农会限她三天之内全部缴清。退押主要是发动佃户自己去搞，干部旁边协助，如果佃户有顾虑，就由干部代为处理。南岸六区共斗争了16个地主，执行枪毙7人（张伯函、吴华廷、曾道成、江聚原、丁尔康、唐绍林父子），参加斗争会的农民达到21000多人。

斗争地主退还押金使贫困农民得到好处，因此情绪很高，如南岸六区共应退押金2627673906元，截至1951年2月，退押金1882806619元（其中，富农退出1222382430元，中农退出376561323元，贫农和其他成份退出282420992元，共调剂数为563103366元），还追出银元4937元，黄金10两。中贫农、富农调剂外的押金都发给农民自己使用，农民获得调济平均数30万元左右。1951年元旦，六区大石坝工作组举行庆祝元旦大会，农民1000多人参加，他们制作了犀牛、狮子、连枪等上街游行，庆祝斗争翻身得到胜利果实，参加游行的妇女也占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

从“地主婆娘”到“右派分子”

讲述人：戴廷珍

1950年土改工作队员

1930年生



一、打腰鼓，枪杀人的前奏曲

涪陵刚解放不久，地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对我说：“你到武隆县去锻炼一年就让你入党。”

武隆是大山区，生活条件比涪陵艰苦得多，但是，我很想入党，就答应了。

1950年，我带着一帮学生到了武隆乡下，协助搞清匪反霸和土改。那时，每一个乡镇都建有一个庙子，我们就住在庙子里，打地铺睡在地上。批斗会、公判会都在庙前的地坝里举行。每到一个乡镇，我就率领学生队伍把腰鼓打得震天响。对了，我在涪陵活跃得很，是打腰鼓的好手，涪陵七个区的人都来找我学。武隆那个偏僻贫穷的山区，对腰鼓很是稀奇，我们到一个地方打腰鼓就是为了把农民聚集起来。

聚集起来干啥？开批斗会呀。农民被鼓声吸引来后，就开批斗和公审大会。要斗要杀的人早就捆绑好了立在庙前。唉呀，那个捆绑才吓人，用铁丝从胳膊肉里穿进去捆绑！我一辈子都记得，血淋淋的。我不敢看，只有皱眉头，还不敢公开皱。

批斗完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我记得最少杀了3个，最多的有20多个。保长都杀，地主当然也杀。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武隆县穷得很，一家人裤子没多的，出门得轮流穿。有的人家一床棉絮都没有，睡觉盖包谷壳。那些地主，是不是地主我也不清楚，看上去也穷得很，有些地主，一身破破烂烂，象啥子地主嘛。我们演剧，要用地主、地主婆的衣服，去借来穿了，一身都是虱子！

但是，为了入党，我咬着牙坚持。

那时杀人随便得很，我有个叔伯叫戴纪奎，他在涪陵当个小科员，娶了个漂亮的乡下姑娘，解放前夕他回到乡下他妻子那儿（他要是不回去就好了），结果被农会抓起来枪毙了！他一点罪行都没有，平白无故把他杀了。他妻子后来嫁给了重庆法院的一个炊事员。评地主也随意得很，我父母在1958年还被划成地主！为啥？为了

打我右派，就把家庭出身给你搞成阶级敌人。由此可见当时划地主多么随意。

杀完人后就该我们上场演剧了，剧在黄昏时分上演，点起煤油灯，就在庙前。永远只演一部剧——《穷人恨》。剧的内容有些象《白毛女》，讲地主、地主婆如何凶残，如何剥削压榨农民。本来该收10担租的非要收20担。农民交不起就去拖人家的牛……反正乱编，要煽起农民的仇恨。我在剧里演地主婆，手拿锥子（就是扎鞋用的有一个把柄的长针）去扎象白毛女那样的丫头。

演完剧后，我们就在庙里过夜，这是我最痛苦最恐怖的时候。为啥？为那些死尸！

当时有个规定，被枪毙的人要暴尸三天以展示震慑力。他们专门把尸体拖到庙前，还要专门以此考查我们的阶级立场，检验我们的态度。我进进出出都要看到那些恐怖的尸体，我怕得很，夜里尤其害怕，一闭上眼睛就是血淋淋的一片，几乎通宵不能入睡。当时还有人把死尸的睾丸割下来拿去吃，说是吃了治咳嗽。我走过尸体时，闭着眼睛进闭着眼睛出。我们学生中有的人也吓得惊喳喳地叫。这些都是没有经受住考验的表现。



武隆县

杀人的场面我也不敢看，但是，不去看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我只得撒谎，一会要拉肚子，一会要去撒尿，频频躲开那种场面。但是，这又瞒得了多久呢？所以，他们给我的结论是没有经受住阶级斗争的考验。就这样，我没能入成党。

演地主那个演员就很会表演——台上台下都会表演。他本人就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表现出很仇恨地主的樣子，还积极地参与斗争地主，对地上的死尸也表现出仇恨。所以，他经受住了“考验”，入党当了官——武隆政协主席。多年后有人说，当年《穷人恨》中的地主和地主婆，一个当了大官，一个挣了大钱。

二、打锣鼓，斗打我的开场白

1957年大鸣大放时，我在重棉七厂中学教书，我说了三句话：一、储安平的“党天下”说得好——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党说了算；二、“老牛吃嫩草”——我们党委书记60岁了，娶了一个20岁的漂漂亮亮的地主女儿；三、“十麻九怪当不到癩儿打呵欠”——我们有个领导是个癩子（即头上有癩疤，无毛），我讽刺他。这三句话给我换来三项“帽子”：一、右派分子；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领导的坏分子。这三项“帽子”压我几十年，整得我死去活来。不仅整我，还整我在涪陵的父母。1958年，在我被打成右派后，他们重新划成分，把我父母

划为地主分子！1979年我右派改正后，才给我父母平了反，但这时我父亲早已被迫害死了。

我没有被送到川西的峨边去劳改是因为我有几个亲戚在共产党内当大官，其中一个是我么爸，他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解放后担任了北京空军的宣传部长。那个军属证就是寄到我家的。

我没被押到峨边劳改，算是捡了条命，峨边艰苦得很，好多右派都死在那儿。由于我当大官的亲戚的原因，我1961年就解除了劳教。工作没了，我自谋生路，在朝天门卖歌单，5分钱一张，我一边卖一边唱，沿着那石梯走上走下地唱卖，一天要卖400张，也就是20元钱，那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后来我在文化宫中门租到一间烂棚子，作为洗像片和给像片着色的门面。我的生意好得很，很挣了些钱。

文革期间，是我被斗打得最惨的岁月。我曾戴过10顶高帽子游街，衣服、裙子被撕成条条，屁股被锥子锥得鲜血直流。说来好笑，土改时我演地主婆，用锥子去锥丫头，以展示地主阶级的凶残，但那是演戏。文革时，“革命群众”用锥子锥我这个右派分子就不是演戏了，我屁股上从此留下了终生不退的血疤。那些撕烂的血衣我一直保留了多年，可惜我女儿不懂事，把那些“文革证物”全部拿去丢了。

我为什么被斗打得惨，因为我不认罪。斗争我时，要我交待犯罪的原因，我说，我交待，我之所以犯罪就是听了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结果一说到这儿他们就拿锥子扎我屁股。斗我时，他们强迫我站在叠起的两条板凳上打锣，为啥？为了把人们吸引过来观看斗争我。我心中不服，使劲打，把锣都打烂了。

在生我小儿子的那天下午，我还被抓出去斗。斗完后我跑到市委，那是1969年，已经有军代表了，我把军属证拿给他看。对了，文革抄家，我家被抄得精光，但军属证没有被抄走。那个军代表亲自把我送到了第三人民医院。那时，“黑五类”（即共产党划的“地、富、反、坏、右”）不准住医院，军代表对医院说：“你们把这个人收了，我担保。”当天晚上我就生下了我的小儿子——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现在是西南大学的副教授。所以，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救了我一命，不，救了两条命的军代表，他叫王建中。

那个军属证还成了救我妈的救生符。文革时，三天两头戒严，一戒严就把我妈抓去关起，为啥？为她是“地主婆”、是“阶级敌人”。每次我都是拿着军属证到各个拘留所、收容所、派出所去找她，找到后用军属证把她领出来。文革时我么爸还在部队里，他们打电话证实后就把我妈放了，但下一次戒严又抓。记得有一次，那是1969年，我小儿子才8个月，我背着儿子，从一个派出所到另一个派出所找我妈……我丈夫？唉，他也是右派，在川西劳改。他当右派是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地主——云南江川县的地主。土改时他父亲看到天天杀人，吓得上吊自杀了。我没

工作，成天要在外面挣钱，小孩没人带，只好把妈妈接来带孩子，结果弄得她三天两头被关押。

那些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我曾经8次上北京告状。

当然，那些日子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上访、申冤这一套我搞得车轻路熟，现在重棉七厂的下岗工人上访都是我领头，政府信访办的人一见到我就头痛。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28日

地点：重庆枇杷山公园

采访后记

我已多次在右派们的聚会上遇见过戴廷珍，但从没想过要采访她。因为前些年我主要采访重庆长寿湖右派，没打算再采写其他右派群体。决定采访她是因为偶然听她说起她曾经参加过土改，在餐桌上她描述那个“铁丝穿肉”的表情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当即记下她的电话和家庭地址，并请她一定约我谈谈。

2009年岁末，重庆江北农场的右派们在重庆枇杷山公园聚会，我借此机会采访了她，并录下了她的全部讲述。

补记：戴廷珍于2011年去世



在国共内战时中共以土改来动员农民投向中共，参军打仗，此为中共土改宣传画

太血腥，我想逃脱，结果——

讲述人：杨正秋
原合川龙市镇土改工作队员



受不了土改血腥杀人，我想逃脱，但什么叫在劫难逃，我就是在劫难逃……

我是四川合川龙市镇人，我外公粟和林是个兽医，我父亲是个医生，他中西医都不错。

我十多岁时，去读合川师范学校，当时读师范一分钱都不收，吃饭都是国家拿钱。我正是因为没钱才去读的师范，背个箱箱就去了。培养老师应当国家拿钱，解放前都这样，现在收钱没得道理。

1950年2月1号，我在合川龙市区（也叫第九区）人民政府当了脱产干部，做恢复农村村小（学）和组建农会的工作。那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时期，是土改的前奏。

我组织宣传，作记录，作记录就是公审大会上他们讲地主的罪行，我负责记录下来。审判长宣判“罪大恶极，宣判枪决”之后，我就在“判处枪决”上打个勾勾。这就像旧时戏里的判官一样，阎王在上面宣布，要把哪个打下去，判官就勾个布子。杀一个人我就勾一下，我就是那个角色。

我当判官角色的时候，有一次，在龙市小学镇压所谓反革命，实际上是杀地主。那一次一下就杀了十几个。杀了之后我们还要一个个去把耳朵提起看，是不是杀死了。当时我就觉得太残酷，那些人并没有什么罪恶，哪能这么干？而且，那些杀人的打手都是些地痞流氓。当时组建民兵，选哪些人呢？要选胆子大的、会用枪的、成分好的。什么叫“成分好”？叫花子（乞丐）成分就最好。当时讲成分，贫农是没有田地的，而叫花子更穷。其实这种人都是一些好吃懒做、地痞流氓之辈。他们一无所有，乱整乱搞，中共就信任这种人，就利用这种人，因为这种人才下得了手，这是共产党的一贯传统。现在电视上都看得到，共产党起家，就是把什么土匪武装呀、地痞流氓等组织起来搞革命。打国民党时就把土匪、地痞流氓组织起来对抗。

这些地痞流氓民兵，他们杀人前把子弹在石头上磨，然后冲着人脑打。子弹是铜壳壳，里面是铅，铜壳壳一磨薄了，子弹打进人脑就会把脑壳打开花，当时叫“敲沙罐”——把人脑壳像沙罐一样地敲得稀烂。有个叫任笃青的地主，他是我的邻居，他的脑壳被打开了花，只剩一点山羊胡子吊在下巴上。他的后人就是凭这点山羊胡子来认的



杀地主(网络图片)

尸。我看到这个场面，觉得这样杀人要不得，这样搞下去要不得，太残忍了！

还有，我的一个堂叔杨希伯，他虽然有点地，但他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他也被抓到杀场。他在下面眼巴巴地把我盯着，那个眼神是问我能不能救他。我怎么救他嘛。我看到那双眼睛，难受呀！那天没有杀他，他是被抓去陪杀场。那个陪杀场被杀头还可怕，杀死了就算了，但陪杀场的人目睹和经历的一切会深深印在脑子里，可怕得很。我堂叔陪了杀场回去，当天就疯了。

当时，凡是有点知识、有点财产的，都逃不脱那场劫难。我的两个舅公（我外公的两个兄弟），都是医生（中医），他们被抓到仓里关起来。在仓里，他们相互勒对方颈子，双双勒死了。

土改那个血腥场面我看不下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合川的原因。

我给领导提出，我想出去深造。

那个区长还不错，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埋没了，他开了条子，让我去重庆市干部招生委员会。

（注：杨正秋到重庆后，进入重庆市总工会并担任了四川电业工人报的编辑。1957年为采写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他后面的22年人生充满艰辛。）

回想这一辈子，我为了逃避土改的血腥，来到重庆，结果当了右派。什么叫在劫难逃，我就是在劫难逃。长寿湖6年，重棉六厂16年，我总共劳动改造22年。

采访时间：2015年2月5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美专校街

采访后记

我第一次知道长寿湖右派杨正秋，是2000年看到他的长篇小说《陪都夜话》，而正式采访他，已经是在14年之后，这个时候《长寿湖》一书已经出版三年多了。

在一次聚会时，我偶然听他说，他当年参加过土改，正是因为受不了那种残酷血腥，他才离开农村到了重庆。想到土改的经历者已经十分稀少，我当即表示想去拜访他，由于彼此已经很熟悉，他马上就同意了。十多天后，我走进了他的家门。

老人是作家，有思想、有见解，他在讲完他的经历后，还发表了一些“评论”，比如他说：“共产党一直搞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从建国初期起都这样，清匪反霸，过分了。土改为什么不可以用和平手段来处理？杀地主，那么残酷，完全是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硬是非要制造一个敌对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可。共产党人为地搞阶级斗争，结果是伤到自己。还有当初对资本家的“对资改造”，为什么要那么整所谓的资本家？现在不断在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经济还要依靠他们。如果那时不把人家的财产收了，让他发展，现在会怎样？是当时错了还是现在错了？”

采访结束时，老人说：“我们这个国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中国知识分子苦难深重，我希望历史不要忘记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年的苦难，我希望终有一天会还原那段历史。”



湖北省钟祥县群众大会上人民法庭宣布判处地主曾宪成死刑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1953年

斗打地主很残暴

讲述人：江书城
原忠县土改工作队员



土改时我参加了土改工作组，组长是谭平攸（音），我主要是作记录。我们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发动群众，斗争地主。

问：当时很多贫下中农可能还没得这种思想准备？

江：没得没得，很多还为地主说话。有的农民说，没得某某老爷租给我们土地，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就要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那时教我们唱“谁养活谁”的歌，我还记得到几句：“大家来看一看，修房子、种田地，到头没得衣服穿……”

群众发动起来后，斗打地主就很残暴了。群众中有些“勇敢”分子，下得了手。我晓得的有“烧灯碗”，“烧灯碗”就是把手捆在板板上，固定好，然后在手心里倒桐油，再放一根灯芯点燃，那个烧起好痛苦。还有就是把裤脚扎紧，把螃蟹呀、妹仔（猫）呀放进去。城里十字街那个地主，他家里是开药铺的，叫肖跃杰（音），他老婆就遭螃蟹把下身抓烂了，还把妹仔（猫）放在她裤裆里。

当时有个积极分子，吊人、打人很凶，还把他评了个“吊打模范”。这个人在“三反运动”时也评了“吊打模范”，他把肖 X 从百货公司那个三楼上一脚踢下去。

我还是不主张这样搞，有一次我看到民兵连长把一个地主捆起打，我还阻止了。

土改搞得过火，群众还是有看法，我们又去讲政策，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

采访时间：2006年5月

地点：忠县县城

“先轰开，后深入”

讲述人：赵正荣
原云南盐津县土改工作负责人



我搞过三批土改，先在昭通搞试点，鲁甸和西江是昭通地区的典型，后来我到盐津县，在盐津县两碗点当点长和法庭的庭长。点长就是负责两个乡的土改。

当时农民的确是很迫切地想要土地，但是，中国这个土改是暴力的土改。我们的工作步骤是：先轰开，后深入——扎根、串联、访苦、问贫（先去找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发动群众，斗地主、分地主的财产。

问：什么叫“先轰开”？

赵：所谓“先轰开”就是在发动农民前先把所谓的地主、恶霸抓起来，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农民呢，当时都不愿意斗地主。我们这样“轰开”后，农民才敢起来斗地主。“先轰开、后深入”就是要通过斗争，不能和平土改。如果不通过斗争地主，把土地分了，那就是说你有地富思想，你没有搞斗争，就要撤消你的职务。

我负责的那两个乡，不准工作组打人。在别处就不同了，说理斗争，实际上不是说理斗争，是打，而且不是一般的打，特别是在追财产这个阶段。当时不仅打地主，地主的家属子女都抓来斗打。比如上次来的那个吴之柏，他的母亲、叔叔等，都是斗争会上被打伤后回去死了的。他家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七个，是打死的，相当残忍。他为此还写了本书。

划地主我是执行政策的，只划那些不劳动、占有大量土地、靠剥削吃饭的人。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山区地方，有好些都不算什么地主呀，只是稍微有点土地，但财产、浮财都很少。有的根本不是地主，他根本没有剥削。还有，你年轻不知道，大多数地主的土地都是自己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买来的。

问：土改后期不是有一个复查吗？看是不是该划为地主。

赵：是有一个复查阶段，但复查不是说划出来的地主有错划的，不是！是看有没有漏划的，复查是针对漏划的地主。

（注：土改后期的所谓复查，最重要的就是查成分有没有划错或漏划的。从理论上讲，这个复查看上去有道理，但实际上它又为整个土改增加了丑陋的一笔。原因很简单，为了钱财。即便是错划为地主，也不可能改正，因为已经把人家的财产瓜分和吞噬了，不愿也不可能吐出来，甚至有的人都被整死了。而增划所谓漏网的地主，则马上又可以去分他的财产。所以，在土改的这个复查阶段，又补划了一些所谓的地主。）

采访时间：2015年5月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

采访后记

1957年，赵正荣在盐津县工交局局长的职位上被打成了右派，这导致他家破人亡。22年后他获得改正，担任了昭通市纪委书记。2012年，他发起昭通16个老党员，上书中共中央，要求撤销周永康政法委书记职务，这事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2015年，他第二次来重庆拜望重庆的老右派，并希望我帮他整理他的自传。上述文字，便是他人生经历中与土改有关的记录。



广东农民斗地主。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1953年

“让农民过苦日子”

讲述人：蒋泽英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腾龙村农民
1932年生



土改时我只有十八、九岁。那时，工作组的人给我们说，你们妇女，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现在要翻身。党员会、团员会，天天宣传，我们做活路（劳动）时也宣传。他们说，地主剥削我们农民，欠了农民的血汗钱，让农民过苦日子。

我小时穷，没读过书，解放后说要办识字班，我积极得很，打起火把就去。还有，说我们是包办婚姻，应当离婚，我差点就离了。

斗地主时我们一般先唱歌，再开会。我那时积极得很哪，记性也好。我还记得工作组教我们的那支歌：

“你我妇女们哪，唱的就一条心哟，大家都劳动嘛，把产生嘞哆哪嗦。今年好参军哪，好个刘秀英哟，带起个解放军哪，上重庆哪哆哪嗦。一条马路行哪，到了个台湾去哟，台湾解放了噻，转回城嘞哆哪嗦。样样清算你（地主）呀，你要坦白些哟，若或不坦白噻，枪决你哟哆哪嗦。你是个大生聊（大约是“为富不仁”的意思）嘛，你买田就富乡当哟，你抱倒肚子呕噻，溜达光咽唉呀哟。今年就把租减了，明年就把地分了喽。地主才无法噻，穷人就满了心唉呀哟。”

那时，我经常参加斗地主，但我没动手打，我是女娃嘛。整地主那些刑罚恼火（利害）得很，我看到的有这些手法：用海椒（辣椒）粉呛地主、吹他们的水风车、下雪天叫他们下田去摸鱼鳅、冬天里把他们的衣服裤子脱光，推到炮楼（当时村里有一座碉楼）上让他们光着身子受寒风吹、民兵把两三个铁角抬起来压在地主肩上……

枪毙的地主的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有个地主死之前对民兵说：“你好生打，不要把我的脑壳打烂了。”

我见到死人最多的是那几年饥荒年。没得吃的呀，我去把糯米藤那个脑壳挖起来推耙吃；还有芭蕉头。我还到巴县那边去背白善泥（观音土），背回来给娃儿吃。我哥哥说，那个蒋泽英，娃儿才两三岁，那个泥巴吃了拉不出屎，哪个办？

不吃泥巴有啥子办法？那些日子苦得很哪！记得有一次我背娃儿到石嘴医院去看病，在车上，那个司机说：“你看嘛，这儿死了一个。”转眼他又说：“那儿又死了一个。”一路上，我看那些死人，有的衣服裤子都被人脱光了，没被脱的都是些破烂衣服，那些饿死的人看上去惨得很。活着的人不管什么都弄来吃，那时，坡上能吃到生包谷（玉米）、生胡豆就好得很了。看到地上有一粒粮食，捡起来就吃了。

我哥哥一家饿得惨，他娘屋的那个，一天叫：“要吃饭哪，要喝米汤呀。”他们没得吃的，把那个衣服、那个烂棉花都撕了来吃。哥哥他们还是饿死了。我的老汉（父亲）饿死了，我的母（母亲）饿死了，我的公公婆婆也饿死了。

采访时间：2011年12月31日

地点：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腾龙村

采访后记

应朋友之邀来到南川乡下，饭后到山坡上闲逛，偶见一破破烂烂的农舍，一个老婆婆孤零零地坐在门槛后，冬日的夕阳洒在她瘦削苍白的脸上。

见有人来，婆婆赶紧站起身，万分热情地把我们请到她那几乎家徒四壁的房间里。老婆婆太孤寂了，不速之客的到来让她十分高兴，她冲着我们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

我突然想到，她这个年龄应当对当年的土改有所了解，便开口询问。我话音刚落，蒋婆婆更来了精神，冲口就说：“我当然参加了，我还记得当年唱的歌。”说罢她张口就唱起来。唱完，她又兴奋地说起那一段往事。看得出来，那是她生命中一段充满了激情、欢乐和希望的“燃烧的岁月”。



蒋泽英的危房

“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饥荒年走出去到处碰到死人我都不怕，背起娃儿就去！为人民服务嘛。”蒋婆婆说。

可惜，眼下她日子很不好过，贫穷是一目了然的，用她的话说，“过的是苦日子。”但这还不是她的忧心所在，她最忧心的是她住的这个破房子已经是危房，随时有垮塌的可能。“我没有钱修。”蒋婆神情黯然地说。“我找了政府好多次，没人理。我现在成天担心，哪一天我要被埋在这屋里。”

我们走出蒋婆婆的危房后，蒋婆婆一路送行。“你们到镇上帮我给政府说一下，我这个房子真的要垮了……”

蒋婆婆把我们当作城里来的干部，殷殷地又一次嘱托。

我看到的土改和 经历的大饥荒

讲述人：陈世惠
涪陵李渡区大柏树乡人
1941年生



我从小就很活跃，上过小学，在农村能说会唱。我声音很好，十来岁就去搞宣传，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我还参加腰鼓队，四处去打腰鼓，只是我人太小，背不动鼓，是他们帮我背。后来我还当了妇女队长。

当时我觉得解放前后真是不一样，国民党那些逃兵，逮老百姓的鸡，把农民的猪抓来就杀，连小猪都杀来吃了。解放军来了很客气，还给我们倒开水。他们说：“我们同他们（国民党）不一样，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土改时我还小，那些斗争场面我见得不多，但我晓得地主挨打，我们那儿打死好多人，不过我亲眼见到被整死的只有我们那条街上的两个地主婆。我们当时住在大柏树乡的街上，街很小，只有一条，四周都是农田。我们街上有一家姓陈的地主，是几兄弟，男的我没有见到，只有女的在家，我们叫她们二太太、三太太和幺太太。她们是妯娌关系。

幺太太长得高高大大，很壮实，她身体好得很，头发也很好，斗她时，把她的头发全部扯完。他们用棍子打她，冬天里，泼冷水，再用风车对着她吹。当时她没死，是抬回来后死的，我亲眼看到她躺在那儿，好大个人哟，躺在那儿一大堆，她死时大约近50岁。

另一个是陈德木的妈，我们喊她胖三嫂，她很胖。把她斗狠了，也是用棒棒打，用风车吹，还要淋水。押她回来的路上，在那个水塘转拐的地方，她一下子扑到水塘里。把她捞起来时她还没死，她是死在屋里。

三太太是她女儿把她救了。三太太有文化，对人很客气，她女儿叫陈世华（音），是成都音乐学院的老师。减租退押时要她退300块钱，她就同一个长年（长工）到成都去找她女儿，她女儿给了300块，还写了封信，说，如果钱不够的话就再去要，同时她问可不可以把她妈留下来。这边同意了，于是她妈就留在了成都。不过后来还是把她弄回来了。最后她女儿又来把她接走了。

二太太的土地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土地在很偏远的地方，她一直都不晓得那块土地在哪儿，只晓得收租吃饭过日子。减租退押时叫她去找钱来退押。二太太身体不好，又吃鸦片烟，以前她到涪陵去都是坐滑杆，现在不行了，得自己走路去，而且要她今天去明天就得回来。从我们大柏树到涪陵有一百多里路。她走路到涪陵去找三亲六戚借钱，因为她娘屋在涪陵。她一个地主，哪个借给她？她偏偏倒倒的又走回来。那晚上，她的屋已经被封了，她进不去，就到她侄媳妇陈章实（音）家讨歇（借宿），陈章实家也是地主，不准她讨歇。她只好蹲在她家的灶门前。第二天早上，发现她死在那儿。她有个儿子叫陈世松（音），他在外面读书时加入了地下党，一直在外面搞革命。土改时二太太不知他在哪儿，他也不敢回来，算是同他妈划清了（界线）。不过前几年他回来了，来找他妈的坟，他问我们，我们也找不到。后来找到当年专埋死人的袁大惠——她还没死，她说：“我埋的人就在这一条沟里，具体哪点我也不晓得。”她儿子于是就在那儿放了鞭炮，烧了纸钱，还办了两桌酒席请街上的亲朋。

那些年我们家死了两口人，都是上吊，但他们不是地主。

我父亲叫陈林表，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以前是教书的，能说会讲。土改时，要利用他，需要他这种人来办事，就让他当了农会主任。土地分完后搞复查，说他解放前当过三个月的保长，就把他开除了。其实他不是真正的保长，是帮他哥哥代理了三个月。就这样，把他当坏人整，宣布对他进行管制，不准随便走动，更不准随便外出。冬天，叫他下堰塘去把水葫芦捞起来。不过他没挨打。他很是苦恼，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他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另一个是我婆婆。当时在公社食堂吃饭，按干活和不干活一两、二两粮地分配。婆婆走不动，每天是我妹子从食堂给她打饭。有一天没人端饭给她吃，她说，哪个今天没得饭，我妹回答说，没得了，伙食团都撤了。那时家里又不能开伙食，她感到绝望，自己走到在楼梯下，在楼梯上吊了。他们把我叫回来，我摸她胸口，还在跳，但是，她没活过来。我婆婆叫陈胡氏，因为她娘屋姓胡。



中共土改时的宣传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我见到死人最多的是饥荒年，出去走路，到处都遇到死人。我们那条街，一天死十几个，通街男人，除了年轻一点外出逃荒的（像我后来的老公李乾定），几乎全部死完。当时整条街只剩三个男人。这三个为啥没饿死？他们是在单位或

饭馆里干活。其中一个是我二伯陈佳驹（音），他在医院干活。另外两个，一个叫罗海州（音），一个叫刘吉武（音），他们是在饭馆帮工，是个公私合营的餐馆。女的要经（耐）饿一点，男的体质大，抗不住。当时埋死人的是一个叫袁大惠的女地主，她身体很好，人又能干，成天挖野菜吃，还有点力气。不过，她也搬不动，只得拿根绳子，一头把死人的颈子栓住，一头搭在肩上，拖着走，一个坑里丢好几个死人。

对了，我还晓得有个人是胀死的。他叫夏云方，是街上榨桐油的。涪陵饿死人多，后来每个人国家拨了半斤粮，他去背粮食，在路上他忍不住一阵猛吃，当天晚上就胀死了。

饥荒年我家虽没饿死人，但那个日子好难！那时我妈没得办法，离家出走了。我家有七姊妹，大哥跑出去逃荒了，二姐去给人带娃娃，我是老三，是剩下的老大了。我就领着下面几个小的过日子。我只有弃学，老师留我，他觉得我读书很好，愿意为我交学费。我说没得办法，要吃饭呐。那时的日子好难！一个月没得一分钱的收入，只靠种庄稼。每次分饭，包谷羹、红苕羹，我把碗摆起，他们端剩了的才是我的。现在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没得大人，十几岁就当家的故事，我看到就哭，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采访时间：2014年2月6日

地 点：重庆枣子岚垭

采访后记

四川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的重灾区，据杨继绳《墓碑》和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统计，在那三年中，四川共有1200余万人饿死，为全国之冠。在四川这个重灾区中，又有两个重灾区，一个是川西的雅安地区，一个就是川东的涪陵地区。现在，已经有人（童梓平、阿宁）对川西雅安荣经县的大饥荒，写了一本纪实作品《大劫难》，该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幕惊心动魄的劫难。可惜，对同是重灾区的涪陵，至今却鲜有详尽真实的记录。

我的母亲和外婆都是涪陵人，我的外婆胡传芳1962年7月死于那场大饥荒（我曾写过“1962，我的外婆”一文并在海外发表）。于是，涪陵，在我心中有一种沉甸甸的触痛感。2014年春节期间，我到长寿湖右派郭锡昌家拜访，偶遇在他家作客的陈世惠老人，当我得知她来自涪陵时，便同她聊了起来，于是，就有了这一篇采访录。

错办（案）三、五百（件） 不追究

讲述人：杨通恩

秀山县石耶乡余庆村农会巡查大队长

1929年生



我们家以前很穷，我爸爸杨正安娶的是一个从贵州苗寨逃荒来的女人。他后来去给石耶乡的地主胡传宗家当长年（长工）。土改时我被招到秀山，培训了两个多月，培训的主要内容是讲阶级、划成分。划成分板点（条框）多得很，有大地主、地主、二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小土地经营（小土地经营就是你没多少田地，但是你做点生意，有些钱，日子还过得可以的人。）、中农、佃（下）中农、小商小贩、贫农、雇农等等，各种成分有十多个。记得划地主有几个标准：一是田多；二是有势力；三是有钱。

其实后来在划地主的时候标准很混乱，比如，人平超出5挑田（一挑田约产3-4百斤谷子）就可以划地主。我老丈人龙保文全家六口人，共三十挑田就当在地主。村里的杨光群（音），平时净是吃红苕，也当个地主。土改时我老婆这个村划了九户地主，有杨光群、吴春三、龙保文等等，这些地主其实都很穷，把他们的财物收缴起来，根本没什么东西，分这种地主的“胜利果实”，有的就分个茶壶，有的就分个菜盆，哈哈，讲起都好笑。那些贫雇农拼命斗地主，就是为了多分财产。毛老头（毛泽东）讲阶级，不讲阶级人家口袋的东西你拿得过来？

在秀山培训完后我分到石耶乡余庆村加入了农会，搞文教工作，同时还担任巡查大队长。巡查大队长干啥呢？一是到各处去捉地主、坏人，二是巡逻、清理场上的馆子等。

在石耶，那天我看见划成分张榜，我爸被划成“二地主”，我直接去找土改团的刘团长。我对他说，我家是在那山沟沟里被抓兵派款才逃到石耶来当长年。我们又没有用胡家的钱来搞出租，又没有用他家的田地来搞倒四六（即多收租，收佃户六成），为什么要把我家划成二地主？他问：“那你觉得你家该划啥成分？”我说：“佃中农。”他说：“好，同意你，佃中农。”

佃中农就是租佃别人的土地来耕种，人平有五挑谷子的农民，相当于下中农。那时主要打击五种人，地、富、反、坏和保长。

我们农会就住在国民党的乡公所里，地主抓来就关在马圈里。那就整得苦哟，像这种天气，蚊子多得成群成片，有一个叫“矮子黄”的地主婆，把她衣服脱光了推到马圈里，那个蚊子咬起过得呀？哈哈。还有，我们这儿有一种叫“铁梁角”的尖刺，有这么长（一寸），斗地主时把“铁梁角”铺在地上，要地主跪在上面。膝盖硬，有的刺就断在里面，那个刺一扯出来鲜血直流。我爸爸当长年的东家（地主）老婆也抓来跪，我保了她，没让她跪下去。



“铁梁角”刺

问：那时你怎么敢同情地主？

我当时“官”比较大，而且我同工作队的干部关系很好，晚上都睡在一起。

石耶余庆村分“胜利果实”时是我在负责。我们把所有收缴的地主的财产集中，分别标明了价格，按照“先无后有，填坑补缺”的标准来分。村里有多少雇农、多少贫农、多少下中农，成分已经划好了，“先无后有”就是先满足“无”——贫穷的贫雇农。“填坑补缺”就是选自己缺少的东西。我们编了号，按照阶级成分依次进屋选“果实”。5个一批地进去选。先进去的人选择度当然就大，看上什么就拿什么，但有个总量标准，比如他该拿100元钱的东西，多拿了就要退回去。他们拿了之后就到我这儿来登记，我是分“胜利果实”的委员。但是，我的成分是佃中农，名次排在后面，等轮到我，还有啥好东西？我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先搞点了再说，我就悄悄给自己装了一麻布口袋。那天搞了一整天，最后我去查看，咦，还有一个象牙烟杆居然没人要。那些农民不识货，那个烟杆要值50块钱，我拿了，只登了个5块钱。

可是，拿别人的东西不坐财（守不住财），我才分了果实，我老婆就大病一场，差点死了，我只得把“胜利果实”拿去卖了给她治病。

杀人我目睹了好几批。第一批有一个保长，叫郑云，在粮站背后杀的。第二批在河坝，其中就有我爸当长年的东家胡传宗。枪毙人，脑壳打得稀烂，脑浆洒了一坝。但胡传宗是打在脸上，当时他还没死，抬到公路上才死的。第三批杀了鲁晋权、王仲清、陈进国、杨保珍、吴肇修、吴龙文等12个人，就在鸭子河坝，我还一个一个的去查看，个个的脑壳都是打烂了的。我发现，那些有些势力有些本事的人，脑水的花纹和血丝条条特别多，弯过去拐过来的。但辛跃廷、王仲清、陈老谦（音）那些普通人，脑水就像猪脑子，稀垮垮的。其实这几个人死得很冤，那时冤死的人多得很，比如石耶街上的辛跃廷，他挂个药箱箱，给小娃看点小病，一个穷光卵蛋，说放（毒）药组就是他发放药；还有陈友健（音），他是个瓦匠；

陈老谦穷得很，说他是暗杀队的队长，都被抓来杀了。为啥？那时说有放药组、暗杀队，要攻打区公所。还有个田岩保也是说他放毒（药）。那天，工作组的叫喊，快点，田岩保放药了。其实那天他是去追他儿子。他儿子被抓去劳改，为啥事劳改我不知道，他听说后就追去看他儿子。他年龄大了，跑到河边，跑不动了，躺在那儿。人是我去抓的，抓来押起往河坝走，还没走到河坝，才下坎，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时有这种说法：现行反革命，立即枪决。立即枪决就是不用审，抓起来就枪毙。

哟，对了，还差点把我都说成是反革命！我操他娘！当时我没吃的了，到民山（音）去买点粮，一个叫刘志风（音）的人去给工作组汇报，说我到民山去拉人了，要打区公所。幸好我在秀山土改培训班的同学彭泰清（音）给我通风报信，我赶紧跑到团部去解释，这才解脱了。你不晓得，毛主席用干部呀，是欢迎你上台，斗争你下台。那个卵！今天你是干部，明天就是敌人，一干不好你就要倒霉。

我当长年的爸爸也死于土改，说他为地主隐藏财物，有三口箱子，一口装的金子，一口是钱，还有一口是什么哟。我爸爸不承认，不承认就关起来打，他被一个叫周长喜（音）的民兵连长活活打死了。

问：你没有追究？

追究啥？土改时有个政策：错办（案）三、五百（件）不追究。这个政策就是让人放手干。比如，我到石耶农会去干，心里没得底，有些怕，打了人，怕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就给我们讲政策：错了就错了，杀了就杀了，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也不追究你错杀，也不追究你犯法。

土改结束后，我本来是可以进入组织，当正式的国家干部。我有文化，是秀山二中初中毕业，我的同班同学杨正梁后来就当了武汉军区司令。可惜，我1949年匆匆娶了个姑娘，土改时她家又被划成地主，也就是说，我娶了个地主女儿。为什么是匆匆呢？当时秀山传言，朱毛（朱德、毛泽东）来了，有大姑娘的，赶快嫁人。大姑娘要被共产党抓去共产共妻。我们结婚一年多，就搞土改了。当时宣布，有同地主开亲的，有娶了地主子女的，赶快离婚。我没离，我老婆又没有做错任何事。这样，土改结束后，我就从石耶回到桂林我老婆的生产队。这辈子呀，我要是晚结婚一年，我就出去了。

不过，我回来后，还是当了大队干部，后来又当了生产队长。这辈子我只有文革时遭了两年的罪。为啥？一是说我贪污了3000斤谷子，二是因为我老婆龙慈英是地主子女。

大跃进时搞浮夸风，栽秧要栽“双龙出洞”（注：一是提前栽秧，二是多洒谷种），才正月十几，还冷得见鬼，就要叫出谷种，出多少呢？3500斤！我们队里那点田，只要300到400斤谷种就够了。我是大队干部，我就对我那个生产队的队长说，

把谷子洒在路上，人走路的地方多洒点，让人捡去吃。队长照办了，只洒了 500 斤在田里，所以后来就说我贪污了 3000 斤谷子。

把我抓去戴高帽子游街批斗。那一天我们有 26 个人，五花大绑，一长排跪在不到一尺宽的长条凳上。合作社那个王祖营（音）宣读每个人的罪行，读完后就冲着跪在条凳上的人一脚踹去，人是反绑起的，被踹下去的人都是面部着地，一个个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我排在第七个，第六个叫李光清（音），是个国民党的连长，他生得人高马大，他被踹下去后昏死在地，血流满面。我不能让他们踹，我听到王祖营快读完我的罪行时，自己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的李光清身上，躲过了那一劫。

文革整整斗了我近两年。

毛的功劳只是打下江山，在他手上整死好多人，操他娘的，一是饿死，二是计划生育搞死好多。



吃了人肉，就有一股骚臭气

我们队有一家人，父母饿死了，剩下一对娃娃，哥哥十来岁，他把八九岁的弟弟推到火坑里烧死了。我们去时，他正坐在火坑边啃他弟弟烧焦了的脚拇指，咬得嘣嘣嘣地响。但是，他也没能活出来，后来还是饿死了。

还有一个吃人肉的叫李光华，他是生产队的文书，当时 30 岁左右，他偷死人肉吃。吃了人肉的人，一走进他家，就有一股骚臭气。人肉吃多了，那个脸是黄的。我们在他屋里搜，搜出来的人骨头都有一箩筐！我们把他抓到公社去关起，他在那儿跳楼死了。我们那个队是九十多个人，死得只剩下四十多个人；里面那个队是 140 多个人，只剩下 70 个人。当时死了好多人，埋都没人埋。

采访时间：2017 年 7 月 8 日

地 点：秀山县岑溪乡桂林村

采访后记

年近 90 的杨通恩老人是参加了整个土改的农会干部，后来又是经历了毛时代农村全部风云的大队干部。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头脑清醒，表述流畅。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无视对着他的摄像机，嘻笑怒骂，毫无顾忌，不像有些受访者，一面对镜头就吞吞吐吐，言不由衷。

几个小时的采访，我录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唯一遗憾的是，老人的方言较重，加上他牙齿缺失，因此，听起来很有些吃力。

一个土改民兵队长的述说

讲述人：**张志强**

原重庆黄桷埡镇全山村民兵大队长
1930年生



我当年虽然是民兵队长，但我没干过那些坏事，所以我有今天的福气。（注：张志强家现在是老厂的首富）我连人都没捆过。斗地主赵克纯（音），在太阳坝晒，我看他遭不住，就把他喊到阴凉地。他后来看到我，点头哈腰，我说，你莫要给我打招呼，害我呀！阶级斗争！那些年，我当队长、当社长，做了很多好事，解救了好多人。比如有家人房子烧了，我叫他来挑包谷（玉米），尽他力气挑，挑了不下150斤吧。

解放前，我老汉（父亲）在城里做生意，做棉纱生意，对顾客都很好，人们很尊敬他。解放前夕，我们家也有了些钱，本来也打算买20亩地，结果一笔货款被拖欠，地就没买成。嗨，幸亏没买！买了就遭了，买了我家就是地主了！

解放后一次集中学习，填成分，我应当是小商出身，但小商不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共产党可以用你，也可以打击你，所以我就变，我填贫农。是嘛，我在解放前开荒，在老厂土生土长，大家都看到的。

从清匪反霸我就是头，最初叫武装队，后来叫民兵，我们是长枪，上面来的工作队配的是短枪。清匪反霸之后是减租退押。退押懂不懂？就是把租地租房的押金退出来。接着建立村民民主政府。我们到黄桷埡去抬毛主席的油画像，那个像大得很，我们去了好多人。接下来就是镇反（镇压反革命）。斗争地主我都清楚，像唱戏搭个台子，地主戴高帽子站在台上。大会启发台下的农民揭发地主的罪恶。有人说了（揭发了），马上给地主沟子（屁股）上一脚。那个斗争，搞无中生有，你没逼死人，我说你逼死了，就可以杀你。如果要杀人的话，开完斗争会马上翻牌子，斗争会就变成镇压反革命，会上宣布镇压。巴县长生镇的王海明（音）就是这样打（杀）的，在上场口。

我们这儿分两批打了12个人：邱宏安（音）、郭达旦（音）、杨世君（音）、邱必坚（音）、杨永青（音）、刘顺清、肖方炳（音）、何光超、赖能中（音）、张世春（音）、黄明礼（音）、范XX。这当中地主杨世君不是被枪毙的，而是被他妻子邱必坚毒死的。为啥？杨世君被关起来后，他看到自己要被“敲沙罐”（枪

毙，打头），他想保一个全尸，因此求邱必坚在送饭时下毒药。他妻子成全了他，结果邱必坚自己被抓来敲了“沙罐”。

其实好些人都不该打，比如地主郭达旦，人们叫他郭大爷，他是个好得很的人，一个善人。土改时说他在外面日嫖夜赌，杀死了人，这下他还活得成？是不是事实不管，讨论，大家说他该杀，就杀了。杀他那天，他吓瘫了，我们是用箩筐把他抬到刑场上的。

还有肖方炳，他也很冤，他是开粮店的，股份还是我们很多人凑的。粮食涨价，人们排起长队买米，就为这个事，说他是奸商，一起杀了。这些冤案共产党今后肯定要重新搞过。

我们这儿穷，没几个地主，就是地主也是小地主。你有两亩地，放出去，就是剥削。打这十多个人，只有杨世君、郭达旦两、三个地主，邱宏安是乡长、刘顺清是保长、黄明礼是赌博、何光超、张世春等是特务。

赵纯友：何光超我知道，她是文峰小学的音乐教师，教过我，很年轻，长得也很漂亮，死的时候大概才20来岁。

张志强：好多人都不该镇压（杀），那时你只要有名望，是头面人物，就要杀。我妻子刘培莲的爷爷和老汉就是大好人，他们免费给农民打针、种牛痘，烧开水送到坡上给农民喝。斗争会上启发农民揭发斗争，农民说他们没做任何坏事。但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名气大，就被杀了。真正的恶人、无赖，共产党不动他，比如我们这儿有名的泼皮文景山（音），偷东西、到处打狗，坏得很，因为他穷，一点没事。共产党是整有名望的（人），不是整作恶的（人）。

赵纯友：文景山我知道，是个远近闻名的无赖。

张志强：你问起我妻子？是的，她是地主子女。怎么敢娶她？是这样的，1960年，她从涪陵到我们这儿来投奔她的么姨妈，别人给我作媒。我看她迁移证上的出身是中农，这当然没问题，就娶了她，她比我小10多岁。什么时候发现的？好几年后，都生了娃儿了。那天我在海棠溪过河，在轮渡上有个背背篋的妇女坐在我旁边，背篋上印得有涪陵的字。我问她是不是从涪陵来，她说是，又问在涪陵哪里，她说马武镇——正是我妻子的老家。我问她认不认得一个叫刘继直的人，她说认得，他曾经是她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还教过她。她说，她家成份不好，她爷爷和爸爸都被枪毙了。

我心里明白了，刘培莲在撒谎。

后来我了解到，妻子出身于涪陵的名门望族，爷爷、老汉都是大地主。怎么办？我当然也只有隐瞒。我敢说？说了党组织马上要我离婚。什么时候说的？那是地主富农都摘帽之后，我在会上说，她是地主子女，大家把我看到。

我干事一向稳重，不偏差，人民政府叫干啥就干啥，共产党说哪样好我就跟着说好，否则要遭殃。每年三个运动都没有打倒我。那些年我看得多，一句话不对头，就要把你打下来，比如乡长赵海全（音），他说了一句“大斗小斗没得口口”——

没有配合统购统销政策，马上就遭撤职了。总之，上面说哪个就是哪个，你老百姓还敢说个“不”字？

采访时间：2006年3月18日

地 点：重庆南岸区黄桷埡镇老厂

采访后记

张志强老人听力很差，声音也沙哑，是一次艰难的采访。好在他没什么顾忌，只要听清楚了，必作回答，在共产党体制内干了一辈子，还具有这种坦率，还能凭良心讲真话，实在难得。

“我当年做了好多好事，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福气。”这句话采访时张志强说了两次。看来张老人相信善恶有报。

望着张志强修建的豪华气派的别墅，当年的地主子女、陪同我采访的赵纯友老人笑着说：“你是老厂的首富，现在该我来斗争你，分你的财产了。”

张、赵两位老人，一个当年的民兵队长，一个当年的地主子女，如今亲亲热热坐在一起，称兄道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补记：张志强老人于2007年去世



后面的新房子就是张志强的家

第四章

地主后代，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

那时，他们还是少年、学生、甚至是不懂事的娃娃。
但是，地主家庭的出身，让他们的人生充满了艰辛、
悲苦，甚至斑斑血泪。



那些年遭的孽说不完

讲述人：刘培莲



一，36岁的父亲，12个弹孔

我是涪陵马武镇的人，家就在离街很近的新院子，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门窗上到处都有雕刻，现在？基本上毁完了。

1950年我11岁，七姊妹中我是老二，哥哥在外读书，家中我就算老大。

我爸爸刘继直当时在涪陵师范学校教书，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家里由我妈妈王泽厚操持。我们家的田土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有五弟兄，分家时每人分20石租的田土，后来有的败了家，比如我么爷。但我们家搞得很好，到“解放”时已有100石租。

搞减租退押时，我妈妈说：“招租收租都是我，不关刘继直的事，你们不要找他，他一直都在外面教书。”本来，我爸爸应当没得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当老师的人。就是在乡里，爸爸口碑也非常好，因为他做了许多善事。比如为了防止天花（病），他免费为周围的农民种牛痘，就在我家里，我妈负责消毒，爸爸在乡民们胳膊上划小十字，然后种痘苗。还有，他在外面的大路上置一口缸，摆上十来个碗，一个木瓢，每天请人挑两挑开水倒在缸里，免费供过路人喝。每到赶场天，他就在路边放上红药水、紫药水、十滴水和药棉签，供那些碰伤了或肚子痛的人使用。他还办了一个私塾，免费让佃户的娃儿来读书。现在共产党的贪官们贪了那么多钱，做点好事没有？！想做都不敢！怕别人问，你那些钱从哪来的？

我们家的佃户和四周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想整他。但是，我三爷爷家的一个佃户一心要整我爸，他认为在他同我三爷爷闹矛盾时，爸爸帮三爷爷说了话。此人是个土改积极分子，他坚持把我爸爸从学校抓了回来。

斗我爸爸时，工作队的干部叫贫下中农上台揭发他的罪行，没人说得出来。他们就把我家的一个叫刘仁和（音）的佃户推上台去揭发。不料他在台上说的都是好话，比如他说：“刘继直这个人对人不错，就说我们在他家吃饭吧，中午只要把肉吃完了，他一定要叫家人晚上再煮几块腊肉……”工作队的人见事不对，赶快打断

他：“你下去休息一会”。其实，地主同佃户的关系哪里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嘛。我们同佃户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就说刚才提到的刘仁和，土改后一直同我们往来，直到他90岁去世。他的孙子前几年我还把他安排到了重庆。在我爸爸被关押期间，不断有农民在背篋里装点肉和菜，悄悄送来，叫我二妹拿去给爸爸吃。

正在爸爸关押期间，妈妈生了我最小的一个弟弟。我在家照顾妈妈，洗尿布，每天给爸爸送饭的任务就交给我9岁的妹妹刘培芳。一天，给他送的饭没有吃完，剩饭又让妹妹送了回来，看押他的民兵比较同情爸爸，管得不严，也没检查。爸爸在剩饭里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妈妈和我们每一个子女的名字，还有这样几句话：“要信赖政府，依靠群众，劳动改造，勿负我望。”最后写的是，他很喜欢菜园坝那个地方。

菜园坝是我家对面的一个小山堡，不知爸爸提到它是啥子意思。我们一家子哭，爸爸写这个纸条到底是为啥嘛？我们还不晓得他要遭枪毙，不晓得他是暗指死后把他埋在那儿。

他们找不到爸爸任何罪行，但那时正是共产党大屠杀的时候，没罪行就编造，说他参加过什么九路军，开过一个黑会。爸爸在牢中已经知道了他要被杀，他设法叫街上的何二婶给他送一大盅冷米汤，何二婶是马武街上做糍粑生意的，同我家关系很好。

那天，我到坡上洗尿布，看到街上又在开公判大会，广播也在吼，一问，说是又要枪毙人。我回到家，对妈说：“妈，今天街上又要枪毙人，热闹得很。”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会有我爹，我们都认为他不会杀。记得刚“解放”时，有一个亲戚叫爸爸到外地去，说他属于共产党的专政对象。爸爸觉得好笑，说：“我走啥子？我没做过任何坏事！”

正在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培莲，快点出去，你爸爸已经押出去了，要遭枪毙。你妹也被关起来了。”

我赶快往外跑。

我妹为啥被关起来？她象往常一样给爹送饭，正好爸爸同另外11个人一起被押往刑场，那11个人都是五花大绑，只有我爸爸没遭绑。

妹妹跟着追，边追边哭喊：“爸爸呀——爸爸呀——”

爸爸转过头来说：“芳，你回去，回去——”

妹妹还是紧追，一路哭喊。民兵们认为影响不好，把她关了起来。

（刘培莲泪流满面）



刘培莲泪流满面

我正往街上跑，隔壁三爷屋里的人拦住我，说：“你跑去有啥子用？你去找几根竿竿，想法把尸体抬回来。”

我掉回头，去砍了几根竹子，找了篾绳，赶紧往刑场走。

马武有一个以前跑马的坝子，土改时用作刑场，我赶拢坝子时，正好枪响。民兵不准人靠拢。当时是三月份，胡豆有二尺多高，我趴在地上，从胡豆丛中往里面爬。我爬进去，看见12个人东倒西歪倒在地上。杀完了人，民兵们就走了。我一边哭一边喊：“爸爸——爸爸——”。我扛着竹竿，在尸体中转来转去，心中着急，泪水又蒙了眼，一时没有找到。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不到12岁，没找到爸爸，心里竟一下高兴起来，以为他没被枪毙。这时，听见有人问：“培莲，看到你爸爸没有？”我说：“没有。”“你好生看！”我抹掉泪水，又找。这下看见了——看见他脚上穿的那双布鞋，那是我妈给他做的。

爸爸穿的长衫子，脸朝下扑在地上，我想把他翻过来，力气小，翻不动，几个大人来帮我。其他人是打的头，但我爸爸是打的身子。我看爸爸身上没有血迹，胸前有12个小洞——他被打了12枪！为什么打这么多？刑前他喝了一大盅冷米汤，就没流血，行刑的人见他不出血，就不断地打。

我们用竹竿把他抬回来，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带着我们一群娃儿跪在地上哭。这个时候血水才从弹孔里流出来，滴滴嗒嗒滴在地上。

是我们的佃户来帮我们安埋。没有棺材，只好把楼板撬下来钉成一口匣匣（薄棺材），草草安葬了爹。

我爸爸死时才36岁，他一辈子没干过一丁点坏事。

二，爷爷之死和二叔之死

爸爸死后一个月，我爷爷也被他们从涪陵县城抓回来了。爷爷叫刘复亨，他生得仪表堂堂，以前是专区的禁烟总督，还同蒋介石合过影，像片就挂在县城爷爷家的墙上。爷爷也同刘伯承关系很好，刘伯承曾经叫爷爷跟他走，爷爷没有去。

爷爷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当那么大的官，从不贪污受贿，完全不象眼下这些共产党官员。他生活很简朴，只同婆婆、一个丫头三个人过日子。

爷爷被抓回来后，先没有关押。当时他60多岁了，没生活来源，只得同婆婆一道糊火柴盒为生。没多久，一天晚上，一帮人突然闯进来把他抓走了。

爷爷被押到涪陵县中关起来，准备就在那儿枪杀他。

当时，我哥哥和表哥表姐都在县中读书。枪毙爷爷那天，哥哥和表哥表姐正要上台演一个剧——《天堂和地狱》。哥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绘画、乐器样样都行。在剧中哥哥扮演一个地主的儿子，表哥演一个警察，表姐演一个贫下中农的女

儿。那天，哥哥的一个姓何的好朋友——他出身好——对哥哥说：“培生，今天要枪毙你爷爷，你要坚强点哟。你要是流泪，你的前途就全部毁了。”

哥哥正在台上演出时，枪响了。哥哥一惊，马上想，千万要稳住，绝不能哭，要演好剧。

那天之后，学校给哥哥发了助学金，说他分清了阶级路线，表现好。

后来哥哥对我说：“培莲，当时那个滋味好难受啊！”他说，要是流了一滴眼泪就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他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个地主被枪毙后，他妻子上去抱着丈夫的尸体痛哭，说：“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你呀？你一辈子没有做一点坏事……”刚杀完人，正离开刑场的刽子手听见她的哭诉，马上返回来，“你敢说共产党不该杀人？！”一枪就把那个地主的妻子打死了。哥哥还说了那个地主的名字，但我忘记了。

爷爷死后，我二叔不敢去收尸（爷爷只有他和我爸爸两个儿子）。他请了两个人把爷爷抬了回来。我记得把爷爷摆在坝子里，不敢抬进屋。有人说，拿床席子裹起埋了就是了，什么都不要办。我妈说：“抬进屋来，反正一贫如洗了，怕啥子？！”一连串的打击，妈没有倒下去，她真是坚强。妈买来香蜡纸烛，为爷爷送终，又去撬楼板给爷爷钉了口匣匣。

再说我二叔。“解放”那年他刚好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他本来要去北京，但他妻子坚决不同意，于是二叔回到了家乡。他一回来就被弄去挨批斗。其实我二叔什么都没做，他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完全是一张白纸，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挨整。二叔后来被弄到马武白塘里面一个军管煤矿去下苦力。饥荒年，我们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双脚肿了。我妈一向很心痛他，长嫂当母，二叔对我母亲也非常尊敬。妈知道他是饿得不行了，叫我拿一升麦子炒熟后推成面给二叔送去。还没出发，又接到信，叫我们去领二叔的遗物，说有一件棉袄。

我同我二妹一边问路一边往煤矿走，那个时候虽然是大饥荒，但社会比现在安定，人没现在这么坏，否则两个女孩怎么敢放心外出。

我们赶到煤矿后，既没有见到二叔的尸体，也没有领到他的遗物，那件棉袄不知被哪个拿走了，我们白跑一趟。不过，管煤矿的解放军给我们吃了一碗包谷饭。

回来时，天晚了，没船，过不了河。我同二妹急得不得了，晚上怎么办？！这时，有一个姓王的年轻男人——他也没过到河——叫我们到他家去，将就吃点麦粥，住一夜。我们不敢，陌生人，又是男人。他说：“小妹，不瞒你说，我出身不好，做点工分东扣西扣生活很艰难……”听了这话，我说我家成分也不好，于是我同妹妹到了他家。他一家人贤惠得很，对人好得很，看到我们去了，他妈说，今晚再去推两碗麦子，做点粑粑来吃。在那个饥荒年，好让人感动。

三，妈妈，遭遇土匪抢劫与“土改”抢劫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没有她，我们这个家肯定四分五裂了。土改时，男地主被杀后，女的没办法，把娃儿东一个西一个送人，家庭散了。我妈不，她把六个子女都带在身边，一个不送。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没有倒下去，真的不容易。

我妈是重庆江北治平中学毕业的，有文化。“解放”前爸爸一直在外教书，家业全部是她经管。记得刚刚“解放”时，我家遭遇了一次土匪打劫。20多个土匪夜里悄悄摸进我家，两个人看守我们，其他人到各处搜寻金银财宝。妈妈为了脱身，骗那两个土匪说，楼上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两个土匪一上楼，妈妈把一岁多的弟弟塞给女佣，从后门夺门而去。土匪发现后追出去，冲她开枪，一枪从耳边擦过，一枪从头顶飞过，妈胆子真大，要是我，绝不敢。妈跑到一个我们的佃户家，叫他们锯一节竹子吹竹筒号。竹筒号在深夜里响起来，土匪们受了惊，飞快逃得无影无踪。

那次土匪打劫，我们只损失了一些银元细软。

土匪抢劫之后不久就是土改运动。这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什么东西都要：金银、首饰、衣服、铺盖、桌子、床……全部家产被整收缴得干干净净。

这还不行，反正说你地主不老实，还有东西没交完。他们把妈妈和婆婆抓去吊打，晒太阳。妈妈怕婆婆受不了，就欠过身子给婆婆遮挡一下，民兵一把把妈掀开，骂道：“你还敢给老地主挡太阳？！”妈被反吊起来打，她被吊得死去活来，吊了下来十个指头肿得分不开，我看见妈痛得在床上打滚。受刑不过，她只好招了：门坎后面埋藏有十多个银元。

“那是我藏的最后一点救命钱啊，”妈说，“这么大一群小娃儿，今后怎么活！”

但是，土改的“土匪”们仍不放过，认为我们还有金银没交出来，继续给妈用刑。他们把妈衣服脱光，把一种叫“活辣子”的二寸多长的毒虫放在背上爬。妈的背很快红肿起来，生出一个个水泡……

妈白天被抓去受刑，晚上同我们几个娃儿抱头痛哭。她边哭边说：“这个日子哪个活得出来，没得东西了呀，哪里去找金银呀……”

民兵在我们窗下偷听，看我们这个样子，估计我们真的一无所有了，这才松活了一点。

后来，又一次吊打，让妈差点走了绝路。我们队有一个叫田继贵（音）的人，既当会计又当保管。他自己监守自盗，偷了队里的谷子，反诬陷是我妈偷的。地主嘛，反正可以乱整，好欺负。又抓去吊，这次，吊得妈整个手臂全部死血，发乌，又痛得在地上打滚。妈绝望了，不想活了，伤伤心心地哭：“我命怎么这么苦，家里娃儿一大堆，支撑不了，外面又挨打受气受冤枉……算了，不活了。”

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坑，以前是个猪圈拆后留下的，当时灌满了水。妈走到那个水坑边，打算跳下去。她突然想，她一寻死那些人更认为是她偷的，怎么说得清。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大叔看见妈站在水坑边要跳塘，就吼：“你干啥子？是我，才不得去死，我要看偷去吃的那个人哪个死！”

妈说，这句话一下子让她开了窍。对，要活下去。

不久，她还真看到了！

田继贵随后到水利工地上去当伙食团长，他又故伎重演，把粮票藏在屋顶上的瓦沟里，然后谎称被盗。这次公安局的来了，用警犬找出了粮票。田继贵被撤职，下放到隧洞里去打炮眼。一天，他同三个人走在一起，他走中间，一块石头飞来，一前一后两个人都没得事，偏偏打中他，而且正中头部，把整个头打飞了，只剩一个颈子桩桩。



终于活出来了的刘母王泽厚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长叹一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妈活了86岁，记得当她听见宣布摘掉所有地富分子帽子之后，倒在床上痛哭，弟弟劝她：“妈，算了嘛，你活出来了嘛。”

妈想起这辈子的冤屈，整整哭了两天！

四，我隐瞒了出身的婚姻

我本来考起了县中，但只读了一个月就回家了。哥哥说，家里妈拖不动，弟妹多，又小，你一走妈就没帮手了。我很听话，就不读书回家务农。我和二妹都能歌善舞，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也有机会出去搞文艺，也是为了家放弃了。

刚才我说我们家一直没散，其实我弟弟刘培良还是离家出走。他十多岁时有一天队里开社员大会，弟弟肚子饿了，跑回去喝点稀饭。主持会的人发现他不在了，找上门来，一看他在吃饭，张口就骂：“贫下中农都不怕饿，你一个地主崽还怕饿？！去给毛主席请罪！”他们把弟弟抓到会场，强迫他向毛主席（的像）磕了24个响头。

当晚弟弟伤伤心心哭了一夜，第二天他对妈说：“活不出来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工分东扣西扣，别人结算可以挑谷子走，我们一无所有，还不敢吭声。我要走了，去找一条生路。”

我五叔家的一个妹妹嫁到了湖北，弟弟去投奔她，但又落不到户，天天去割芦苇晒干了卖。弟弟从小特别喜欢读书，成绩非常好，情愿饿饭都要读书。后来他

呆不下去，那边也说他成分不好，他只得又回来。我读到他割芦苇那段日子写的日记，伤心得直掉泪。

我年龄一天天大起来，也有人来说媒。哥哥叫我不要忙考虑个人问题，把弟妹们带大点再说。我很听哥哥的话，随便那个来找我谈，我都说不要朋友。当然也有看上我后，听说我是地主子女就退缩了的。我们院子徐婆婆有个侄儿来，看见我坐在院子里绣花，他一下看上了我，对徐婆婆说，那个女娃好可以（漂亮）呀！徐婆婆说，她是地主子女。她侄子是军人，说了声“可惜”就不再提了。

1960年我21岁，那年到重庆黄桷垭我么姨家，么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同么姨爹共过事的一个社队干部，叫张志强。我一看就不同意，以前人家给我介绍的都长得不错，而张志强弯腰驼背，我几百里路走来找一个驼背呀？

我不干，要回去。么姨把我拉住，说：“你这个死女子，你成分不好，啥子都不好，人家那么好的政治条件！”我说：“政治条件好又怎样嘛。”我还是不干，么姨拦着我坚决不准走。当天就住在张家。

在张家，我看到他家很有教养，各方面有条有理，是个有家教的家庭。那一夜我通宵没睡，怎么办？虽然家教不错，但人我确实看不上。第二天一早我就给妈写信，然后等回信。等信期间我帮他家做事，他们发现我很能干，都很喜欢我，于是更希望我嫁过去。这个时候快过春节了，我坚持要回去。那时，要开通行证才能上路，我去找张志强，他很老实，虽然不愿我走，还是帮我去开了。

那天晚上，他的大姨又来劝我，她说，她有个老表，也是弯腰驼背，没有人看得上，但旧社会可以拿人去“打样”——就是相亲的时候，找一个长得好的去见姑娘，把女方骗来结婚。婚礼后女的发现丈夫不是相亲的那个男人，是个驼背，就哭。但是，后来那女人很有福气，生了好多个儿，家里搞得红红火火……

他大姨反反复复给我作工作，最后，我终于点了头。

第二天是星期天，办结婚登记的人不上班，但他们有关系，专门去把那个人找来给我们办了证。

我当然没有说我是地主子女。我舅舅叫我千万不能说，只说我是中农出身，本人成分是学生。

本来绕不过迁户口这一关，但我运气好，我有一个高我几年级的女同学，她同派出所办户口迁移的民警关系很好，于是打了一个假证明，说我的迁移户口在路上被小偷摸走了，并证明我是中农成分。我把证明拿给张志强，他是主任，关系熟，很快就把户口上了。没人知道我的真实成分。

我在队上搞保管和妇女工作，他们动员我入团，我坚决不干，一入团就要调查出身，就要露马脚。我当时有一张爸爸的照片，也藏起来，不要他们看见，照片上爸爸完全是个知识分子，一看就不是贫下中农。

张志强：那一年我们在区上学习半个多月，是党员的，只要娶了地主老婆，马上到区法院办离婚。好几对立马就离了，不离的就开除党籍。

刘培莲：几年后张志强意外地发现了我不是中农出身，过程你都晓得了。他回来问我：“你爸爸这么年轻就去世了，是哪个去世的？”我说：“他流鼻血。”张志强听后没有反驳我，从此一直不提这个事，他怕伤我的心。好多年后，直到宣布地富全部摘帽后我才晓得原来他早就清楚。

采访时间：2006年6月4日

地点：重庆南岸区黄桷垭镇老厂

采访后记

两个多月前，采访张志强时，意外地得知他妻子是地主子女，其父土改被杀。我当即就想找她，不巧她不在家。

两个多月来，诸事繁忙，无暇抽身，但我一直念念不忘。

6月4日是周末，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过江、上山，又来到她家。

在张家豪华别墅的宽敞客厅里，刘培莲一口气讲起了往昔的苦难。条理清晰，讲述流畅，显然，过去的一切深深烙印在她心灵上。当讲到父亲被押赴刑场，妹妹追着呼喊时，刘培莲满面悲戚热泪盈眶，整个身心飞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血腥的年代。

共产党当政的这半个多世纪来，有多少血腥的枪声？

土改的枪声、文革的枪声、“六·四”的枪声……从偏远的乡村直到天安门广场，“共和国”杀人的枪声此起彼伏。

在“六·四”17周年纪念日里，我记下55年前的枪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民族苦难的记忆和对那些无辜亡灵永不忘却的纪念。

。民人辜無的命喪將即，下口槍共中在



在中共枪口下（网络图片）

何年昭雪这尘封的奇冤？

讲述人：胡永安



“何年昭雪这尘封的奇冤？！”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运动，它采用最下流最残暴最野蛮的手段去侮辱与迫害一些没有任何罪过也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一个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在人类朝着文明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如此黑暗如此野蛮如此残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议的。——胡永安

一，我的家园和家人

我是忠县官坝乡人，祖祖辈辈耕读传家，与乡亲们相处十分和睦。经过祖宗几代的辛勤经营，我家大院以及周围的环境已经非常美丽。大院里有一座高达七层的碉楼，气势很雄壮；大院内外是各种各样的花果林木，一年四季花果飘香，鸟声不断；大门左右各有一株高大挺拔的白果（银杏）树，不知种了几百年了，树干要



胡家院子前的水塘（摄于2016年8月）

三个人才能合抱，仰面看去，树梢仿佛伸进云里。春天里，白果树一片苍翠，充满生机，到了秋天，树叶变得金灿灿的，银白的果实挂满枝头，秋风吹来，金黄色的树叶洒落一地，院坝里铺满了厚厚的落叶，我们在落叶堆里寻觅一颗颗白果，拾来用柴火把白果烧得喷喷香，那简直就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我父亲叫胡耀英，先毕业于著名的燕京大学国文系，后毕

业于辅仁大学法学院。他先后任过达县法院书记官、安县县长、川康直接税局副股长、贵州田粮督导处长等职。我是他任安县县长时出生的，所以叫胡永安。解放后（“解放”这个名词我很不喜欢，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解放，这里只是为了方便叙述借用一下。）父亲在成都市东城区文化馆当馆员，1956年共产党在河北办荣誉军人学校，父亲调到那里当老师，他要求回四川未被批准，由于家里发生了一系列惨剧，他心情很不好，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送河北农场劳改。他死于三年大饥饿时，终年大约50岁。

我母亲叫钟季卿，忠县官坝场人，是官石两乡（就是官坝石黄两乡）出名的才女，她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而且绣花、缝衣、做鞋、制糖等等都非常出色，她甚至还会采草药为人治病。我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学到了这么多的本领。

母亲跟着父亲在安县住了一段时间，由于不愿意依赖父亲坐享其成，想回家来守住家业，就带着我回到了忠县老家。

二，我聪慧的母亲

解放前我们虽然家境较好，但是母亲从来不奢侈。我可以给你们说句知心话——在外面说别人会说我是掩盖剥削——我这个地主的儿子日子其实过得很苦。我冬天没穿过棉衣，这绝不是说的假话，冬天穿鞋的时候也很少，一般都是赤脚，习惯了，不怕冷。我那母亲也是太节约了，像《儒林外史》里写的，点桐油灯，要是哪个把灯草多点了一根她就要批评，说：“点那么亮做啥子，节约点钱多买点田地嘛。”她就是一心想买田地。我家平常是红苕出来就吃红苕，洋芋出来就吃洋芋，看见别人吃米饭我也想吃，母亲就说：“儿啦，米饭吃了哪有钱买田地，光靠那点祖业怎么行？没有田地你们今后读书哪有呢？”我一年四季都想过年，为的是过年能吃米饭吃肉。现在我还记得小时经常暴食，就是因为每年过年我就猛吃，结果把肚子吃坏了。



胡家院子前的稻田

由于山乡信息不灵，就在共产党快要夺取政权，外地不少人已经在抛售田地的的时候，我家靠着省吃俭用，田地反而多了起来，成了大地主。有好多田地呢，也就是100石租的田地，大约20多亩，还不如毛泽东家的田地多，毛泽东家有40多亩田。所以后来人们都说，做一辈子人，钟季卿最划不来，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买田地来当大地主，招来杀身之祸。



残存的通往胡家大院的石阶

母亲自己很节俭，但是对人却很慷慨，佃客遇到灾难有求于她，她和佃客一起落泪，她招待他们吃饭，把旧衣服旧被盖送给他们，还送几升谷子，说：“先拿去吃吧，吃了又来。”

母亲和乡亲们相处非常和谐，过年过节，母亲都要去帮乡亲们做糖，她能做很多品种。我现在还记得她扯糖时的姿势，把糖熬到一定火候，就双手这样扯，然后又吹，吹成各种形状，像葫芦啊，人物啊，蝴蝶啊，鸳鸯啊什么的，活灵活现。她要是现在还在，就是卖糖都能致富。当地农民的闺女出嫁，都要请母亲去为新娘开脸，说母亲能带来好运。哪里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地主一个个都是洪水猛兽十恶不赦？！什么黄世仁杨白佬，都是人为臆造的，哪有那回事？！有没有黄世仁那样的地主呢？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可能有个别地主是那样，但是不能代表整个地主阶层。总的来讲，由于几千年来受孔夫子仁义礼智信道德观的影响，地主一般都是讲仁讲义不做坏事不作恶的。按照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理论，所有地主都是那么坏，吃人不吐骨，杀人不眨眼，哪里是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在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母亲盘脚坐在床上弹扬琴，琴声婉转而凄凉，随着清风飘出很远，我依在母亲膝下静静地倾听，听得如痴如醉。一曲终了，我问母亲：“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听起好凄凉哦。”母亲惊喜地抚摩着我的脸蛋说：“儿啦，你能听出来这里面的凄凉？好儿子，这是《苏武牧羊》。”我又问：“苏武是什么人，怎么回事？”母亲就给我详细地讲了苏武的故事：苏武是汉代的大爱国者，出使匈奴被扣，流放北海，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渴了就饮雪，饿了就喝羊奶，冷了就挤在羊群里取暖，不论多么艰难，他都没有忘记祖国，匈奴用了很多办法来劝他投降，他都严词拒绝，绝不背叛祖国，十九年后，他终于回到了祖国。

母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这是母亲给我的最早的熏陶——

（胡永安讲至此突然泣不成声。）

我就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才爱上了音乐，后来音乐伴随我几十年。



胡永安讲述至此泣不成声

三，我一家的噩梦

土改中，我们家的财产房屋全部被剥夺了，连一片瓦也没留下，我们一家被赶进新坟坝湾一间被乞丐遗弃的破草棚里，草棚的墙壁已经腐朽了，用手一摸就掉渣。

冬天北风呼啸，外面有好大的风，屋里就有好大的风，下雨时屋里到处都是湿的，像杜甫写的“床头屋漏无干处”，母亲半夜起来用一些烂盆盆钵钵接雨，一晚上莫想睡觉。那时我姐姐不到20岁、我11岁还在上小学、弟弟妹妹都还小，最小的妹妹才出生还没满月，嗷嗷待哺，没有奶水，只有熬羹羹来喂，我天天晚上把妹妹背起，听着她凄厉的哭声，没有



湖北孝感县老屋乡农民搬进地主的家
“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南人民艺术出版社

办法。求生的欲望迫使我们顽强地活下去，我们全家依偎在一起艰难度日。弟弟妹妹饿得整日啼哭，看样子就要饿死了，母亲不得已忍痛将他们先后都送给了农民。妹妹送给一家农民后，那家人不把她当人，顿顿都是给她吃剩的残汤，像喂猪狗一样，妹妹严重营养不良发育不良，一直到四岁时在外地的父亲通过努力才把她接了回来，这时妹妹还不会说话走路，但是肚子却大得吓人，医生说是寄生虫，吃药后打出一半盆蛔虫。

大院外的两棵白果树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农民后被粗暴的砍掉，他们拿去仅仅卖了100元钱，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么美丽可爱的白果树了。



胡家院子被13户外来农民瓜分，
现早已面目全非（图为胡家院子旧址）

与此同时，大院内外的所有花果林木几乎全部被毁掉，昔日美丽的家园一下子变得伤痕累累满目凄凉。

他们分了这又分那，什么都给他们抢去分尽了，结果还是没富起来，还是穷。

其实就是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也要给地主留足必要的粮食衣物和房子，但是这种政策跟实际情况完全是两回事，我从没听

说过土改时有人给地主留下过什么。连命都不留下，还留什么其它的物品哟。

像母亲这样深受邻里爱戴的人，在土改运动中忽然成为斗争对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斗争她时没有一个农民说她有罪恶。土改工作组只好另外想法子，去偏远山区煽动一些流氓，说：“山区的田地贫瘠，没有平坝的田地好，现在毛主席来了，你们翻身了，可以去分平坝的田地，还有房屋，随便分。”这样，那些做梦也没想到凭空就可以得财产的农民们就下山分田分地分财产来了，我们一家的噩梦从此开始了。

四，我母亲之死

我家大院里的碉楼是祖父早年修建来防土匪的，七层楼，全是石木结构，我后来经常在想，这碉楼防到了土匪，却没有防到共匪。

背着长枪的土改民兵们把村里所有地主和一些子女——都是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的人——统统关进碉楼，施行各种毒刑。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后新的政权都要大赦天下释放罪犯，并且追赠前朝忠烈，从来没听说过要把一些无罪的并且失去反抗能力的人往死里整。

碉楼门口由背着枪的民兵们日夜守着，我每天都听到从碉楼里传出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有时惨叫声彻夜不停，令人心悸。那些声音直到现在还经常回响在我耳边，挥之不去，这也是我直到现在还经常夜里在噩梦中惊叫的原因。

我把那座噩梦般的碉楼称为“恐怖集中营”，在我看过的所有关于法西斯集中营的记载中，我还没有看见比这个恐怖集中营更野蛮残忍和下流的。

我母亲和姐姐都被关进了恐怖集中营，由我每天给她们送饭。没两天，我就看见母亲脸上满是血污，肿起好高，眼睛周围是青的，皮下到处出血。我把饭给她，她不吃，说吃不下。

母亲受不了种种酷刑，又亲眼看见她最疼爱的女儿受到非人折磨，她的一切都破灭了，活着没意思了。

一天晚上，母亲趁上厕所时，跳进了村里的水井，那是一口很大的水井。民兵听到扑通一声，跑过来看，大叫：“哎呀，钟季卿跳井了！钟季卿跳井了！”他们把母亲捞了上来。民兵们来叫我们去看，母亲浑身是水，双目紧闭，像死了一样脸色惨白，脸上被毒打的伤痕青一块紫一块清清楚楚。他们把母亲提起来倒水，腹腔



碉楼遗址

内的水倒出后，母亲又慢慢活了过来。

没过多久，一天早上民兵来喊我：“你妈找你，快去。”我跑去，母亲轻声叫我的小名：“安娃子，你把我扶去上厕所。”我当时只有11岁，还不能预料到要发生什么，就扶着母亲去厕所。所谓厕所，就是猪圈旁搁两块木板而已，这就是地主家的厕所。我把母亲扶进去后就出来在外面等。过了一阵，我想，母亲怎么还不出来，就喊：“妈！”没人答应。我从缝缝往里看，没人。我再往里看，在猪圈尽头的一根梁上，母亲已经悬梁自尽了，我当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永安讲至此泣不成声）



碉楼遗址（左边房子后面就是钟季卿遇难之

民兵们闻讯赶来，我母亲已经停止了心跳，民兵们大骂：“这种坏家伙死了当死个蚂蚁！”又转身对我么叔（他也是地主）说：“胡长生，把你大儿胡永康喊来，把她裹个篾席席拖到荒沟沟去，这种地主，遗臭万年，不能埋在崖上院子周围。”

我跟着去送母亲，走过丘陵田坝，下到荒沟里，在一个长满荆棘野草的地方，么叔说，就在这里吧。

就这样草草埋了我母亲。

五，我美丽的姐姐

我姐姐叫胡秀华，从县女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下川东的最高学府——著名的四川省万县师范学校。她成绩优秀，学校还发匾奖励过她。姐姐从师范毕业后不久就遇到忠县“解放”，她被安排在石黄小学当老师。由于姐姐在外面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加上她受过母亲的良好熏陶，所以她秀外慧中，温柔贤淑，有一种高雅的气质。很多年后我在县科委工作时，当年石黄小学的炊事员调到了县政府，他听说我也是石黄一带的人，问：“胡秀华是你的姐姐？她当时好漂亮哦，穿着裙子从我们门前过，全村的人都追着看她。唉——”

姐姐每年寒暑假回家来，都要教我读英语，教我唱歌，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唱《五月的风》，这首歌表达的感情是人间的和平，歌词是这样的：“五月的风吹在天上——哎，我要唱起才晓得歌词。”（胡永安随即唱起了《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
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儿确有知，
懂得人海的沧桑，
她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是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她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现在想起来，这首歌好象就是为姐姐写的，她后来真的是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也真的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她的歌声好象已经预示了她将要遭遇的劫难。

姐姐最心疼我，我小时生病，姐姐背着我去看病，我伏在姐姐的背上，听她轻轻地唱着歌，走过一片片田野，那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姐姐在我心中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美丽，她的歌声是那么的婉转动听，谁知道她后来的遭遇会那么惨。



1959年，胡永安（右二）在演出中

一天，姐姐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冲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把栓牛用的很粗硬的竹索往姐姐身上一套，五花大绑押了出去。我姐姐惊吓不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关进了乡政府的临时监狱。

原来，有人检举我姐姐解放前曾经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是反革命。

这中间的原因非常荒唐，总之，绝对是诬陷，不久就查明姐姐不是复兴社成员，但是教师职业已经没有了。

“她总不是好东西，放回农村去！”就这么一句话，就断送了我姐姐的一生，姐姐的厄运开始了。

村里的农协会主席成善天这时已经很威风了，他居然想我姐姐给他的傻瓜儿子当老婆。他儿子叫成世怀，长得莽粗粗（傻乎乎）的，没有文化，比我姐姐大十多岁，因为又傻又丑一直找不到老婆。我记得很清楚，成善天三天两头跑到我家来坐起不走，要我母亲把姐姐嫁给他儿子。我母亲说：“我怎么能做主，要看她自己。”成善天开始还客气，后来就威胁：“你们看到没得，地主马上就要日子难过

了哟，如果你们和我成了亲戚，我帮你们撑起，可以帮你们过关，你们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果就不堪设想哟！”我姐姐坚决不同意，说：“我再嫁不到人也不会嫁给他呀。”

成善天怀恨在心，果然，在随即开展的土改运动中他借机报复，把我母亲和姐姐双双关进了恐怖集中营。

六，我姐姐之死

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姐姐在恐怖集中营里痛不欲生，而且更加孤独。一天深夜，民兵忽然大叫：“胡秀华，出来！出来！有人检举你把金子藏在观音庙的神龛后面，快带路去找！”

——他们为什么白天不去找？！

他们把姐姐抓出来，推进荒山里的那个观音庙里，关上大门，十多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轮奸！

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之后他们天天这么干。没多久，姐姐就完全不成人形了。但是还没完，他们还没尽兴，又想方设法地发泄。

一个当年的翻身农民，也就是从山上下来分我们田地房屋的人，叫蓝贵平，后来和我同在县科委工作，一天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亲自给我讲的。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蓝贵平：“胡主任，有件事情我早就想告诉你，不好开口。”

我：“没关系，我们是一个村的，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你说吧。”

蓝贵平：“你知道你姐姐是怎么死的吗？”

我：“我知道一些，是被那些野兽活活轮奸死的。”

蓝贵平：“轮奸倒是小事，还有一些做法你不知道哟。”

我：“还有什么做法？你说。”

蓝贵平：“那些参加过轮奸你姐姐的人亲口给我讲：蓝贵平啦，那时你还是个崽崽（即娃儿），要是大一点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过干瘾了。我问什么过干瘾。他们说，地主的嫩女我们可以随便糟蹋呢，那些糟蹋的方法你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把地主的嫩女衣服脱光了，把两只手用牛索子捆在四柱床两边，再把大腿分开，用竹签子，铁签子，只要拣得到的东西，都往下身插。这边在插，那边在哈哈大笑：深不深？还有好深？哈哈，哈哈，这才好耍呢——”

（胡永安讲至此悲愤难抑，泪流满面。）



这些难道不该记录下来吗？要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此荒唐如此恐怖的一幕，不能让后人忘记。以史为鉴，这就是历史。

听了蓝贵平的讲述，我才知道，怪不得我姐姐没多久就被活活整死了，原来是这样残害的。

我记得，到了快折磨死的那一晚上，他们才命令两个地主婆把我姐姐背来，深更半夜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姐姐披头散发面色惨白枯瘦如柴，裤子被鲜血染红了，周身摸起冰冷。地主婆把姐姐放下后说：“安娃子，今晚上你要好好照顾你姐姐哟，看她今晚晚上扳（活）得过来不。”我那时小，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晓得晓得。”

我把姐姐放在床上把她盖好，我睡一头她睡一头，我脚伸过去挨到姐姐，她身上冰冷，没有一点热气。起先还有微弱的呻吟，后来就没有一点声音了。我去端水给她，问她喝不喝，她说不出话，也不能伸手接水，我就只好算了。

小娃娃瞌睡多，等我早上睡醒时再去摸姐姐时，她不光是冷冰冰的，而且是硬邦邦的了。我大喊：“姐姐！”她不答应。我探她的鼻孔，没有任何气息了。我当时又是哇的一声大哭，把弟弟也哭醒了。我说：“弟弟，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姐姐死了！”

我们的哭声惊动了那些强奸犯们，他们听说人已经死了，又是那一句话：“这种坏家伙死了当死个蚂蚁，快丢到山沟沟去。”又派我么叔胡长生和他大儿胡永康两个用个烂席子把姐姐拖到荒沟里去，与前几天埋在这里的母亲埋在一起。1958年大炼钢铁，到处砍树，母亲和姐姐的尸骨被挖出来抛到荒沟里，我现在就是想悼念她们都找不到地方了。



胡永安痛苦得敲打自己的头

中国对于人权的摧残有哪一朝哪一代做得这样绝这样彻底！

（胡永安讲至此声泪俱下，痛苦之极。他夫人张永芳为他拭泪，并说，他每次讲起姐姐都伤心掉泪。认识他姐姐的人都说她长得漂亮，又能干，又温柔，死的时候她还没满二十岁。）

七，我的《思乡曲》

我没有办法悼念我的母亲和姐姐了，只有用诗歌来寄托我的哀思，我写了一首《思乡曲》，第一段是：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

故乡留下我童年的血泪。
几度山花红，几度清水涌。
以往的惨景依然在我胸中。
他乡山虽明，他乡水再清。
也难慰平我破碎的心。

第二段是：

故乡的树，故乡的木，
魂牵梦萦那参天的白果树。

（念到这里，胡永安说：我这一段主要是控诉当时的政权是怎样破坏环境的，我们那个环境很美呀！）

几度风雨骤，几度冰雪酷。
以往的美景荡然无复。
古树有何罪，秀木有何辜？
也同主人一同惨遭荼毒。

（胡永安哽咽不已，念不下去，他说：“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可爱的白果树了。白果树？连人都要整死，莫说白果树。”）

第三段是：

故乡的泥，故乡的土。
泥土容不下母女的冤骨。
冤骨抛荒野，冤魂夜夜哭。
凄厉惨烈，揪人肺腑。
苍天你有眼啊，大地你作证。
何年昭雪这尘封的奇冤？！

（“希望渺茫，渺茫！”胡永安挥着手说。他停下来努力使自己平静，过了一会才从极度的痛苦中慢慢喘过气来。

注：胡永安讲述时的悲苦可从纪录片《血红的土地》中第七集里看到。）



破败的胡家院子（2016年8月）

八，我老师的一家

我小学语文老师成正安和我同村，是北平大学毕业的才子。早年他在北大读书时曾经参加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不久他良心发现，觉得加入共产党没有意思，他左思右想，觉得不大对，就在当时的——好象是什么《北平晚报》——上登

了一则退党声明，这件事过去了很久，也没有人说什么，解放后他被安排在石黄小学教书，当我们的语文老师。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成正安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忽然乡长带着一群民兵持枪冲进学校来，像杀牛匠一般的大叫：“成正安，出来！”

“我正在上课呀。”成正安老师说。

“你上啥子课哟，你这个坏东西！”乡长怒喝。

乡长回头对民兵大叫：“给我捆起来！”

立即有几个彪形大汉扑上去用牛索子把成老师五花大绑起来从教室里拉出去。正在听课的孩子们吓得绿眉绿眼（目瞪口呆）的，一向讲课讲得非常好的老师怎么成了坏家伙呢？

校长赵固国赶忙到教室里来说：

“同学们，安静安静。这课我继续上来。你们不晓得，这个成正安，是个现行反革命，是共产党的叛徒，叛徒格杀勿论，你们就不要同情他了。”

不到一个星期，成老师就被枪毙了。枪毙他的地方特别选择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好让他的学生都看见。

成老师被枪毙后，他的妻子也被抓来关进了碉楼恐怖集中营。经过反复吊打，她在一个深夜里自杀了。

成老师的独生儿子叫成守义，在丰都一所学校读高中，因为解放，还没有毕业就回到了老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守义先后失去了父母双亲，其痛苦可想而知。谁知土改民兵们连他也不放过，把他也关进了恐怖集中营。把他关起后民兵们意外地发现，成守义竟然还有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妻子，叫钟云珍（官坝人，是我表姐，我母亲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就把钟云珍也抓来，同我姐姐、还有一个黄生莲（我音乐老师的妻子），关在一起。

民兵们看见这些年轻女子相貌都漂亮，顿起歹心，天天晚上一个接一个地轮奸。

我大伯母是恐怖集中营的幸存者，她目睹了那极其残忍极其下流的一幕。她那次到我家来，一说起就痛哭流涕，直到现在还惊心动魄。大伯母说，那时还没有电灯，到了晚上，碉楼里搞土改的民兵们用火柴照，一个一个查看，哪些是年轻女子，哪些是老的。有一次，照到了我大伯母，一看是个老妇人，就“啵”、“啵”地甩了两耳光，说：“滚到一边去，不准出声，出声就把你枪毙了！”哪个还敢出声！就装睡着了。睡在大伯母身边的就是我表姐钟云珍，他们一看，很年轻，一招手，十多个民兵一轰而上，轮奸！



土改酷刑之一：（冬天）“吹土电扇”

恐怖集中营里就是干的这种事！

有人说重庆渣滓洞集中营里很残忍，但是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把江竹筠和其他女人拿来轮奸嘛，最多就是肉体刑罚而已。土改这些罪行远远超过了渣滓洞集中营。

九，成守义之死

几番轮奸后，民兵们认为钟云珍的老公成守义也关在碉楼里，行事有所不便，就决定先把成守义折磨死，免得碍事。

怎么折磨呢？这就是我亲眼目睹的了——碉楼里的事情我是听讲的，但是成守义被折磨死我是亲眼所见。

一个三伏天的晚上，天气非常炎热，民兵们把成守义拖出来用柴火烤。把我柴屋里的大柴搬出来架起猛烧，把成守义推到火堆前去烤。看到看到，成守义身上的汗水像洗澡落雨一样，地下湿了一滩。烤了一阵，哗的一瓢冷水给他一泼，又继续烤。民兵们大喊：“推拢去些！推拢去些！”意思是推到离火焰更近一些的地方去。一会，成守义的鼻子尖尖起了燎泡，又一瓢冷水给他泼去，他就咚地一声倒地，去晕死了。

这时不能再烤了，就喊两个地主：“把他抬回碉楼去关起！”

第二天晚上又想了新花样来折磨，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

他们用牛索子把成守义反绑起来，牛索子是竹子做的用来套牛的索子，一旦捆了很可能终身残疾。然后把他反吊到一棵很高的柚子树上，成守义像鬼哭狼嚎一样地惨叫。上半夜，成守义一直不停地地叫，后来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就听不到声音了。第二天一早，民兵下来撒尿，看见吊在树上的成守义垂着头没有声音，去摸，还是没有反应，就说：“你装起哪个样子，脑壳一啄起（头朝下），装死啊？”说着顺手甩起枪托一冲，成守义被冲得像秋千一样来回荡。呃，怎么叫都不叫一声？一摸鼻孔，没气了。

民兵队长叫成世清，他听说成守义没气了，从碉楼走出来不慌不忙地说：“不是哦，年轻人哪里这么不经整，这样整一下就死了，是不是装死哟。”他去摸，才相信是真的死了，又是那句老话：“这种人，全家死尽死绝都没有关系，当死个蚂蚁。抬到沟里去甩了。”成守义当时才二十岁，结婚不久，就这样惨死了。

民兵罗成龙看到时机成熟了，就想霸占成守义的妻子，他晚上到碉楼去给钟云珍说：“你嫁给我，你老公已经死了哟，如果你不干，胡秀华就是你的下场。”

钟云珍不答应，可能通过什么方式托人给她哥哥钟云德带了信。钟云德解放前在官坝小学教书，思想比较激进，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后来当兵出去，这时已经在贵州当了个团长。钟云德听说了妹妹的消息，火速请假回到老家。

他知道这件事搞不好自己的官帽子都要出脱，就很巧妙的去找官坝区的书记王某，说：“我妹妹是封建包办婚姻，是地主钟季卿做媒，强迫嫁给成守义的，她本人根本就不同意，我们怎么会让她去地主家受剥削压迫呢。我强烈要求政府把我妹妹从地主的魔窟中解救出来。”王书记是个北方人，一听，说：“怎么还有这种事情，那我们要把这个贫下中农的子女解救出来。”



胡家大院残存的一个角落

其实钟云珍也不是贫下中农，她是小土地出租——小业主，我的舅舅中只有她家不是地主，其余都是地主。

钟云德手持区委的公函到碉楼里，民兵们乖乖的放了钟云珍。钟云珍后来嫁给一个供销社的干部迁到了县城。有一次我到她家里做客，谈到往事，她讳莫如深，叫我不要谈这些，说：“安娃子，过都过去了。”

大概是前年，钟云珍去世了。

成正安老师的一家就这样完了。八十年代平反冤假错案，发现成正安不是反革命，有关部门去官坝给成正安落实政策，发现他一家都死绝了，没有一个人，落实政策给谁呢，也就算了。

十，恐怖集中营

恐怖集中营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厉害，碉楼里总共关了我家两个、我大伯母一个、成正安家两个、钟云珍一个、成从仁一个、黄生莲一个，最多不超过十个，竟然被整死了五个，超过希特勒对犹太人屠杀的比例！

前面说到了我母亲、姐姐、成正安妻子、成守义在恐怖集中营的惨死，还有一个是成从仁。

成从仁其实算不上什么地主，只有一二十亩田地出租，但是那时是想地主越多越好。一个邻居以前与他有私人成见，土改时那个邻居当了民兵，想霸占他的财产，就借机报复杀人。用什么办法杀呢，也是采用“找金子”的办法。两个民兵硬说成从仁把金子埋在岩脚下——他哪有什么金子，不过是借口而已——把成从仁押到一个悬崖边上时，一个民兵从后面用枪托猛地一冲，就把成从仁冲到了悬崖下，当场摔死。

民兵回来交差说：“这个家伙好反动，反动透顶，拒不交出金子，自己跳岩死

了。”后来民兵自己说出了真相：成从仁是被枪托打下岩去的。

土改是我所知道的最血腥的运动，它采用最下流最残暴最野蛮的手段去侮辱与迫害一些没有任何罪过也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一个普通的民兵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在人类朝着文明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如此黑暗如此野蛮如此残暴的迫害是不可思议的。台湾也搞了土改，但实行的是赎买政策，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而我们是政府教唆兽行泛滥无法无天，想枪毙就枪毙，想打死就打死，践踏人权破坏环境。

既然是历史，以史为鉴，就要如实地写下来，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要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走过一段极其黑暗极其悲惨的路。司马迁当时写《史记》时要记录汉武帝的一些事情，汉武帝威胁说：“你要这样写，怕脑袋保不住哦。”司马迁回答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还是坚持写了。

采访时间：2006年1月14日

地点：成都市新华小区

采访后记

胡永安是地主子女中少有的有文化的人，因此他的讲述很清晰，他的遗传基因和所受的教育也让他具有一种儒雅气。但是，在讲述他目睹的那些暴行时，他反复地用了“禽兽”、“野兽”的词语。

在讲到他姐姐之死时，他哭得透不过气，他妻子安慰了他好一会他才平静下来。

“这么多年了，只要一提到他姐姐，他就要情绪失控。”他妻子说。

（注：朋友陈先生为采访胡永安出了不少力。）



“中国对人权的摧残哪一朝哪一代做得这样绝这样彻底！”

补记：

2005年11月，高智晟律师与焦国标先生一起，赴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吉林长春和辽宁大连进行个案调查。其调查报告披露了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使

用的一些下流而残暴的手段，如：被侮辱阴部且被折磨得昏死过去的项敏，被警察掐乳头揪阴毛用刷子捅阴道的常学霞，被用系上扣的绳子和折断的拖把蹂躏阴部导致大出血的王丽君，被反铐并把燃烧的烟头强行插进鼻孔的魏纯……

高智晟律师说：“我用颤抖着的心、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地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 610 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地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几乎是百分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几乎所有的被迫害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那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高智晟记录的这种下流和残暴手段，早在 50 多年前的土改时就广泛地实施在地主、富农身上。只不过施暴者由当年的“土改工作组”、“翻身农民”、“民兵”、“土改积极分子”等改为了现在的“610 人员”和身着制服的“人民警察”。



胡永安的家乡

树，砍光了；人，整死了

讲述人：吴江法
土改时分胡家财产的农民
原永安村四队生产队长



在川东三峡地区，有非常迷人的自然环境，那儿的乡村田舍，曾有天人合一的宁静秀美。轰轰烈烈的土改，不仅杀人掠财，也破坏了中国乡村的自然美景。胡永安家的院坝里，曾有两棵参天的白果树和两棵巨大的桂花树。

我们家是土改时从十多里外的复兴寨迁来胡家冲的，这儿的地主多，有30多个，后来复查又补划了三个漏划地主：田朝元（音）、陈世值（音）、冯布三（音）。补划后就没收他们的财产，过年猪拿去卖了，房子给他没收了。

我们一共有13户70多口人分了胡家的房子和田地。我们家5口人，每人分两担谷的田，共分了10担，当时每担谷是340斤。

我家还分了胡家的猪圈，就在碉楼前面。

当时是有两棵大白果树，很高，这前面有一根，从这个坎坎过去，那房子外面有一根。白果树一个人抱不了，后来被砍了。除了白果树，还有两棵很大的桂花树，桂花树也是一个人抱不了，有这么大。

杨启林（土改时分胡家财产的农民）：

从外面梯子上来，外面一棵，这儿一棵，好看得很，八月间，桂花香，满院子香得很。

吴江法：

桂花树我砍了一棵，另一棵本来也是在我分的房子前面的，但另一家说，那棵树离他的房子近一些，于是他就把那棵树砍了。

土改时胡家的碉楼作了永安村的办公地，十多年后被拆了，政府把木料卖了300元，卖给了十几家私人。碉楼的石料被几个生产队分了。



“白果树以前就在那儿”

我们石黄乡以前有三个有名的建筑，一个是那个庙子，那里面的菩萨比梁平县双桂堂里的菩萨都还要多。第二是官坝的高牌楼，那牌楼很高，也有这个楼子这么高。第三就是这个碉楼。现在一个都没得了，都被拆了、毁了。

土改时胡家的这个碉楼用作永安村的办公处。地主就关在碉楼里，每天晚上抓出去斗，就在后面那个大坝子里开群众大会，我当时十来岁了，跑去看，地主一个个捆起用棒棒打。

我亲眼看到整死了四个人。一个叫成叔伦，他80岁了，整死了从楼子上推下来，脑壳都摔烂了。另一个叫成守义。当时我就住在碉楼外，听见里面砰砰嘭嘭打人的声音。我进去看，成守义手这样捆在柱子上。碉楼里有四根柱子，中间是个天井。成义方和成世清两个人，一人拿个斧头棒，像打猪一样，或是像砸麻绳子，砰砰砰你一棒我一棒地“鸳鸯”打。成守义还没死，于是又把他弄出来吊起，吊在那棵桂花树上，他的手吊得肿泡泡的。还是不死，于是又把他吊到那棵柑子树上，最后吊死了才把他拖到碉楼沟沟里。

楼子里我看到整死的四个中，胡永安家就占了两娘母，他的妈钟季卿和他姐姐胡秀华。钟季卿被打得惨，说她家有金豆子，要她交金豆，交罚款，以这个为名，才打得下手。那天她去解手——就在分给我的这个猪圈里——猪圈当时作为碉楼办公处的厕所。民兵押她出来，在这个坝坝看守。她在猪圈里用裤腰带系在脖子上，一只脚还在地上，就这样就断了气。

胡秀华也被整死了。贫协主席的儿子成世怀要她嫁给他，胡秀华很硬气，她说：“我情愿被打死不愿意羞死。”斗她的时候，成世怀专门踢她的下身，哈哈——那个时候斗地主，哪个越下得了手，越积极，就是积极分子，入党呀，哈哈——



杨启林：桂花树好看得很



杨启林：这儿就是当年的碉楼

采访时间：2016年8月9日

地点：忠县石黄乡胡家冲（胡家大院）

采访后记

十年前，在成都采访胡永安时，他的讲述（哭述）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十年后，我决定把土改的采访录像做成纪录片，为此，专程去胡永安的家乡忠县石黄乡拍摄外景。

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胡家大院。

大院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胡家也早已没有一个人住在这儿，只有在石坝（当年开批斗大会的地方）的右上角落，还残留着一点胡家当年的住房。

石坝右后方的那个碉楼（即胡永安说的土改时的“恐怖集中营”）也早已被拆毁了，原址上只残留着一排当年的基石。

吴江法和杨启林老人，指给我看当年白果树的地方，又带我到碉楼遗址前，讲起碉楼的命运和故事。

采访完吴江法老人后，我又走到碉楼遗址前。

遗址上，荒草萋萋，夏虫唧唧。田野风来，一丛翠竹轻摇曼舞，伸向寂静的天空。

六十多年前石坝上斗争大会的喧嚣和火热早已消失；

六十多年前碉楼里鲜活生命的惨叫和死亡早已遗忘。

六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作恶者、杀人犯受到追究和惩罚；

六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一个受害者、遇难者受到赔偿和祭奠。

那个宣称自己伟大的，依然在伟大；正确的，还在正确……

“那个时候斗地主，哪个越下得了手，越积极，就是积极分子，入党呀，哈哈——”



原图说明：
广东省中山县土改后许多优秀的农民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一个小心谨慎的翰林后代

讲述人：施曾廉

重庆水轮机厂退休工程师

1941年生

我们施家在涪陵曾经是一个很显赫的家族，爷爷是“湖广填四川”来到涪陵的，落户在珍溪镇。爷爷发奋读书，后来当了清朝的翰林。他的大儿子，即我的大伯，也当了翰林。小时候，我记得在我们施家大院的大朝门上，挂着皇帝赐予的匾额《父子翰林》。哪个皇帝我不晓得，爷爷和大伯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

（注：我在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涪陵市志》上查到了“父子翰林”的情况，详见本文后面。）

我本人出生在重庆市市中区张家花园，即现在的中山医院那个地方。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我们全家迁到乡下珍溪老家居住。这时爷爷已经去世了，只有他的小老婆王德清同我们住在一起。

我父亲施乳鹤在我很小时就病逝了，那时妈妈正怀着我的小弟弟。很不幸的是，妈妈又难产，母子二人没有保住。就这样，不到一年，我失去双亲，我和弟弟施曾广成了孤儿。那时，我们全家靠一个叫曾玉芳的女佣人操持。曾玉芳原来是四川铜梁的一个农民，她丈夫上了前线，战死在抗日战场上。曾玉芳流亡到重庆打工，我们家雇用了她，轰炸期间，她又随我们来到涪陵乡下。

在我10岁那年，共产党来了，搞土改。我大伯的二儿施仲渝被抓起来打（枪杀）了。他哥哥施孟怀刚好在解放前夕被土匪杀了，否则也要被共产党杀。施家总共被杀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我太小，记得的有一个堂哥叫施伦（音），他是镇长，被杀了。还有一个名字记不得了，只知道他儿子叫施祖光（音），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当了一个小官，部队在泸州起义投诚了共产党，他不了解农村的情况，还回到乡下来，结果送了命。当时，越是基层的小官越容易遭（殃），官当得越大越没事。

（施曾廉见我追问姓名和详情，赶紧说——）

一个政权建立，是要杀人来巩固，不杀人上面要怪罪，杀错了上面不追究。

那时，我们这房的人，除了我们两兄弟，就是我婆婆王德清和女佣人曾玉芳。婆婆自然划成地主，把她抓去斗。但婆婆年岁大了，她在家也不管事，那些人于是又把曾玉芳抓起来，又斗又打，要她交出金银。曾玉芳（我们后来叫她“伯伯”）是个很不幸的女人，年轻守寡，又无子女，她把我家当作自己的家，把我们两兄

弟当作自己的孩子。土改我们被赶出来，衣食无着，她不离不弃，天天去背煤炭，换一点包谷（玉米）来供养我们。

伯伯见情况危急，求人（她不识字）写信给我当年在重庆的奶妈，求她来把我接走，救我一命。我奶妈姓况，是一个贫穷的劳动妇女。她穷得连到涪陵的路费都没有。她喂养了几头猪，唯一的办法只有卖猪。很奇怪，那几天猪突然不吃食，不吃食的猪是卖不掉的，因为买猪的人要给猪喂食，以查验猪是否健康。

奶妈把猪牵到市场上去，心想，要是猪卖不掉，就只好不来接我了。咦，你说怪不怪，买猪的人倒了两瓢食，几天不吃食的猪突然吃起来！

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了！我这辈子两个大恩人，一个是“伯伯”，一个是奶妈。

我进了城，成了城市人口。我弟弟被他在农村的奶妈接走，他从此一辈子在农村，日子当然十分艰辛。

我走后，婆婆很快就饿死了。她六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一双小脚，被迫出去讨饭。她娘家也是穷苦人，她当初到施家是当丫环，被我爷爷收为小房（小老婆）。她没吃的，出去讨饭，没有人敢给她，三亲六戚都不敢给，她是地主婆，要划清界限。她到她弟弟家去讨饭，她弟弟的子女们还拿棍子打她。婆婆失去一切生活来源，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进城后，有人对我奶妈说，叫我把名字改了，同她家姓。奶妈回答，他今后长大了要认我当妈，不改姓也要认；不认，改了姓也不会认。所以，我一直姓施。

我的出身成份也没改，一直填的地主。在那些年，这个出身是很要命的，升学、就业都很难。不过，幸运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初中毕业时，正遇到1958年“大跃进”。办学也要“大跃进”，能办两个班的，扩大一倍，办四个！这样招生量就猛增。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个猛增。当然，也不完全是幸运，还有我的“聪明”——初中毕业前，学校（在化龙桥的市2中）发了一张调查表下来，问：你认为学校该为什么人办，标准是什么等。我回答，应当为工农和他们的子女办，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标准。我们班上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同学，他回答应当以成绩优良为标准。结果我升上了重庆机器学校，那个同学则下放长寿湖农场劳动。

你不要笑，我这辈子能平平安安活下来，全靠我万分的小心谨慎，当缩头乌龟，夹起尾巴做人。该说的话我不说，不该说的我更不说。那一年，我大哥施孟怀的女儿施祖珮（她解放前去了台湾）从加拿大写信回来，打听她父亲的情况。信经过层层审查后交到乡下我弟弟手里，弟弟来找我，叫我回封信，我坚决不干。为啥？说不定有人就抓住这事定我一个里通外国罪。那个年代抓人整人很随便呀。我们水轮厂仅“文革”就打了106个“牛鬼蛇神”。

现在？现在我也不多说。前两年报上刊登了我们施家祠堂，有人叫我找律师去把房产索要回来。算了，算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打我一个“反攻倒算”罪。

算了，算了！

（注：“反攻倒算”是共产党多年来强加给地主和其子女的一个罪名——只要你对被抢走的土地和财产表示一点异议，就是“反攻倒算”罪。）



施家最后的遗存——施家祠堂。现作为镇政府幼儿园

施纪云（1852—1929）字鹤笙。涪陵珍溪镇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北无偿、施南、襄阳、德安知府，施鹤、安襄、郟荆兵备道道台，国史馆总纂兼总复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涪州师范学堂总教习。宣统二年（1910）奉命督办川汉铁路。民国14年倡修涪陵文庙，受到进步人士反对，未果。同年应县知事请求，负志书局之责并总纂《涪陵县续修涪州志》。17年任县团练总办，未久即卸任。病故。（《涪陵市志》1531页）

施愚（1875—1930），字鹤雏。涪陵珍溪镇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游学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等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考察宪政大臣顾问，嗣任山东巡抚顾问。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清政府宪政编查馆科员，后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总办。宣统三年（1911），任奕劻内阁弼德院参议、法制院副使。民国成立，施愚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民国3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员、副议长；5月任政事堂法制局局长；6月任参议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持起草天坛宪法，并任参议院参政。民国8年2月，施愚作为北方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谈判。民国14年8月，被临时选聘为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16年1月，任安国军总司令部政治讨论委员会委员。施愚晚年潦倒落魄还乡，挂名《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修纂。民国19年，病死于涪陵珍溪镇老家。

（《涪陵市志》1511页）

采访时间：2006年3月18日

地点：重庆市李家沱秦妈火锅馆

采访后记

据介绍人赵纯友老人说，施曾廉一辈子胆小，尤其是有（政治）运动来，更是心惊胆颤，因此，如果说是采访，他肯定有顾虑。于是，我们以吃顿饭、聊聊天方式坐在了一起。我不作任何笔记，也不照相，先以我母亲是涪陵人的故乡情同他套近乎。

杯箸交错、乡情故土、小火熬火锅、大口喝啤酒，总算慢慢了解了一段“不温不火”的往事。

地富“摘帽”已20多年了，施曾廉仍然害怕那个“反攻倒算”的罪名。接受采访，谈过去的往事，会不会是“企图反攻倒算”？

那些年，在报纸上、在广播里、在专政机关、在官员的讲话中，常常有这些杀气腾腾的语言：“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人还在，心不死，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对企图反攻倒算的地富分子，我们要坚决镇压！”

一个强盗，如果不仅抢走别人的财产、不仅杀死财产的主人（杀人越货），而且还能让被抢者一想到去讨还财产或者呼一声冤枉，立马就惊恐要“犯罪”，那么，这个强盗的“匪功”的确登峰造极，算得上史无前例了。

注：因故隐去施曾廉的采访照



施家公馆大朝门前残存的石阶



施家大朝门公馆最后的遗存

显赫施家最后一个守墓人

讲述人：施曾广
重庆涪陵珍溪镇方家村农民
1943年生



“我从小就很聪明”

一，共产党来了，拆公馆、挖祖坟

我爷爷老翰林和我伯伯少翰林在我出生前都去世了。我听说爷爷回乡时很荣耀，还铺了地毯，从码头一直铺到我们施家公馆。公馆修得很是气派，很大，书园、果园……门窗、屋梁到处雕花，还有各种各样的匾额，几十块，有的还涂得有金粉。最显眼的是皇帝赐予的“父子翰林”，那块匾我记得，挂在大朝门上，文革“破四旧”时被砸了。乡下嘛，不文明，你们城市里要好些。公馆在1963年被珍溪区粮站拆毁了，他们需要木料修仓库。现在施家只剩下一个祀祖的祠堂，被镇政府幼儿园占了。10多年前，上面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干部下来检查工作，看到祠堂古色古香，问是谁修的，别人说是施家。又问施家还有没有后人在，他们提到我。检查的干部说，按政策祠堂不能没收，应当还给施家。我当然想要，但我不敢。我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些运动，土改、三反五反、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文革。我成分不好，地主子女要翻案？说个内心话，我怕。

土改时我还小，七、八岁。打（枪杀）人的场面我害怕，没敢去看。印象最深的是敞（挖）我爷爷的坟。那天去了一大帮人。农会说（坟）里面是个翰林，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

坟修得非常坚固，石缝都是用糯米粘连的。丁丁当当打了一整天才打了一个洞。坟里面是一个大大的阴沉木棺材。那个棺材我晓得，是武隆县送来的。爷爷生前在武隆秉公断了一个案子，当地人感激他，送了极其珍贵的阴沉木。接下来开棺材盖子。嗨，就是打不开。叫石匠来用鑿子打，打不开，又用开山（斧头）砍，最后又用撬杠，折腾了半天才打开。阴沉木棺材里面又是一口小棺材，打开小棺材，才露出尸体。我从大人们的胯下钻进去。爷爷睡在里面，好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爷爷埋了几十年，完好无损，脸上皮肤都是好好的，胡子长长的一直垂到胸前。

但是，没有发现金子和其它财宝，手上、脚上都没有。于是开始撕衣服，看他胸口上挂没挂金片。衣服也是好好的，据他们说穿了20多套。他们撕了大半天才

把衣服撕烂，还是没找到金子。接下来撬嘴，用的镰刀，看嘴里含没含金豆子。还是没有。不过，发现了一颗金牙，农会的人把金牙撬下来拿走了。除此之外，爷爷身上还挂有两串珠子，他们摘下来，拿出来一抖，绳子腐了，珠子滚落一地，这个（人）捡一颗，那个（人）捡一颗，算是分了（胜利果实）。

敞爷爷的坟，整整费了两天功夫，没得啥子搞头（收获），就这样，保住了施家其他的坟，包括爷爷旁边我婆婆的坟。

二，扶养了三代“地主子孙”的贫农妇女

曾玉芳是我们家解放前雇的一个女佣人。她以前是铜梁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到我们施家后当女佣，做长工。土改的时候，农会叫她站出来揭发检举我们。我记得区公所下来一个姓胡的女同志，反复动员她，说她是贫下中农，受压迫受剥削，我们是地主，是剥削阶级。要她同我们断绝关系，不仅不要再管我们，还要积极斗争、揭发。

曾玉芳这个人很老实，是哪个就是哪个，从不乱说。她说：“施家从来没有虐待过我，也没有把我当下人看待。”农会的人说她包庇地主，把她抓来斗打，要她说我们把金银转移到哪去了。其实，那时我们家因为抽鸦片已经败落了，到了典当家什的地步。农会的人认为曾玉芳不老实，把她反捆起来吊“鸭儿鳧水”。那是很惨的呀，脚不沾地，把她的手都吊断了。

尽管如此，曾玉芳还是照管我们。她晓得，她不管我们，我们就要饿死。那时我们被赶出来住到一个棚棚里，我和哥哥还是娃儿，婆婆（她是爷爷的第四个老婆）60多岁，没有生存能力。曾玉芳去背煤炭供养我们三口人。100斤煤炭才3角钱，要走二、三十里路。她一次只能背50斤。挣1角5分钱。她看这样下去活不出来，就请哥哥当年的奶妈来把哥哥接走，逃一条生路。我记得她一趟又一趟地去找农会开证明，又一趟一趟地跑乡政府，求他们办迁移证。受了很多气呀。最后送走哥哥时，要5块钱船费，曾玉芳把身上的两件衣服脱下来卖了，凑足了路费。

我最初跟了我乡下的奶妈，她姓罗。但她家娃娃多，生活很困难。没办法，曾玉芳收养了我，从此同我生活了一辈子。后来我结婚生了娃儿，全部是她带，她照料得精细呀，比自己亲生的还好。我



曾玉芬（中）与她精心扶养的施家三代人



不幸的施三

三个娃儿都是她带大的，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尤其是照顾我残废了的三儿施三，天天给他喂饭。他怎么残废的？说来伤心。施三是我三个儿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文革期间，他生病发烧，我把他送到珍溪镇医院。当时镇医院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姓罗，医术高，但是，搞依成分论，罗医生出身不好，把他下放到乡下去搞结扎（绝育），另外把一个护士提起来当医生，她叫汤国芬（音），她出身好，当了住院部医生。我们把三儿送去，是汤国芬收的，她见施三又吐又拉，就说是中毒性消化不良，给他打针退烧。退了三天都退不下来。后来，罗医生偶然回来看见了，悄悄说，这是典型的脑膜炎。

但是，汤护士管的病人他不敢治。再说，这时也晚了。我们去求一个亲戚，他是中医，也是地主出身。他叫我们用苦蒿磨水加鸡爪黄连给施三灌下去。当时施三牙齿咬得紧紧的，我们撬开嘴把药灌下去。咦，慢慢他舌头能动了。就这样，三儿命保了下来，但变傻了，生活不能自理，手脚抖，吃饭要人喂。

再说曾玉芳，她带大了我的几个儿子，接着又带我儿子的儿子，又是精心照料，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有点钱，全部用在娃儿身上，给他们买营养品。唉，她这个人，说不出来那么好。

当然，我也一心一意报答她。在饥荒年，我们快饿死了，曾玉芳已经水肿。这个时候镇上一个干部叫我去学木匠，学木匠有点粮吃。我千方百计节省，每天省个一两粮，过两天就带回家给曾玉芳吃。那个年代，吃一顿饭就是大补药。曾玉芳因此活了下来。

前两年她去世了，活了90多岁。我隆重地给她办了葬礼，又请风水先生来看地，选了块好地方安葬了她。

采访时间：2006年3月24日

地点：重庆涪陵珍溪镇方家村

采访后记

从施曾廉口中得知他弟弟在珍溪乡下后，我即前往采访。

在镇外的路边，我向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农打听。

老农抬起头：“我就是施曾广。”

在我数百次采访中，从没这么巧、这么顺利的。

更让人高兴的是，施曾广热情而健谈。虽然完全是农民的衣着相貌，但他思绪清晰目光炯然——毕竟是大知识分子、赫赫翰林的后代。

他说，他从小就很精灵，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招人喜爱，所以，虽是地主子女，但没受什么苦。

他把我带到他八、九年前修的一幢三层楼房里，又一一带我观看了曾玉芳的坟、施家祖坟、施家祠堂，并指给我看施家公馆旧址和和残留的石阶。

曾玉芳的坟在半山坡上，初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坟上，我在这位善良忠厚的劳动妇女面前深深鞠躬。

曾经显赫一方的施家公馆早已片瓦不存，旧址上七零八落地修建着一些农舍和猪圈。唯有祠堂还在，虽然里面的碑文神龛和工艺雕刻荡然无存。

施曾广是施氏家族里唯一留守在故土的后人。在他之后，还有那位文革时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医治成呆痴的施三（施曾广的两个大儿已迁到涪陵城里）。从满腹经论、叱咤风云的父子翰林，到老农施曾广和呆痴施三，时代的风云化神奇为腐朽。

不知地下那位衣冠被撕裂、牙齿被撬烂的翰林大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会写出何等诗文。



我与施增广在曾玉芬坟前



施曾广在他祖先的祠堂前

惨叫声中的自刎

讲述人：熊建成

1955年生



“我一直怀念我奶奶”

我爷爷熊海林是开县陈家的一个地主，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乡绅。解放前我家算是富甲一方，住房都是雕梁画栋，充满艺术和文化。爷爷娶了三个老婆，最小的叫熊李福，也是我奶奶。我奶奶是县城里的名门闺秀，读过书，琴棋书画样样都会，人也长得漂亮，特别是受传统文化教育，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在那个大家族里奶奶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重。

我爷爷最宠爱她，同她生了十六个子女。我爸爸熊朝刚排行老七。

爷爷解放前就去世了，所以1950年土改时就拿我奶奶开刀，工作组把她抓起来，发动农民上台斗打。不料我奶奶在当地人缘极好，没有人愿意上台去对她下手。于是，工作组从外地找来一些流里流气的痞子，（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盛赞的人物）这些人下起手来狠毒。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说，最毒的是燃起火来烧奶奶的背，奶奶一声声惨叫，整个后背被烧烂！

我奶奶深得她所有子女的尊重，目睹母亲受刑，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在奶奶的子女中，她的第四个儿子即我的四伯伯熊朝刚性子最烈。母亲的惨叫让他发狂，但是他没有办法同强大的政权抗争，他跑回家中，抓起菜刀往自己的脖子上一刀接一刀地猛砍，鲜血溅满了墙壁。人们发现了，把刀夺下来，当天他没死。两天后，他仍然用刀砍脖子，这次，他成功了。

我奶奶当年没被整死，不是她的十几个子女救了她，而是当地的“贫苦农民”救了她。农民把她藏起来，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这样，1955年出身的我才有幸见到我奶奶（她1979年去世）。

我一直怀念我奶奶，我从没见过她动怒骂人，那种宁静、温和、善良、娴淑！现在很难见到像我奶奶那样的女人了。

我们家除了四伯伯外，三伯伯熊朝统也很不幸。三伯伯上过朝鲜前线，因只身

炸坦克立过功。转业后他在城里当了一个干部。1957年他成了右派，但没有开除他公职。1964年搞“四清”运动，突然把他打成“反革命”，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三伯伯回到乡下，觉得无脸见人，成天躲在家里不出门，几年后自杀身亡。

此外，熊建成的外婆（姓陈，开县天河镇人），因丈夫是地主，受到迫害，实在活不下去，于1955年自杀。

熊建成：外婆自杀时，我妈妈正怀着我，妈妈天天生气，流泪。我可能因此受了（胎教的）影响，所以我脾气很不好，容易动怒，一点没继承我奶奶的那种优雅和娴静。

采访时间：2005年1月31日

地点：重庆万州区熊建成家



广州郊区农民斗地主。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他吞下了他爹的脑水！

讲述人：赵纯友
原重庆水轮机厂退休工程师
1939年生



我爷爷从湖南来到重庆，最初靠卖汤圆为生，后来又在南岸区四公里开砖瓦窑，慢慢发了家，在市中区买了房子，开了当铺。你看过电视剧《九九归一》没有？我们家的情况同那里面很相似。此外还开有一家旅馆，就在现万豪宾馆那个位置，叫“卫渝旅馆”，有六层楼，记得小时我去玩，里面还有乐队演奏。当然，家里也在乡下购置了房产和田地。房屋在黄桷桠镇老厂，田土就在下面，当时叫王家湾、土庙子，即现在的工商大学和教育学院。我带你到工商大学来谈，就是想指给你看看我家当年的田地。

这儿真是一块好地方啊！山青水秀，田土肥沃，山上一一年四季有泉水来，从不天干，收成好得很，我爷爷就埋在那儿。

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我家在市中区较场口米亭子的八间房子全部被炸毁，那房子是从清朝一个败落了的大户人家买来的，很漂亮，可惜了。为了躲避日本飞机，我们迁到了乡下老厂，我在那儿生活、读书，直到1952年。

老厂当年是川黔的交通要道，街上很热闹，给马帮打铁掌子的铁匠铺很多，成天叮叮当当。还有，那儿风景不错，小时候我们到前面的中梁山上去玩，那真是个乐园，可惜现在环境破坏了。

我们家算得上老厂的首富吧，只是我们的田土没买在老厂。土改时，我父亲赵焕章在外面做生意，他没受冲击。家里田土是大伯赵成章经管。工作队的人把大伯抓到土庙子，捆起来斗，随后把他拉到海棠溪河坝枪毙了。那一批杀了二、三十个，大伯是其中之一。他们给大伯安了个罪名，说他有“血债”。这个



“下面那一大坡地，当年就是我家的财产”

“血债”是这样的：有一次大伯坐滑杆（即人力抬的轿子），雇了一个抬滑杆的力夫，那天力夫出门之后，他老婆在家突然发作生小孩，不幸难产，大流血死了。这就是我大伯的“血债”。地主嘛，要杀你有没有理由都要杀。

大伯死时，我婆婆还在，但年岁已高。大家没把大伯的事告诉她。她天天坐在她那口大棺材旁，那口棺材做得非常好，土改的人来把它抬走了。别人说，赵老太婆多年来天天守着她那口棺材，快死了的时候棺材成了别人的。

杀我大伯我没看见，但老厂杀人我亲眼见到，印象最深的是打邱宏安。他的脑水被打出来滚在地上，还在跳。他十多岁的儿子——我们叫他邱大脑壳——扑上去一口把他爹的脑水吞了下去！

我至今都没搞懂他为啥要吃他爹的脑水。

我的三婶（即“一个地主孙女的自述”中的婆婆）、么婶都划成了地主。其实她们都是普通家庭妇女，只不过能够有碗饭吃。么婶当时还非常年轻，人也很漂亮，后来守厕所，挨斗，一辈子孤苦零丁。按共产党的标准，年满18岁就可以划成地主。我的堂哥赵纯贵当时刚满18岁，这一下有苦头给他吃了——以后几十年，每有运动必把他抓到台上斗。那些年大大小小运动又多，他整整挨了几十年的斗！大伯的儿子赵平忠毕业于黄埔军校，解放后被抓入监牢，放出来时身体垮了，没两年就去世了。

土改时，我只有10来岁，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世界非常恐怖，晚上睡觉开始感到害怕。另外，不得不过早地干繁重的体力活——抬砖。10来岁的身子，压多了，身体发育受到影响，所以我个子瘦小，而我父亲和伯伯都是1米8的个头，高高大大。后来人生路上的坎坷就更多了，我读书成绩很好，在学校数一数二，考上了也读不了好学校。我妹妹考上第三军医大学，政审一查，家族里有地主被镇压，马上取消……

共产党硬说我们解放前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哪里是那么回事嘛！租我们田土的佃户王海云（音）家，同我们家的关系好得很。他们每次来，我家都留他们吃饭，王大婶、王大婶的喊得十分亲热。他们每次来，也总是给我们送南瓜、送蔬菜，彼此象走亲戚。解放后王家对我三婶（所谓地主婆）还很关照。去年我去看望他们，他们说，当年的日子比现在好。现在？王家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报告。会议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的土地全部被政府征用了，他家“农转非”（即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之后进入了一个小厂，没几年厂垮了，全部下岗（失业），一大家人，挤在7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们请我想办法给他们找个工作，我为此跑了好些地方。你想去采访？可以可以，只是不知他们是否还住在原地。我去年去时，他们说，再晚点来就找不到他们了，因为政府和开发商又要开发那块地方，房子又要拆，他们又得迁，迁到哪儿还不知道。

采访时间：2006年3月18日

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采访后记

赵纯友老人是我高中同学赵绿茵的么爸，经赵绿茵的联系，他同意我前去采访。但是，他把采访的地点定得十分特别——在重庆工商大学校园内的一个山坡上。

我们坐在泥地上，四周竹林围绕。

“我想在这儿谈，是因为这一带以前都是我家的土地。”老人说。

采访结束后，我们爬到半山腰，老人望着山下那一大片早已被“占领”和“开发”的土地，详细讲给我们当年的情景：哪儿曾有一股清泉，哪儿曾是一片农舍，哪儿是一片良田……

讲完，他久久伫立在那儿凝望。



“这儿以前都是我家的土地”



赵纯友回到他少年生活的地方——老厂，当年赵家的房屋早已荡然无存，环境也被毁得惨不忍睹。

一个地主孙女的自叙

讲述人：赵绿茵



我来到婆婆和父亲的墓前。

我为长眠于此的一对相依为命的亲人，摆上鲜花和精心挑选的供果。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冲淡了悲伤，终于可以比较平静地来到这里。然而，当一小瓶白酒摆上父亲的墓前时，思念和哀伤的泪水涌了出来……

婆婆曾经是那么深地出现在我生命的轨迹中，我同她曾有过太多太深的复杂感情。

1964年，我刚九岁。一天在选举班干部时，我被老师提名，同学们也通过了。突然一个声音冒出来：“我不同意，她妈妈是地主！”

说话的是家住街上的一个泼辣小女孩，我顿时惊呆了。课堂上马上发生骚乱，同学们好奇地问东问西，议论起来……

从这天起，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究竟怎么不好，我不清楚，我不会问父母，因为他们那些年代心情很不好，我知道应该自己承受这些痛苦，但我不相信我母亲会是“万恶的地主”，她还在教书。

后来得知，婆婆才是地主。

婆婆出生在一个城市平民的家庭，她母亲是在朝天门给码头工人洗衣服的，不知她是怎么嫁到那个隔山隔水的封建大家庭去的，想来这是一门高攀的亲事。

婆婆长相并不漂亮，甚至还有几分凶相，她脾气不好，有时还要打我们，但我不恨她，我知道她为照料这个家和我们几姊妹，很不容易。后来母亲告诉我，婆婆之所以有些凶，是因为她生活很难，丈夫在她20来岁、我父亲只有两岁时就去世了。她想离开，但那个大家庭要逼她留下儿子，她舍不得，于是守寡几十年把父亲拉扯大。妈妈说，一个人要在很艰难的环境里独自挣扎生存时，这种性格就会形成。

婆婆有双小脚，那真是三寸金莲，象粽子般，脚底有很深很深的一道沟。我常不由自主把小脚捧在手上把玩，此时婆婆不再烦躁，一个女人在对待自己时是宁静的。

就在那一年，1964年，婆婆离开了我们家。她是地主成份，政策不允许她呆在

城里，必须下农村劳动改造。我默默看着她离去，心里发空。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多年后听母亲说，当时父亲想不通，拖了一点时间，结果遭到父母双方领导的严厉批评，单位领导的“最后通牒”是：“再不走，把你们全家都赶下去！”

婆婆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惊恐中。那个年代，父母除周末外每个晚上都要在单位学习政治到十点钟，不知怎么有那么多没完没了的“政治”。每天夜里，家里就留下我们三姊妹。窗外不时有一个疯子来骚扰，没有了婆婆，我怕得要死，不敢睡，只好每晚捧着书就着昏暗的灯光，恐惧着窗外随时可能出现的骚扰，等候父母夜归。

一天，父亲叫我去给婆婆送生活费，她走后很久没回家了。我从没一个人出过远门，更何况是到陌生的乡下看一个地主。我暗自埋怨父亲为什么不自己去，或者把钱寄去。后来我自己遭遇“划清界限”的逼迫，才知道为什么父亲不敢去。

我按着父亲指引的路线，紧捂住钱包，转了两次车，还走了许多路，心一直咚咚地跳，紧张得要死。从此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一紧张心就狂跳不已。

我终于找到了婆婆劳动改造的地方——半山坡上一个用谷草搭成的简陋小窝棚。没有门窗，没有床，没有板凳，用了几块大石头当凳子。婆婆在此为生产队照看一个工厂的大厕所。空气中弥漫着工厂飘散出的浓浓的胶臭味和厕所发出的刺鼻的粪臭味。

条件虽然极差，却是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地主婆充满人性化的照顾。因为，活很轻。

那个生产队长是个好人。他曾是婆婆所在大家庭的佃户，他清楚婆婆多年孤儿寡母寄人篱下，被当佣人指使多年的苦命。据说队长的温情也引起一些指责，在那个年代，同情地主是要受批判的。不过，婆婆当时已经57岁，又是小脚，站都站不稳，农村的土路坡坎多，走路都难，更不用说参加田间劳动了。

婆婆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发现婆婆温和多了，她轻声责怪我怎么不在街上买点吃的来，我怯怯地说我不知道，那时我还不会花钱。她带我到了她居住的小屋，里面一片漆黑，没有窗，只有屋顶的几片亮瓦透着光。我第一次到农村，很不习惯，周围肮脏不堪，一片泥泞。没有一个邻居关心我的到来，我自觉地不出去同那些邻居的小孩玩耍，我感到非常自卑和孤独，恨不得尽快离开。我给婆婆带了十元钱，那超出了当时规定的数额，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敢邮寄。



1964年，我9岁

从此，为婆婆送生活费的事就由我承担下来。

“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一岁。那天，我去给婆婆送钱。我打着红领巾，穿着红地白点的背带裙，那条裙子是我们小学校在区文艺汇演中用过的演出服，我非常喜欢它的漂亮和艳丽。突然，一帮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窜出来，一边嚷着“这是地主老太婆的孙女”，一边围过来，用砖头、石块向我砸来，我吓得惊叫，抱头落荒而逃。

我没向婆婆提起这件事，怕她难过，回到家也没提。第二个月，父亲又叫我去，我终于忍不住了，拒绝前去。父亲得知原因后，沉默不语，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去。我从不违抗父命，我尊重甚至崇拜父亲，我不希望让他对我失望，而父亲也在生活中不停地将他的慈爱给我们。

我观察了很久，发现除了走那条路外，还有两个办法，一是先到婆婆的窝棚，下班后再同婆婆一道回她住处，婆婆的住处与窝棚间有很长一段崎岖的山路，途中虽然必遇上那帮小孩，但婆婆好歹是大人，两个人一道走可以壮壮胆。后来我感觉这个方案更加不行，婆婆已是泥菩萨过河，我分明看见她在每次回住处的路上都要自觉去一间挂着毛主席像的小茅屋低头认一会罪，我同她一起走只会给我带来麻烦。再就是走另一条较远的路，路上还有好几家农户的几条恶狗，从小我就非常怕狗，但这条路可以绕开那帮孩子。思来想去，在人与狗之间，我觉得人给我的恐惧远大过狗，于是我选择了有狗的那条路。

我早就决定不再打红领巾，不再穿那条红背带裙了，我觉得这与地主后代的身份很不相称。我恍然觉得自己很傻，竟然认识不到自己不配这身打扮，于是我选了与身份相当的破旧衣服。

那天果然遭遇到狗。在田间小路上，一条恶狗冲我狂叫，我撒腿就跑，狗猛追不放，我感觉双腿发软迈不开步，一下子瘫倒在田坎上，狗咬住我的裤角，我感到一阵绝望……紧要关头，狗被主人吆喝住了。

后来我知道怎样对付狗，千万不要跑，要站住。也知道怎么对付那帮小孩，任凭他们吼叫和扔石块，我只顾快步埋头走自己的路，他们毕竟还没有追上来打我。我有时也敢同婆婆一道回住处，并在她低头认罪的时候在门外耐心等待。

（写到这段经历，猛然间一个从没想过的问题冒了出来：婆婆每天通过那条埋伏着砖头、石块的小路，她有没有受过伤？从精神到肉体？但我从未听她提起过，从未想过她的感受。）

我没被狗咬也没被打伤，但，伤是在内心深处，从此我养成了胆小怕事，委曲求全、枉自菲薄的性格。另外，我开始迅速变得成熟。那年，我十一岁。

婆婆慢慢老了，病逐渐加重，背不知为何驼得跟虾米一样。她总是不停地喘着、咳着，随时吐着总也吐不完的痰，活得比以往更卑微。她其实连看厕所的轻活都无法胜任了，尤其在寒冬，窝棚四处透风，是气管炎患者的大忌，但她必须每天去，她的病因此反复发作，成了恶性循环。父母紧缩家里的开支，给婆婆的钱不停

地增加，以便让婆婆请人帮她挑水运粮。本来婆婆是必须劳动改造的，不能花钱请人帮她，因为这仍是剥削的表现，不过她已丧失了劳动能力，一个孤老太婆，别人也就容忍了她的“剥削”。

我每次去都尽可能地帮她，如挑水、做饭、干杂活，不过农村的柴灶我始终无法驾驭。有次还为她搬家，从快倒塌的危房里暂时搬到一个摇摇欲坠的废弃的粮仓里。这个粮仓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晚上关门睡觉连我都感到闷得慌，只好将门开着。

现在是我为她刮背了，这是一副被生活彻底压弯了的背。在她的指导下我知道怎样用菜油涂在背上，缓缓用铜钱刮着背沟，直至背沟呈现出乌红的深紫色，再用烤热了的老土草纸贴在上面，这时一阵深深的满足感渗透在我们之间，一种人间温情弥漫在简陋的小屋。每次我都尽量在她那里多住几天，晚上早早就同



婆婆抱着一岁的我

她蜷缩在一间单人小床上脚对脚地睡觉，感到一阵童年的温馨，享受着婆孙相依为命的感觉。

同她在睡一起的时候我想过许多往事：三年大饥荒时，有次我和她到冷清的街上，她抑制不住饥饿，向街边那个卖麦粑的人赊了一块我们分了吃，我一直在想她后来去还这个帐没有，却始终没好问她。后来听父母说婆婆那两年差点就饿死了。我想，她会死吗？会不会这样睡下去第二天起来发现她已去世？像我听到过的有些老人那样。她以前逗妹妹玩时最常用的语言就是你说我会不会死，什么时候死？她其实很留恋人生，尽管她有太多的理由不留恋。

每次分别她都哀求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她非常孤独，想念亲人，我是她和她儿子之间的一个纽带。她渴望回到她心爱儿子温暖的家，享受天伦之乐，让孤苦的心得到安宁。

父亲终于悄悄去看过一次母亲，母子俩在窝棚相见，婆婆高兴得发狂！父亲是婆婆家表姊妹们交口赞誉的大孝子，小时候就知道常到河边去迎接为地主大家庭洗衣服的婆婆，为她背东西。他对母亲是绝对尊重，母子感情之深可以让人“嫉妒”。

随着文革的深入，“唯成分论”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我同婆婆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时似乎有点支撑不住，我在下意识里悄悄同她适当地“划清界限”了。

记得那次过长江，长长的轮渡跳板晃晃悠悠，婆婆的小脚走在上面颤颤惊惊。

我一路上一直默默与婆婆保持一段距离，看到她在跳板上那种艰危，我本能的要去搀扶她，但是，“地主”，这个在那个年代被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无形中阻止着我，我在犹豫了一会后才上前扶住她。

还有一次，汽车半路抛锚，我们不得不步行几个小时。这是一次很艰难的行程，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婆婆喘着，咳着，拄着拐，如蜗牛般行进在一直是上坡的公路上，一路上不知歇了多少次，一车人早就走得没有了踪影。我清楚地看到她在挣扎，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等待着她，此时我希望她像过去那样凶，那样暴躁，于是可以不再可怜她。然而她现在那么弱，简直不堪一击，几年的乡下劳动改造已彻底摧垮了她，从精神到肉体。我的心情非常矛盾，“理智”和感情在折磨着我，我好想非常亲密地安慰她：不要紧，有我呢，我是你的亲孙女，但另一方面有个无形的东西阻碍着我表达这种感情。所以，一路上我一言不发。婆婆一点没有怨我，她知道她无法要求得到我更多的情感，她知道自己的卑微，她在我们面前已失去做婆婆的尊严。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黑五类”越来越臭。我看见两个出身不同的小孩打架被上升到“黑五类”打“红五类”的高度上，几个幼年时的好友间的关系也不象过去那样单纯，那紧随每个大人的档案里的秘密被人捅漏给了不懂事的孩子，于是每个孩子父母的家庭出身便成了感兴趣的话题，红色的便觉幸运，高人一等，黑色的便觉灰心丧气，低人许多。位于“黑五类”之首的地主更是臭不可闻，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的代名词，我已不愿婆婆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我觉得她一出现，那个“罪”的标记就威压着我们。



1973年，我申请入团时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些愿望，我也是，我小时候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婆婆不是地主。文革期间，每当看到婆婆提着包袱，拄着拐棍的身影，我马上灰心丧气，连同小伙伴们玩都没兴趣了，生怕大家指着说：看，地主婆！我希望那小脚挪得快点，悄悄地赶紧进家门。每当婆婆离去时，我的心一阵轻松，也希望那小脚挪得快点，尽快离开，不要让别人看见。

文革抄家展览出了不少东西，我看我们家一贫如洗，没有任何一点同地主生活挂得起号。父亲说婆婆早在很多年前就摘了帽，有选举权，属于人民的范畴，还拿出她的选民证给我们看。我小小年纪就感觉到这个摘帽和戴帽没什么

区别，但相信了父亲的话，对婆婆一点不恨，还非常可怜她，不过总有那么一个东西在心里梗着，影响着同她发展如父亲与她的那般感情，这使我善良纯朴的心饱受煎熬。

婆婆终于倒下了，接到她病危的消息时，我在难受之余暗暗有了一种解脱感，但很快觉得这个念头太残忍，强把它打消了。我和父亲赶到婆婆的住处，看到那些生活用品以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搪瓷碗，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悲痛，我想到我曾经同她的相偎相依，想到她的可怜，想到我对她的微妙感情，想到她会永远离去。

婆婆在住院问题上仍然面临成份问题，幸亏婆婆的亲妹夫，他是工人成份，他毫不犹豫地填了“小商”成份，若是由老实巴交的父亲如实填写“地主”，婆婆连住院的资格都没有。

我非常后悔在婆婆重病期间没有全心照料她，给她临终关怀，在犹犹豫豫中放不开自己的情感，没有用语言表达我内心对她的真实感情。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婆婆在病痛中痛苦地呻吟，我却犹豫不定是否要为她端水送药。这是最不应该的事，为此几十年来我一直谴责自己！

我被那个东西梗得太厉害！

婆婆终于走了。

那晚父母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执，两人吵得很凶，此时婆婆已转回我家。我们感到害怕，婆婆一直哀求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一会，婆婆没有了声音。父亲慌忙背起婆婆往医院走，此时是夜里十点左右。那个年代，夜里很早就没人了，临近春节，街上正在戒严。不知文弱的父亲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个近视眼，黑灯瞎火地背着老母亲一气从山坡下到街上。

终于父亲背不动了，停了下来。一队夜晚巡逻的民兵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父亲回答到医院看病，他们放了他们。父亲忽然觉得不对劲，婆婆越来越沉，他意识到了，便返转身背婆婆回家。

我们几个孩子从没遇到过这么重大的事，蜷缩在床上不敢下地。我看着婆婆静静躺在那里，心里一片空白和麻木。父亲没有流泪，默默不语。母亲也默然。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父母派我过江到婆婆妹妹家。

在冷寂的长江边，我悲痛的眼泪才流了下来。

这是1971年，婆婆63岁，我快满17岁。



赵绿茵，1975年

送别婆婆那一幕让我难以忘怀。

清晨，前来抬她的两个民工到了。除我们全家五口前往送行，没有另外任何人，包括婆婆的亲属，父亲不愿连累别人。

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甚至没有准备黑纱。

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突然不顾一切地咆哮起来，那是极其压抑后悲痛强烈的爆发。他坚持要为母亲佩带黑纱！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严重后果，背何种罪名（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他都要戴着黑纱为母亲送行。我们默默看着他，谁也没有去制止。他翻出一块黑布作为黑纱戴在手臂上，但外面用棉袄罩上。

他没有要求我们戴。

在前往送行的路上，山梁上清楚地映出那抬着婆婆的两个民工的剪影，这条路正是我与她共同走过无数次的路，如今她不用再艰难地爬涉了，我深切地感到我与婆婆间从此永远的距离……

婆婆的地主成份没有随着她肉体的消失而消失，它继续影响着我，我入团时，这就成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当我面对班主任，那个左得可爱的人时，不知怎样说才好。我要如实交代对婆婆的认识，要与她划清界限……最后班主任说：“你婆婆看来是个心狠手毒的女人，否则怎么能在早年丧夫后将你父亲养大成人？”

我无言以对，我发现所有的辩解都是多余的。

婆婆走后，每年春节父亲都安排我们同他一起去看她，那个年代对亡灵的追思早已列为要被破除的“四旧”，清明节之类的传统节日已被人们横扫一空，好歹留下了个春节。

1980年春节，在看望婆婆从山路返家的路上，父亲突然用非常郑重的语气告诉我们，以后每年春节都要来看婆婆。当时四周没有旁人，只有长满杂草的空旷山野和狰狞的山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父亲在嘱托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嘱托呢？

四个月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终究是被婆婆离去的打击伤了元气，加之从小到大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在人生的壮年倒下了。那一天他刚满五十岁。

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陪伴他所热爱的母亲了！

我们把父亲墓紧靠在婆婆旁，让他们母子俩在阴间永远相陪。在人世时他们被强行拆开，相互思念，相互挂牵。如今，没有任何东西能打扰他们母子间的相依相伴了。

赵绿茵写于2005年10月

采访后记

赵绿茵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无论是在当年同窗时，还是在后来的交往中，我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地主的孙女”。

我只知道，当年她成绩优秀，后来她工作出色，非常聪慧但十分低调，颇有才华但从不张扬。她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做事一贯认真真勤勤恳恳，不过，却总是显得过于小心谨慎，甚至畏缩胆怯。

2005年底，她无意中说到她写了一些关于她家族的文字，准备留给她的女儿。她还说，她们赵家是个大家族，曾经很兴旺……

我动了心，提出想借来看看。她同意了。以上这篇“一个地主孙女的自述”便是她文字中的一部分。赵绿茵最初不同意我收录她的这部分经历，也不愿提供照片，她仍然担心，她一辈子谨慎。

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同意了，而且还约出了她的么爸赵纯友。赵纯友又提供了张志强、刘培莲、施曾廉、施增广，于是有了本书中的“一个土改民兵队长的述说”、“那些年遭的孽说不完”、“一个心惊胆颤的翰林后代”、“显赫施家最后一个守墓人”等篇章。

“一个地主孙女的自述”全部出自赵绿茵的手笔，从她的亲笔记述中，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一辈子这么低调，这么谨慎，这么胆小。

庆幸的是，她终于战胜了胆怯和恐惧，于是，一些也许会永远消沉的“土改史”被打捞出来。



赵绿茵与她么爸赵纯友



湖南岳阳县永和乡农民在斗争地主会上高呼：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农民当家作主。
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漂亮的地主女儿——黄二妹

讲述人：王宗笠
重庆大学数理学院教授

1969年，我21岁，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那年冬天，我和另外几个知青下乡到重庆酉阳县（当时属于四川省）新龙公社新明大队四生产队。

那是一个非常偏远落后而又贫穷的地方，从重庆出发，坐船、乘车、走路，要整整四天才能到达。

那条惨不忍睹的破烂公路只通到区上，从区上到落户的四队还有20多公里山路。四队位于一条山沟里，全队只有40多人，后来得知，以前有80多人，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让四队的人口减少了一半，（19）69年我们去时人口都没有恢复。

初到四队时正是隆冬，酉阳山上天寒地冻，农民们非常好奇地望着我们，但不敢靠得太近。他们一辈子封闭在偏远山沟里，对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人十分敬畏。我永远忘不了初次见到他们时的情景：衣服破烂、单薄、肮脏，下身只有一条薄裤子，好些人赤着脚站在雪地里，脸上隐隐泛出菜色，目光有些木讷……。那一刻，不管你在城市里多么失意、多么伤感、多么自卑，你都要生出一种优越感。你裹着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大衣、毛衣，吃得饱穿得好，有知识、有文化……

四队的几十口人顺着山沟居住，我们几个知青被安排到沟中部的一户人家。这家人只有两兄妹，父母和其他亲人都在饥荒年饿死了，所以有多的房子供给我们。村民们来来往往都要从我们门前经过。

很快，我们发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确切地说，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虽然她也穿得破烂，但掩盖不了她S型的美妙身材。她的脸型是那种秀美的瓜子型，眼睛水灵灵的，含有一种灵性的光。她同当地农民相比，有一很大的不同是：她很干净。尽管她衣着破旧，但收拾得整整洁洁清清爽爽。尤其不同的是牙齿，由于当地人没有刷牙的习惯，所以个个都是满口黄牙。但她的牙齿却非常洁白，非常整齐。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张口一笑，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阳光洒下来，象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令人生出眼前一派明亮灿烂之感。

我们几个知青公认，她是那种属于比较高雅、有些洋气的城市美女型。

在这偏远闭塞荒寒的山乡里，生长着这种“尤物”，令我们十分惊奇。

我们迅速得知，她叫黄二妹，是地主黄三爷的女儿。

黄三爷（人们都这样叫他）是我们队里唯一的一个地主，解放前有10多亩地。听他们说，由于当地很穷，黄三爷长年累月也同后来的“贫下中农”们一块上坡下地劳动，所以，他其实也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但是，他毕竟有10多亩地，因此被抓出来当了“阶级敌人”。

土改时，黄三爷一家被撵出来，住到了沟头上的一间破草房里。

黄三爷也是队里少有的文化人，他曾到县城里读过书。记得在坡上劳动时，他喜欢嘴里念念有词：“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黄二妹没上过学，是她爸教她学会了读写。

黄二妹很喜欢同我们知青交往，我们也非常愿意看到她。我们讲起外面的世界，黄二妹听得如痴如醉。当时，她走得最远的地方是20公里外的新龙区，汽车也只见过两次。我告诉她，城里有很宽的公路，到处是电灯，半夜出去可以不打火把。二妹觉得难以想象。也难怪，山沟里夜晚一片漆黑，没有光亮会摔得头破血流。我还告诉她，世界大得很，她走过的20公里是很短很短的距离。她目光痴痴的望着我，我于是说，我这儿有本地图，借给你，你去看看，世界有多大。临别时我开玩笑地说，地图不是白看，看了要告诉我从英国坐船到中国怎么走。

过了几天，二妹来了，她音齿朗朗地向我背诵，船从英国启程，经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科伦坡、马六甲海峡……

那一个个遥远的、充满异域色彩和风情的地名，从一个几乎足不出村的山乡姑娘口里吐出，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在坡上劳动归来，我无聊中随口读了几句英语，引起了二妹的极大兴趣。她问，外国人就是这样说话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老师是这样教的。她说，那你教教我。我顺口读了个“Thank you”，并告诉她，前面的发音舌尖要放在两齿之间。

二妹马上就学着说。

她又一次让我惊讶。她的发音准确、清晰，而且非常悦耳动听，真的是一开口就到位！

还有，我喜欢画画，其他农民来看两眼就走了，没兴趣。二妹不然，她可以在我身边一站一两个小时，还不自禁地拿起笔在纸上画，神情非常专注。

我屋里有两排书，二妹每次来，站在书前，痴痴凝视，用手轻轻地从书的一头抚摸到另一头，神态很动人。

我们几个知青私下议论，一致的看法是：要在这穷山沟找个女人结婚，绝对不可能；但是，要是能娶黄二妹，绝对可能！

可是，我们下乡时，大约20岁的黄二妹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了一个一岁的儿子。

她的丈夫叫涂德明，住在山沟的最里面，是个孤儿，从小很穷，当然也就是响当当

的“贫下中农”。涂德明有两个特点，一是力气大，挣工分是把好手，家里一年四季不缺柴烧；二是有点傻乎乎的，话都说不清楚。我在四队三年，几乎没听见他表达出完整的句子。

你会想，黄二妹嫁给他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不，无论是二妹还是她父亲，对这门亲事都很满意。为啥？你知道，那个年代，地主和地主子女是阶级敌人，猪狗不如，好多地主子女根本无法谈婚论嫁。二妹的哥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快30的人了一直打光棍，因为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地主儿子。而二妹，不仅嫁了人，而且嫁的是一个贫农，而且还是一个力气很大能挣工分的贫农。

黄三爸对这门婚事尤其满意，岂止满意，简直是巨大的幸福。只是，为了不影响女儿，他很自觉地不进女婿家门，也不同他们多说话，从女婿门前路过，他从不进去抱他的小孙子。最多在没人的时候用手指头冲着孙子勾一下，轻声说：“叫外公。”

我观察到，黄三爸每次从女儿女婿门前过，虽不言语，但脚步很轻快，面部的表情也是舒张愉悦的。

黄二妹的满足表现在她全身心地操持这个家。她的聪明才智、心灵手巧在这个小家里得到充分发挥。她自己设计了一个拐角的烟筒，排除满屋的烟。这在我们那一带是个创举。她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走进她家，立马感觉到与其他所有农民家的巨大区别，很能留住人。

涂德明对二妹心满意足。他收工回来，最喜欢坐在门槛上，一手握烟杆，一手抱儿子，脸上那种幸福感、满足感就象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

不过，这种贫农和地主女儿的“蜜月”，在那个年代很难一帆风顺。二妹结婚大约两年吧，风浪就来了。

我们队的队长也姓黄，30多岁，是个很精明的、敢说敢干的人。我们那儿有个传说：老鸹会叼金条。因为老鸹把金闪闪的金条当上等的稻草，叼回去做窝。所以，老鸹窝里可能会有金条。

没人把这个传说当真，除了黄队长。

一天，黄队长丢下生产队的活不管，突然消失了。再过一天，大山上打柴的樵夫把头破血流的黄队长送回来——他爬到悬崖绝壁上去掏老鸹窝，金条没掏到，摔得血光满面。

对子虚乌有的金条，黄队长都可以认真下手；对一个眼前实实在在的诱惑——漂亮聪慧的黄二妹——黄队长怎能放过。

黄队长是结过婚的人，有两个孩子，但老婆去世了。作为队长的他要再娶不难，但他一心想要的是黄二妹。

要得到，首先得让黄二妹离婚。

黄队长找到涂德明，对他说，你是贫苦孤儿出身，又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像你这种身份，早就该当一个主任的官了。为什么没当上？是你娶了个地主女儿！现在城里正在造反、夺权，城里要来人选干部，你是最合适的，只要离了婚，就有远大前途。

涂德明原本是傻乎乎没脑子的人，黄队长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动了。正在这时，县里的宣传队下乡演出，黄队长抓住机会把涂德明带去作为“候选主任”推荐给宣传队。黄队长自导自演地介绍，说涂德明出身好，只是娶了个地主女儿，但很快会离婚。宣传队里那个年轻人望着傻乎乎的涂德明，心里好笑，开玩笑地说：“那就去离了婚再来。”

黄队长赶紧把涂带回来，催他快离。

农民们非常心痛灯油，天一黑就早早灭灯上床，非重大事件不会“浪费”宝贵的灯油。我喜欢看书，通常睡得很晚，山沟里只有我的油灯亮到深夜。

但那天夜里，涂德明家里的油灯一直亮着。

我于是知道，黄二妹在作最后挣扎。

第二天，我看见二妹抱着儿子走在前面，涂德明走在后面，往区上去了。

显然，黄二妹没有能保住这个家。

回来时，涂德明抱着儿子走在前面，二妹走在后面。农民见状说，他们离脱了，儿子归了涂德明。

离婚，对黄三爸一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黄三爸惊恐不安——同贫农联姻的那根政治“保险绳”断了！他脸上再没有笑容。以前，他挑着满满一担粪脚步都是轻快的，现在空着手步子都沉重异常，身体也迅速垮下来，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脸上罩着一层死沉沉的灰白。

黄二妹也沉默了。她搬回父亲那间破草房。在当地，女人离了婚回到娘家是件丢人的事，况且母子分离，亲生儿子归了男方。

也许是由于父亲埋怨、生活艰辛、精神压力大，父女俩开始有了争吵。

离婚后，二妹很少到我们这儿来玩了。偶尔来，也有些失魂落魄，脸上常常突然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

黄队长开始了第二步，找机会接近黄二妹。他主动到她家帮着干杂活，甚至帮他家修猪圈。

我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一天，黄队长从我门前过时，我叫住他，突然说，你要得到二妹必须要做一件事。

黄队长一怔：“你什么意思？”

我盯着他：“就这意思！”

黄队长软了，问我要做哪件事。我望着他的满口黄牙，感到厌恶，于是恶作剧地说：“你必须要把牙齿刷干净。”

我知道黄二妹天天刷牙，没有牙膏，用的是当地的一种青盐。

黄队长向我讨要牙刷，我把另一个知青刷皮鞋的牙刷给他，他拿着那脏兮兮的“鞋刷”，高兴地走了。

黄队长看来会大功告成，因为黄三爸一家正走头无路，二妹能嫁给队长大人也是福气。

再说那个盼望“前程无量”的涂德明。

离婚后涂德明的日子一落千丈，他哪里带得动小孩，操持得好家务？一岁多的孩子还在吃奶，突然没了娘自然又哭又闹。短短的时间，家就败落下来，整个屋子又脏又乱，一塌糊涂。拖了几个月，涂在万般无奈中把宝贝儿子送给他的一个亲戚抚养，半个月后，儿子又被送回来，长了一身疮，瘦得皮包骨，气息奄奄。现在，人们再也看不到涂德明一手握烟杆，一手抱儿子，满面幸福地坐在门槛上了。

至于县里来的那个宣传队，早在涂德明离婚三天后就消失了，无影无踪。黄队长自然不再提当主任的事。涂德明似乎一直都没意识到被人耍了。黄队长频频往二妹家跑，旁边人看得明白，就他本人不能产生联想。涂德明的弱智由此可见。

黄二妹每天上坡劳动，都要经过涂德明的家门，每次路过，她都低着头匆匆而去，不往门里看，也不看她儿子。

有一天，她从山坡上回来，肩上扛了一捆柴，路过曾经的家门时，儿子正在屋里哭，黄二妹没停步，依然低头匆匆而过。

儿子在身后哭得撕心裂肺。

突然，黄二妹把肩上的柴往沟里一扔，倏地旋身，象一头母狼，发疯般地冲进屋去……

孩子的哭声嘎然而止。

听他们讲，当天晚上黄二妹没有走。

第二天，第三天，她也没有走。

村民们默认了她的这种行为，觉得理所当然。

（村民们自然的人性，抵御了邪恶的“阶级斗争”，这是黄二妹不幸中的大幸。）

家，马上又变得井井有条，儿子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涂德明脸上有了笑容，人们又看见他一手握烟杆，一手抱儿子，坐在门槛上，一脸富足相。

黄队长功败于垂成，一脸沮丧。掏鸟窝，摔得鼻青脸肿；追美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黄二妹同涂德明如此生活了半年。一天，我正坐在他们家等待二妹给我炒一种黄豆茶时，涂德明当兵的兄弟来了。他把涂德明和黄二妹叫到身前，板着脸说，你们

这是非法同居，要坐牢的！一句话把涂德明吓得半死，我见他脸都青了。二妹却很镇静，看了我一眼，说：“我叫他到区上去办，他一直不去。”

“不去？这是犯法！”当兵的兄弟严厉得象个法官。“不行，今天就去，马上就走！”

于是，黄二妹抱起娃儿，涂德明跟着，“法官”走在最后，押着一对“犯人”，往区上而去……

就这样，他们复婚了。折腾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不久，城里来招工，我便离开了那条山沟，离开了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也离开了黄二妹。

她后来怎样了，是否还有折腾，我不得而知。离开那块土地33年了，我从没回去过。但是，我经常想起那条山沟，想起黄二妹，想起我们曾一起在地坝里通宵守夜（照看粮食）。那月光，山风，夜色，青春的气息……真的很美，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怀想，刻骨铭心……

采访时间：2005年7月16日

地点：重庆大学

采访后记

早在1997年，就在一次闲聊中听到王宗筌谈起过黄二妹，正式采访他，已是7年之后。

原本约定在我家见面，但待我到他家去接他时，他却说，天气太热，不走了，就在他家谈。

我什么都没带，照相机、笔、笔记本都在家里。只好凭脑子记，回家后立马写，虽然故事完整地记了下来，但缺失了王宗筌的采访照。

王宗筌本人就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族，他清楚本家族里许多曲曲折折悲欢离合的史事，他本人亦有很强的写作能力，我希望他写下来，或者讲出来让我写，但他都不愿意。

死里逃生的 11 岁小地主

讲叙人：李宇熙

1940 年生



我们当地主，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的。那时，允许买卖土地，也允许拥有土地。正如现在允许私人经商，一些人又富起来了。比如我，我又拥有了一定家产。按当年的整法，我又是地主了。千千万万的人又是地主、资本家了。

但是，土改时把我们往死里整，那年我才 11 岁……

1951年我刚满11岁，住在四川省垫江县城西乡松林村。那一年，村里的土改搞得十分恐怖，每天把十多个地主、富农押到台上斗打。我亲眼看见，拳头脚尖，劈头盖脑，还用扁担砍。白天斗打，晚上关在农协会（即农民协会，共产党土改时成立的握有生杀大权的农村基层组织。）设立的牢房里。

那10多个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曾四的老地主。他们夫妻俩都遭毒打，连续打了一个多星期，打得曾四的脑壳肿胀得像猪头——猪八戒的头。曾四回到牢房喝尿（民间认为喝尿可救急，治跌打损伤）。但是，他没能挺过来，被活活打死了。



李显楼

我们家也是地主，祖先叫李秀实，明洪武元年，朝廷把他从北京派到垫江县当县官。一代代传下来，都是书香门弟。我父亲李显楼有很多书，也拥有收100多石谷子的田土。在他五兄弟中，父亲最能干。不过，他在1946年去世了。幸亏去世了，否则肯定被共产党打死。

1950年初，呆在家乡的有妈妈、大哥、三哥和我。

大哥李伯融是父亲的大老婆生的，大我30多岁。他早年从军，曾在杨森手下当过团长，后来离

开军队，回乡管理家产，并在城里开了一家盐店。他为人豪爽直率，乡民们都很喜欢他。土改时大哥被抓起来，农协会的人拷打他，逼迫金银。大哥交不出，农会的人问：“交不出你说怎么办？”大哥是军人出身，很干脆，回答说：“你们给我一粒花生米。”（“花生米”指子弹）

农协会的人也很干脆，把他拖出去就是一枪。

三哥李隆熙一直在外面读书，毕业后在长寿县政府当了一个秘书。1949年共产党来了，他害怕，跑回老家，以为在乡下平安一些，不料照样被抓起来，关押在县城北门。妈妈编织一些鸡肠带，拿去卖了换米供三哥。他被关了半年时间，从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初，由妈和我给他送饭。由于他一天地主都没有当过，因此逃过了杀身之祸，但被关进了监狱。1959年，三哥出狱，迎头遇上大饥荒。他没吃的，到重庆求亲友救助，可他是“阶级敌人”，那个年代亲友不敢帮他。他只好独自回乡，在朝天门码头时，他撑不住了，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三哥饿死时才40多岁。

杀了大哥、关了三哥之后，接着就轮到我妈（人们叫她李唐氏）。抓她时，妈估计她活不出来，对我说，家里还有三块钱，要我自己买点吃的。

当天晚上，妈没有回来。我独自跑到街上（我们村离县城不远）买了一块糍粑。怕耗子吃，我把它放到一个竹凳上，用盖子罩上。

第二天，农协会来了一大群人，“砰”地一声一脚把门踢开，凶得很，象土匪。我看见妈妈被五花大绑押着。

农协会的人又一脚把竹凳踢翻，看见糍粑，冲我骂道：“狗日的小地主花样多，还在屋里整糍粑！”

他们把我家的地挖的挖、撬的撬，父亲留下的几百本药书也抄遍了。找啥？找埋藏的金箍子（即金戒子）。

有人向农协会揭发，说解放前我妈手上戴得有金箍子。

这本来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一解放我大哥就把它拿去上缴给政府了，政府还打了一张发票。妈不懂那东西，把发票寄给我在重庆的哥哥了。

农协会的人不相信，咬定妈狡猾，天天斗，天天打。我亲眼看见，冬天里，他们把她上衣脱光，奶子吊在外面，啪啪就是几巴掌打去。

妈的身子肿胀起来，神智有些恍惚，开始乱咬，说金箍子在某处某处。农协会的人押着妈去找，找不到又是一阵打。有一次妈说是在柳家，找去后柳家的人勃然大怒，甩手就给妈几个耳光……

他们把妈关押了几个月，还是没逼出金箍子，于是开始对我下手。农协会的彭玉祥和朱国全说，老地主狡猾，花样多，我们整小地主。他俩把我抓起来，说：“你小娃儿要说老实话，金箍子在哪点？”我说我不晓得，真的不晓得。他们冒火了，用细麻绳把我的两个中指头捆在一起，然后把我吊在半空。那个痛

呀，钻心！我几十斤重的身子，就吊在两根指头上。我痛得爹呀妈呀的乱叫。他们吊了我近20分钟才把我放下来。这两根指头过了半年才恢复知觉。

还没完，接下来我每次路过那个垭口，他们都要抓住我一阵痛打，骂我是小地主。那一年我才11岁，还是一个少年儿童。我没有办法反抗，每次都只有咬紧牙让他们打。

当年斗打地主那个恐怖，真的是法西斯！我听妈妈讲，垫江县城里把地主的小媳妇们脱光上衣，用麻绳捆扎乳头，吊、拉，一些女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我们村那10来个地富的情况？我太小，除了亲眼见到曾四被打死外，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妈妈知道，但她已经去世。对了，我还知道一个叫杨增之的地主，他被抓来跪在煤炭渣上，同时强迫他嘴和鼻子对着尿壶口吹气……

妈妈放出来不久，农协会就把我们房子收缴了，屋里所有财产全部收光。我们母子俩被赶出来，全部东西是一口锅和一把锅铲。我们爬到半山岩上农协会指定的一间破草房里。那间草房四壁不全，摇摇欲倒，还有，没水，每天必须下到坡下河边去挑水，我妈50岁的人了，又是个尖尖脚（即旧时缠过的小脚），日子很难。

最难的是缺吃的。我们孤儿寡母，没劳动力，那个饿呀。妈和我饿得抓老鼠吃，我们用棍子支一个筛子，里面放点食，老鼠钻进去，罩住之后烧来吃，香得很。

一天，一阵大风刮来，草房塌了，一根木头正好砸在我后脑上，鲜血直流。幸好妈没受伤。

妈带着我，挨家挨户去恳求——恳求住在别人猪圈里。不行！我们又恳求，恳求睡在别人屋檐下，也不行。没办法，妈只好在野外用包谷秆搭了一个棚，再抱一些谷草当床。住在棚里，一下雨我们全身湿透。一天，我们吊着一个罐子煮绿豆时，火星飞溅到谷草上，转眼间，“家”就被烧得精光。

妈妈嚎啕大哭！

幸亏这时天气热了，妈带着我睡到村外稻田中的一条石板路上。蚊子咬顾不得了，气人的是睡在这儿也挨骂。早上别人起来挑水，见我们睡在路上，劈头就骂：“狗日的老地主的小地主，滚起来，莫挡我的路！”

妈和我只得赶紧爬起来躲开。

就这样，妈还天天被喊去干义务劳动，干活不给一分钱，我们天天饿肚子。

我于是出去要饭，我那个样子，早就是一副叫花子（乞丐）相，衣服又破又烂，身上又脏又臭。一天，在讨饭时，一条狗窜出来咬在我腿上。伤口很快溃烂，一直烂到骨头，周围的肉都臭了。我痛得成天唉哟唉哟地叫。走不动，用两个凳子支着在地上挪。还没得吃的，就是在这时，我连续饿了四天。

我想，我活不出来了。

这时，有一个好心人，见我们实在可怜，给我妈讲了一个药方：把折耳根（即鱼腥草，一种可食用的野草）用南瓜叶裹起煨软了包在伤口上。果然，包一次好一次。我这才活过来。

1952年秋天，有一个山坡上的长工同情我们，让我们住在他灶房的灰堆边，我们这才结束了野外露宿。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差点让我又送了命。

县城里有一次开大会，我去看热闹，不知不觉在街上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身上盖了两件旧衣服。我不晓得是谁的，把衣服拿回了家。妈妈见衣服很脏，就洗了晾在外面。马上有人汇报，说地主婆偷衣服。民兵队长把妈抓去，妈说是我捡的。问我，我如实讲了过程。队长不依，把我关在岗楼里，两天不给我吃饭，我只吃了妈送来的一碗南瓜。

第二天，他们把我衣服裤子全扒了，脚尖拳头，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小地主不老实！”

我除了哭还是哭。

晚上天黑后，他们去吃饭，罚我光溜溜地站在凳子上。

我决心逃跑。乘他们不注意，我飞步往外逃，黑暗中，只差一点就掉进一口井里，惊出我一身冷汗！

我在黑夜里飞逃，一丝不挂。后来看共产党宣传的白毛女，她从黄世仁家里逃出来，还穿了衣服，比我好。

其实，白毛女是虚构的，那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意图，定一个框框编造出来的。它挑起人们对地主的仇恨，让农民拼命去给毛共打江山。

那天夜里，我心惊胆颤，怕被抓回去打死。我跑着跑着，突然看见李家湾那所学校的操场，陡然大惊——那儿枪毙过几个地主，血淋淋的！

我受了极度惊吓，逃回家中后倒下一病不起。

这次病得沉重，我第二次认为我活不出来了。

的确，我同妈妈都已走到死亡的边沿。这是1952年底。

我哥哥李宁熙这时已在重庆城里参加了工作，村里有个人在城里遇见他，对他说：“李宁熙，你还不回去，你妈长胖了。”



李宁熙 15岁摄于重庆

“啥子长胖了？”

“要死了！”

但是，哥哥不敢回来。

他曾给我们寄了10元钱，被农协会收缴了。1952年底又寄了8元钱到一个亲戚家。亲戚扣了4元去买猪，只给我们4元。这4元钱救了我们的命。妈开了路条上街去买了吃的。为什么要开路条？当时，民兵在各条路上都设有岗卡，地主没有村里开的路条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否则就定你个“逃亡地主”罪。

那段日子，我天天盼邮递员，盼哥哥的信，盼寄点钱来。我给哥哥写信，一个破折号，加三个字“哭”！“哭”！“哭”！

哥哥意识到不把我们弄出去，我们是死路一条。他反复找单位，单位终于开了证明，同意我们迁到重庆。

我们找到村里，求村里放我们。还好，村里同意了。妈赶紧又去乡里。乡里不同意。那天下着大雨，妈绝望得很，几十里路，淋着雨，一双小脚，一路走一路哭。第二天，还得去，这次是个年青人，他盘问了一番，看我们孤儿寡母的确难，终于把公章盖了。

1953年春节之后，我同妈从垫江走路到长寿，从长寿坐船到重庆。待到达哥哥家时，我们已腰无分文，只有满身虱子……

我们总算死里逃生了。

（注：几年后李宁熙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李宇熙又流落街头，曾被抓入重庆杨家坪派出所。60岁的老母李唐氏被迫出去打工，每月挣6元钱养活自己。1964年李唐氏又被遣返农村，拖一双小脚下地挑粪劳动，最后凄惨死去。这是后话。）

采访时间：2005年5月30日

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

采访后记

李宇熙是我曾采访过的长寿湖右派李宁熙的亲弟弟，在得知李宁熙是地主家庭出身时，我便请他讲讲他的家史。他说：“我弟弟更清楚那段历史，你去找他吧。”

李宇熙讲述时情绪十分激动，整个往事他一气呵成，中间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可想那已过去了50多年的经历在他心灵上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后来，我在长寿湖边遇到他时，问他愿不愿意让我把他的经历录制下来，他硬朗朗地说：“好，你来，你来我家！”

“地主”有什么罪恶？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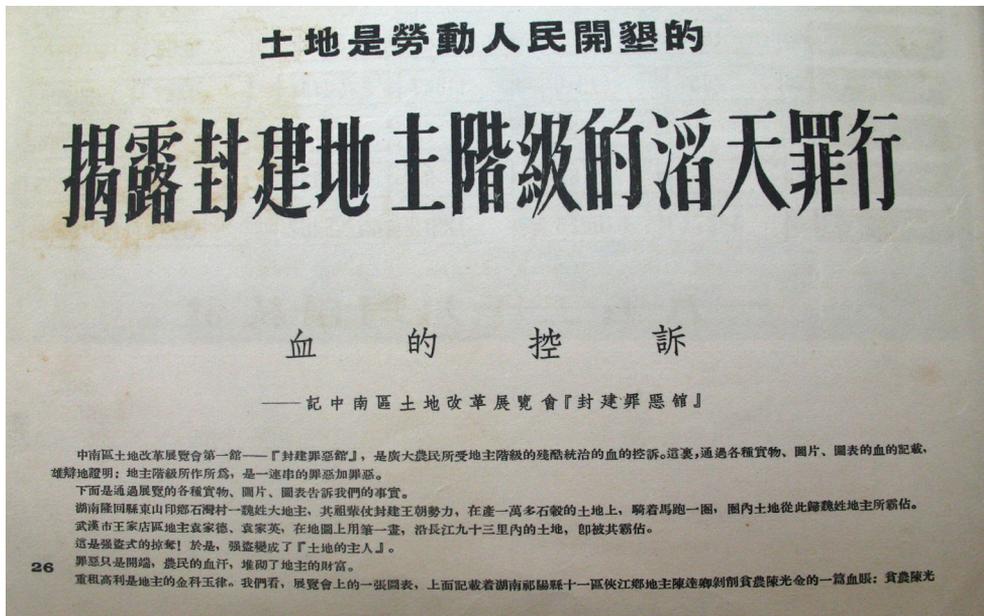
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

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

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

——孙文广《北京之春》

2004年7月号



中共土改的宣传

土改，我家五死一残

讲述人：冯光林



“一场土改，我们家死亡五个，残废一个。”

我老家在九蟒村，那是忠县城西长江边上的一个山村，山下长江里有九道并列的长长的石梁，出没在波涛之中，像九条飞动的巨蟒，九蟒村就是这样得名的。

我父亲叫冯国祺，母亲叫何顺贤。父亲是帮熊实之“同聚福”坐柜台卖糖的店员，后来略有积蓄，就买了5石租的田，还在望水乡开了一个造纸的小作坊，就是把竹子泡烂了制成那种很粗糙的草纸。后来家境慢慢富裕起来，发展到30多石租。就因为这样，父亲成了剥削阶级。土改时斗争我父亲，硬说他以前打残了人家的脚——那个人姓杨，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脚是胎生的残疾。他们还整了好多黑材料，不管是不是事实都要你承认。父亲当然不服，不服就捆绑吊打。那些人不要天良啊，后来他们竟然把我父亲枪毙了。枪毙他的那天，他和苏达三、曹新煌等被捆绑在向家嘴的电杆上。一些过路的小孩子来看热闹，对他说：“你要遭枪毙哟”，他根本不相信自已会被枪毙，很坦然的地笑着对小孩子们说：“没有那么多枪毙的，我没有罪，土地财产都已经交完了。”谁知过了一会，他就被押上了公审台，真的被判处了死刑，最大的罪行竟然是他说过的一句话：“你把我整死了我还有妇人，妇人死了还有四个儿，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公审员说这是反动言论，等于是说要向共产党报仇！就这样我父亲成了冤死鬼，他死的时候只有49岁。忠县很多人都说，如果冯国祺都要枪毙，那忠县好多人都该枪毙了，他不过是个生意人。

父亲死后，继续整母亲。六月间好毒的太阳哦，民兵们把我母亲捆起来推到太阳下去暴晒，反复的摧残，没多久母亲就被整死了，死时4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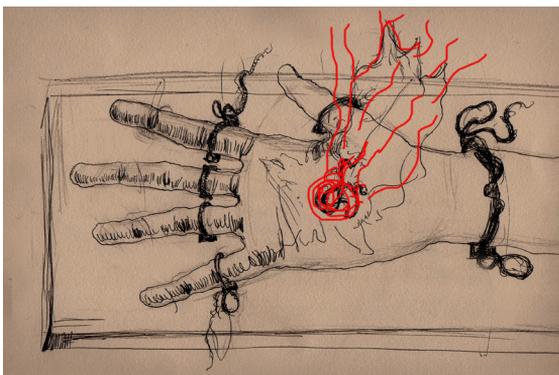
我大哥一家三个都是那时死的，一个也没活下来。

大哥叫冯光和，大嫂叫陈德珍，1948年结婚。土改时把哥哥也捆到城里准备治罪，结果发现他神经不做主（不正常），就放了。那时我们家全部财产已经被分完，我们没法活下去了，大哥出去讨饭，去了就没回来，后来在望水乡一个

山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早就饿死了。大嫂也被反复斗争，受尽凌辱，后来也是去讨饭，在饿得不行的时候乞求一个好心人让她吃一顿饱饭，然后就上吊自杀了。大哥大嫂死的时候都才20多岁，他们留下一个儿子三岁，送给了别人，一个女儿不到半岁，还在吃奶，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饿死了。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姐姐冯光珍还在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差一年就毕业，18岁，她听说土改搞得很厉害，以前每月都要收到家里寄去的生活费，忽然没收到钱，担心家里出事，就从万县赶回来，别人劝她不要回去，回去要遭殃，她还是要回来，这一回来就踏进了鬼门关。

姐姐还是一个在校学生，竟然也被评成地主分子。民兵们要姐姐拿金银出来，对她使尽了各种酷刑，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把她大绑起来和母亲一起暴晒，一晒就是半天，绳子勒进肉里很深，她才18岁，皮肉很娇嫩，怎么受得了，加上太阳像火一样烤，后来绳子一解，手全是黑的。姐姐不愿意给我讲那些伤心事，县里的人都知道她被“点天灯”的事，但是她却没给我讲过。“点天灯”就是双手横着捆在木板上，手心朝上，在两边手心里倒上桐油点灯，等到烧干了又再添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姐姐的双手就给废掉了。我记得，姐姐的双手先是感染，后来慢慢化脓溃烂，蛆从里面往外滚，老远都闻得到臭，那时我们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钱给姐姐治伤，眼睁睁的看着姐姐的双手一天天烂掉，先是皮肉掉尽，露出白森森的骨节，然后骨节一节一节地脱掉，最后，姐姐的左手完全没有了，只剩下手腕，右手手掌烂掉了大半，只剩下半个手心。整个过程至少有一年，要是有点钱治疗，姐姐的双手也许是可以保住的。她能活出来全靠一个乡间的土医生，他同情姐姐，做好事给她医治，算是把命保住了。但是，姐姐永远失去了双手，成了一个残废人。



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都死了，我们被赶出来住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那时我哥哥光熙、光钰在外面读书，我和光惠、光林、光群都还小，我才6岁，姐姐成了家中最大的人。她带着我们几个弟妹去四处讨饭，双手伤口一直溃烂。她流着泪去乞讨，要来了饭，我们就一口一口的喂给她吃，她没有手啊，自己怎么吃呢。那个场面，有许多好心人看了都偷偷流泪。

幸好我光熙和光钰哥哥在外面读书没有回家，要是回来也就完了，也全靠他们在外边，后来他们有了工作，每月给我们寄钱，这样我们才慢慢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十年代初，我两个在外的哥哥第一次回家来，看到姐姐的惨状，泪水抹了一把又一把，说：“你是怎么过出来的哟？一家人只有你最受罪呀。”两个哥哥都流着眼泪对姐姐说，要把她供养到老。

那时正是天天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二嫂是个画家，回到老家也没忘记画画，她在山坡上画了几幅速写，竟被大队书记认定是在画反攻倒算图，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暗地里向公社打了报告，公社正愁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就整好了材料盖上章寄到四川大学，要求把哥哥开除回家接受管制。那些人心好毒啊，把我们整够了还要整我两个哥哥。那段时间，生产队就有人放出话来，说：“我们队上过几天就要回来两个人了。”他们以为材料一去我两个哥哥就要被送回农村了。还好，我哥哥的单位没理睬这件事情，还让他看了公社寄去的材料，

上面有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的名字，写了好多条罪状，说他们把哪块田哪块地都画下来了，要“反攻倒算”。哥哥说，好危险，我再也不回去了。我两个哥哥后来都有成就，光熙是四川大学教授，光钰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书记、著名的民族音乐理论家，他们要是被弄回来也就完了。



1998年，手残了48年后的冯光珍领到了一个残疾证

姐姐失去双手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都是弟妹们给她喂饭换衣，后来我们在她残留的只有一寸多的右手掌上套一个布带子，把勺子插在带子里，她就可以慢慢地自己吃饭了。姐姐本来是很灵巧的人，她坚持反复练习用残留的右掌做事。右掌的大拇指和小拇指分别还残留有小胡豆那么一点，她经过无数次努力，竟然能做针线活，真是不容易。她觉得太连累我们，就尽量想法做事，有好几年，她把毛笔绑在右手掌上，在县城河坝最热闹的地方写对子卖钱，人们都说她的字写得好呢。

姐姐从18岁失去双手，她的青春岁月也就毁了。由于她是地主，虽然已经严重残疾，仍然要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斗争，每逢政治运动来了，她就要受苦。平常每月一次的训话会她是非到场不可的。她注定一生不可能有婚姻了，因此从没想过要结婚，直到她49岁那年，县城里一个叫朱良臣的老地主因为丧偶，托

人说媒，要娶姐姐为妻，姐姐心灰意冷，哪里还有心思结婚，最后在别人的一再撮合下才嫁给了朱良臣。那时朱已经是风烛残年之人，三年后朱就去世了，姐姐一生就经历了这么一次短暂的畸形的婚姻。

两个哥哥非常心疼我姐姐，几十年来一直给姐姐寄生活费，今年2月，光绪哥哥因中风突然去世，消息传到忠县时，姐姐正瘫痪在床，我说：“姐姐呀，那个供养你一辈子的光绪哥哥已经走了”，姐姐一听就痛哭起来，说：“怎么不死我呀。我要跟他去地下！”

仅仅一个星期后，姐姐也走了。

采访时间：2006年5月5日

地点：忠县东坡路冯家住宅

采访后记

冯光林不善言辞，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但是，他朴实的语言却展示了一段血淋淋的真实历史。

冯光林的父亲，一个店员出身的人，靠自己多年的努力和勤奋积蓄了一份财产，结果，这份财产不仅让他付出了生命，而且还给自己的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冯光林家里挂着冯光珍的遗像，她在我们到来前两个月离开了人世。我们为没来得及见上她一面而永远遗憾，为未能倾听到一个历经苦难女人的心路历程而深深自责，尤其是，我们未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给她一点心灵的抚慰。



冯光珍遗像 1933—2006

补记：

冯光珍的弟弟冯光钰（1935年生）在1949年时因一个偶然的机离开了家乡（冯光珍则不幸返回了家乡），这一走，他的一生就完全改变了。他读了大学，后来成了音乐界的专家，著述颇丰。另外，他还担任过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主任及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党委常委等官职。退休后，他将自己的一生写成《岁月断忆》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下面是书中他回忆他父亲及小时他父亲教育他的部分文字：

家父国祺，字寿章，生于1902年10月。他成人后，在州城“同聚福”当店

员。“同聚福”是一家以经营糖、油、酒、点心为主的大商号。由于父亲为人忠厚诚实、精明能干，颇得老板熊实之先生的赏识和信任，不久便升任商号的管事，负责掌管经销业务。实之先生还做媒把他的外侄女何顺贤许配给父亲。父母成亲后，母亲便从城里到九麟岭冯家操持家务，而父亲仍每日清晨远足县城做生意，傍晚又步行返家。

这期间，父亲因生财有道，生意越来越兴盛。他除了在“同聚福”供职外，还买了些田地。开办了“永顺裕”粮油商号。此外，他还购置了一些竹林柴山，先后兴办了两个造纸厂，生产土纸，除就地销售外，主要运往下川东的云阳、奉节一带。由于质量好，在市场上颇有名气。经过父亲多年的发奋图强，很快便把祖父衰败的家境又逐渐发展了起来。

我童年时，父亲以客家人（冯家祖籍是广东兴宁县）勤劳刻苦的传统对我们管教甚严。他将亲笔书写的清初名儒朱柏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的字幅悬挂在堂屋中央，要求我们从小就养成早起勤奋的习惯。

父亲经商在州城，来回要走十余里路，经常早出晚归。但每日黎明即挨房呼唤我们兄弟起床，赧即盥洗和洒扫庭院。之后，便教我们到书房研墨习字，要求我们在书案前端坐如钟，专心致志地临帖一笔一划地书写。

记得在我刚醒事之龄时，便临摹《柳公权书玄秘塔》的字帖。那时我尚未发蒙上学，并不认得几个字，更不理解柳字帖的字文“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的意思，但在父亲的教导下，还是恭恭敬敬地依样画葫芦。

经过几年的苦练，当我的习字有些起色，能把柳字的神韵模仿得大致相像的时候，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写字像一个人的外表，古人说过“字如其人”的话，每个人写字的体态形状就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行来，人家看了你写的字，即便是未见其人，也能对你的品行知其一二。

他还进一步指点说，你今后要练习写几个很难写好的字：如“凰、鼎”。接着就悬笔为我们一笔一画地示范这几个字。从此，我在临写柳字帖前，总要按父亲的示范，练习连秀才都难得写好的这几个字。确实如父亲所说，这几个字真难写好，不仅是每个字的笔划繁多，尤其是字的间架框格也不均匀对称，很难掌握好要领，写出来总是不如意。父亲也以此告诫说，就像做人一样，字要写到家不是那么撇脱（指“容易”）的，只有扎实地练，日久才能见真功夫！他还经常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教导我们，促使我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做出成绩来。



1958年于四川音乐学院

冯光钰 1958年于四川音乐学院

这是商纣的炮烙之刑啊

讲述人：周康杰

原忠县商业局职工学校教师



土改时我还是个四岁的小孩子，好多事情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亲眼看到的我母亲和祖母受难的情形却记得非常清楚。那些场面太可怕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

我家祖居忠县甘井乡芭蕉园，那是在离城二十多里的一个山村。由于家族的繁衍，老家日益拥挤，我父亲就进城安了家，但是我们仍然经常回老家去，因为老祖母还在那里。

我母亲梁万英是城里人，1920年生，毕业于县女子中学，她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喜欢打篮球，现在我手里还保存有她1937年在女中篮球场上的照片，从照片看，那时的母亲青春焕发。

父亲不幸患了直肠癌，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家耗尽了所有的积蓄，最后卖完了田产，但是父亲还是在1948年去世了。那时母亲只有28岁，她拒绝任何人给她介绍对象，立志终身不改嫁，努力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责任，赡养祖母，抚养年幼的姐姐和我。我母亲如今还健在，已经86岁了，跟着姐姐住在云南。

土改开始后，甘井芭蕉村姓黎的村长，叫黎帮X（音），带领民兵持枪进城来找到我母亲，说要我母亲回去分田地分财产。我外婆知道这是骗局，就不让母亲去。黎村长反复劝母亲回去分田地财产，我母亲都不去。黎村长见软的不行，就变了脸，说不去不行，是工作组叫的，然后不由分说把母亲和我姐弟一起押走了。

我家已经没有田产，不够地主资格，工作组说：“你们曾经享受过地主生活。”地主划不上，就划成“破产地主”，同样要我们交出金银财宝。我母亲据理力争，说她不是地主，是学生。工作组说，你虽然是学生，但是你读书的钱是剥削来的，也是地主。我母亲还是不服，民兵们就开始用毒刑了。

那一天的悲惨情形几十年来一直如同噩梦一样缠绕着我！

民兵们搬来干柴，在我家大院的石坝里烧起一堆大火。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要干

些什么，站在一旁惊恐地看着。

我母亲被推到火堆旁，民兵又一次要她交出金银财宝，我母亲还是说没有。

这时大火已经将地坝的石头烧得滚烫了。

民兵们失去了耐心，他们扑上来揪住我母亲大叫“梁万英，把裤脚挽起来！”我母亲不从，民兵们便如同虎狼般的将我母亲的裤脚往上挽，直到露出膝盖。母亲拼命挣扎，但是哪里挣得脱他们的魔爪。那几个民兵使足了劲，猛地一下将我母亲强行按跪到烧红的石板上。

只听见“哧”的一声，母亲的两只膝盖冒出阵阵青烟，一股皮肉被烧焦的臭味飘向空中。

工作组的人和民兵在一旁大喊：“梁万英，向人民请罪！交出金银财宝！”

母亲因极度疼痛发出惊人的惨叫，脸色霎时变得惨白，当场昏倒。

我当时被大伯母抱着，被眼前的惨景吓得哇哇大哭起来。一个民兵听见我的哭声，拿着枪冲过来大骂：“你这个地主崽！”边说边挥手猛抽我的耳光。我不知所措，吓得像白痴一样，哭得更厉害了。

我大伯母赶紧护住我，大喝那个民兵：“他才三四岁的娃儿，有什么罪，共产党也不能打三四岁的娃儿，你这是在犯法！”

（周康杰讲至此泪水盈眶）

那个民兵还举着枪大骂，一个工作组的人见状把他叫住下了枪。

民兵们看见我母亲昏倒了，就去地坝边的水田里提水来往我母亲身上猛泼，母亲居然没有一点反应，就像死去了一样。泼了好久母亲才渐渐苏醒过来，这时我看见母亲双膝的皮肉已经烧掉，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这是商纣的炮烙之刑啊！母亲遭毒刑，让年幼的儿子在旁边看，看母亲的皮肉被火石烧焦，冒出青烟，发出焦臭，世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你有没有闻过人肉被烧焦时发出的气味？而且是你亲生



周康杰母亲梁万英（右）1937年

母亲的肉！

我大伯母之所以敢于挺身而出保护我，是因为她是贫下中农，没人敢把她怎么样。大伯母才二十多岁就和我大伯父离了婚，所以没划成地主。我大伯父叫周成大，又叫周雨寰，年轻时先是读黄埔军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十年学军事，与蒋纬国是同学，1949年跟蒋介石去了台湾，任海军陆战司令，很多军事书上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好在大伯父早年和大伯妈离了婚，不然大伯妈就是地主，在劫难逃了。

注：周雨寰（1912年—1955年），1912年生于四川省忠县（今重庆市忠县），193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八期工兵科，1936年入德国陆军军官学校受训。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第二任司令（时任少将），身后葬于台湾高雄澄清湖（旧称“大贝湖”）风景区内，“国军忠灵塔”处有周将军墓。——维基百科

大伯母将我母亲抬回家去，她天天去山上挖草药捣碎给我母亲敷伤口。很长时间内我母亲都躺在床上呻吟，不能下床，稍微动一下就钻心的痛。五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母亲的双膝依然是两个大伤疤，下次我去云南一定要去把她老人家的伤疤用相机照下来。

我老祖母也难逃厄运，那时她已经年过花甲，满头白发衰老不堪。她是出身在清代的人，从小缠脚，脚只有三寸长，我们那里叫“尖尖脚”，走路很费力。对她这样一个老人，土改的民兵们也不放过，无数次的把她吊起来毒打，打得遍体鳞伤，还用枪逼着她在寒冬的夜里去冬水田里“摸夜螺蛳”。摸夜螺蛳只是个名目，目的是要她到冰冷的水田里去受辱挨冻。我看见祖母下身穿一条短裤，上身穿个布褂子，赤着腿下田。田里结了一层薄冰，一踩就破了，祖母站不稳，倒在水田里，民兵说她装疯，拖起来继续摸，又倒下去，又拖起来，反复折磨。

祖母被打伤的伤口开始化脓，大伯母去山上挖草药给我祖母敷伤口。但是祖母年事已高，恢复起来很难，而且还得继续挨斗。这样，伤口就一天天溃烂了。随着天气转热，伤口往外流出黄水来，最后，溃烂的伤口里长满了蛆，苍蝇、虫子、蚂蚁到处爬，老远就闻得到一股恶臭。祖母渐渐不行了，人们把她抬到堂屋里去停放——等死——按规矩应该是死后才可以停放在堂屋里。那一天，我去堂屋看祖母，祖母一边呻吟一边对我说：“舀碗水来，我要喝水。”我舀了水送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近距离看祖母，我看见她手臂上的伤口里流着脓水，一大堆蛆在伤口里乱爬，她脸上凝固着一种永远化不开的痛苦，用极其忧伤的眼神看着我，让我感到害怕。

没多久，老祖母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

我母亲草草埋葬了祖母后，带着我和姐姐艰难度日，后来又有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婉言拒绝，其实她当时还很年轻。

我的外公是一个秀才，字写得相当好，他帮人写帐本。外公为人和善，口碑很好，人称他为“梁善人”。外公没住在乡下，也没有买过田土，他的那点田地是祖

上传下来的。祖先做盐生意，挣了点钱，那个时代认为买点田土稳当些，有碗饭吃。当时买卖土地是合法的，国民政府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契约都是政府印制的，买卖还要给政府上税，就象现在私人可以买卖房子，并给国家上税。

但是，土改时共产党非说地主从农民手中抢夺了土地，并且残酷剥削农民。

工作组把外公评成地主，把他弄到他田土所在的李家岩去斗。工作组的人启发农民说：你们斗倒地主，地主的田地就是你们的了，还有，把地主打倒了，他们那些东西，那些家产，全部分给你们。

就是这样“启发”，农民们还是有良心，斗争会上没有人吭声。于是就发展“积极分子”——主要是些年轻人。工作组的干部对他们说：“你想要好的前途吧？那要积极斗地主呀！你要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当干部，到城里去工作，就可以跳出农门……”就用这些方法来发动斗争。

但还是困难，尤其是那些年岁大一些的农民，他们都晓得，说：“他的田土是祖上传给他的，他从来没来逼过租，人都不来。我们交租全凭良心，交多少算多少，哪年我们说天干收成不好，他就说，那就算了，不收了。还有，我们背租去，每次他都请炊事员把酒席摆起请我们吃……”

所以，搞了好一阵，还是没得人去斗。工作组的人不斗了，干脆叫年轻人上去打，结果把外公的脚打烂了。当天那个打手回家，他父母冲着他一阵痛骂：“哪个叫你去打的？！工作组？工作组哪个？！他们搞了就走了，你好孬都分不清……”

当时很多人还是讲良心，没听工作组那一套。外公被关在仓房里，佃户们烧好菜，还有砣子肉，送去给外公吃。共产党说什么“阶级压迫”、“血海深仇”，屁！

没人斗外公，外公态度又好，说：“那些田土、谷子，你们拿去就是了。”

于是外公被放了回来。

地主只要当时没被整死，以后几十年的活罪是受够了的，没完没了的批斗、改造……就说我外婆刘登芝吧。她长年累月伤心，双目失明了，但还得写“改造”报告，到派出所去交待：我这半年来的改造如何如何，等等。1969年的一天，派出所的人发现有人烧了纸（祭神），一口咬定是我外婆烧的——因为只有阶级敌人才搞“封建迷信活动”，而她是地主婆，典型的“阶级敌人”。

外婆申辩：我眼睛都瞎了，走路都看不见，哪里能外出烧纸嘛。派出所不由分说，认定是她，又要抓来斗。外婆没法，只得说是她烧的，并答应写认罪书。外婆请了人来帮她写。正在这时，真正烧纸的人站出来承认了。他们是弹棉花的张文强和做鞋底吴贤庆夫妇，他们的娃儿病了，就在夜里烧了点纸符敬神。他俩到派出所说明情况，并且叫我外婆不用写了。嘿，你看我外婆怎么说，她骇得颤颤惊惊的，说：“开头我不承认，后来派出所教育我，赵同志批评得对，我改造不好，我承认了，我要认罪，我要写……”

你看看，我外婆被共产党“改造”成什么样子了！

至于土改时整地主的刑罚，那多得很。比如用篾条编个直径两尺多的篾箕，把几十斤黄豆叶压在里面，中间挖个洞，然后逼问地主：“你还有哪些财产？！”“没得了。”“没得了？不老实！”于是把压满黄豆叶的篾箕从头上罩下去。人出不了气，双脚直抖，不一会就断气了。

收拾女的，则把裤子扎紧，将蛇或黄鳝放进去，蛇和黄鳝都是钻洞的，从阴道钻进去，子宫一咬破大出血人就没命了。

总之，刑罚多，都是那个时候斗地主时发明的，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也没在书上见过。

这些事给你们说了也没有用，出不了炉（发表不了），只是吹一吹，不吐不快。

时采访：2006年3月18日

地点：重庆龙溪镇

采访后记

周康杰先生的耳朵有些聋，说话的声音特别大，讲到激昂之处仿佛是在怒吼。

对于那些发生在他四岁时的事情，周康杰先生一直记忆犹新。

周康杰先生从四岁起就被人叫“地主崽”并被人猛抽耳光，“地主崽”这一称号伴随了他很多年，直到他进入中年后，妻子和他吵架，居然还骂他是“地主崽”，他怒从心头起，给了妻子一耳光。

当周康杰先生拿出他母亲读中学时在篮球场上的照片时，表情十分虔诚，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照片，说：“这就是我母亲。”他说，母亲住在云南姐姐那里，不想回到老家来，因为这里是她的伤心之地。

周康杰先生今年60岁，但看上去面容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衰老，牙齿脱落，头发斑白，耳朵失聪，这也许与他在很多年里过着“地主崽”的生活有关吧。



激昂之处仿佛是在怒吼

补记：

2006年4月26日，我专程赶到云南玉溪，想采访周康杰86岁的母亲，并

摄下她膝盖上的伤痕。

她最初答应了，但是，当我到达昆明时，周康杰来电叫我取消采访，原因是她的女儿女婿得知此事后担心害怕，他们还责怪周康杰，不该介绍我去给他们“惹麻烦”。

我实在不甘心——眼下还活着的“老地主”已寥若晨星，况且还是身受酷刑、九死一生的地主。还有，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只剩下几小时的长途汽车。

我抱着“故乡来客，或许能打动他们”的侥幸心理叩响了梁万英女儿的家门。

梁万英打开门，我刚开口说我是重庆来的，她立马就关门。我慌忙伸过脚抵住门，并赶紧掏出她儿子的照片，说把照片给她后说几句话就走。

我挤进门（她老了，没我力气大），很庆幸她女儿女婿不在家，但是，梁万英象防贼一样防着我。

我很狼狈地立在那儿，连声说：“梁妈妈，我不是来给你们惹麻烦的，也不会打扰你们现在的安宁生活，作为家乡人，摆几句龙门阵……”

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解放后日子过得很好。”

说完她不再理我，自个去吃饭。

我不死心，想法套近乎，但毫无回应。最后她说了一句：“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意见。”

我长叹一声，想到她女儿女婿回来后可能更加难堪，只得走了。

她女儿女婿是“体制内”的退休干部，玉溪又是云南经济发达的富饶之地，因此，眼下她们一家日子过得不错。

想到梁万英遭受的不幸，觉得她更应当在晚年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她和她女儿渴望这种安宁不被打扰也十分正常。他们同我都清楚，共产党最怕也最恨有人去了解历史真相，对“企图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手软。

我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很理解他们，虽然觉得很遗憾。

补记：周康杰先生于2015年去世。



梁万英埋头吃饭，不愿交谈
(2006年4月)

从没讲过的家史

讲述人：钟定云（莫益成）
莫益庭 严学珍



钟定云：

我本姓莫，叫莫益成，家住忠县城内的莫家院子，父亲莫树堂，母亲陈英。父亲同母亲结婚前曾经有过一次婚姻，那位母亲生下一个女儿——我的大姐莫益英后就去世了。我母亲生了二子一女，哥哥莫益庭，我，还有妹妹莫益华。土改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哥哥 18 岁，在兴隆乡小学教书，我 8 岁，妹妹 4 岁。

这个家史我不敢讲，讲起来痛苦得很。

土改一开始我家就主动把财产全部交了，父亲因此还被评为开明地主。但是后来还是整，总说我们还有财产没交，还要我们交，我们拿什么来交呢？那时候的阵仗凶（方言，即场面吓人），天天都在吊打人，好多人被整死了。父亲非常害怕，一天，他听说民兵要来抓他，慌慌张张地把一个皮包交给我，要我放好，然后他就出门去了，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几个舅舅闻讯四处寻找，最后在长江边上找到他的一双鞋子，他投河自尽了。

我打开父亲留下的皮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字据，那时我才几岁，完全不明白父亲这个皮包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皮包后来也被民兵拿走了。

父亲死后他们就逼我母亲交金银财宝，把我母亲抓到长凶河（今忠州镇长河村）斑竹林关起来，用各种刑罚折磨。我母亲受的刑就多啊，反复捆绑吊打，骨头都烂出来露在外头。吊鸭儿凫水，吊起来身上还要压一个磨礅。把两个拇指用

麻绳捆在一起，吊起打，全身都吊在两个指头上，母亲的手指骨就是这样吊断的，硬是把骨头活生生吊落了一截！他们还用麻绳把我母亲的两个乳头捆起来吊，全身都吊在两个乳头上（陈英的妹妹后来看到，陈英的乳头被扯掉）……还用猪脊



残存的莫家院子

毛刺进我母亲的乳头里，乳头全是血。还“烧油灯花”，把手烧糊了，还有“吃砸酒”（把两只拇指捆在木头上，再在木头中间插木楔子）……

母亲在长凶河受不了刑，哪个受得了嘛？只得说，金银财宝在家里，他们把母亲押回家来寻找。就这样，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母亲。我看到她已经完全没有人形了，手脚都是烂的，骨头露在外面（钟定云掩面流泪）。

我家已经像水洗了一样，什么财产都没有了，民兵们拿不到东西，就把我母亲又押到了长凶河，这一去，我就再也没见过母亲了。

没多久我母亲就被折磨死了，是哥哥去收的尸。

那段家史我不愿对任何人讲

莫益庭：

那段家史多年来我不愿对任何人讲。

解放的时候我是忠县师范学校的学生，由于乡下差教师，我只接受了短期的师资培训就到忠县官坝区兴隆完小当了老师。1951年正月初一，正是过年的时候，忽然来了几个民兵，拿着大刀和红缨枪走进兴隆完小，我远远看到就知道不好了，果然，他们冲进来就抓人。那时抓人很随便，不要任何手续。他们把我抓到忠县东云乡长凶河。在那里我见到了我母亲，她像是痴呆了，见到我竟没有任何反应，好象什么都不晓得了，她的面色就像是坟墓里出来的死人，只有眼睛动一下才表示她还活着。我看见她手脚都是烂的，左手的大拇指短了一节，是被吊断了的。



“妈妈左手指被吊断了”

（莫益庭伸出左手大拇指比示着，声音忽然哽咽）。

母亲睡在一个破草房里，床是廉子棍（竹棍）铺的，只有一床又脏又烂的铺盖。我陪着母亲住了几天。她悄悄撩开衣服给我看，两个乳房血迹斑斑，她说是被猪脊毛刺的，还被麻绳捆过，她又指着下身说，全被强盗们抓烂了。

正月初五那天，母亲死了。当时是下半夜，我听见她喉咙里呼噜呼噜响，像有痰，我问她：“妈妈，你不好吗？（方言：身体不适）”。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摇了摇头。她握住我的手，又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再次指了指自己的胸部和下身，这时她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是我知道她要对我说什么。过了一会我再喊她，怎么

没有声音了？我伸手一摸，妈妈已经断气了。

第二天，我向民兵报告母亲已经死了，怎么办？民兵说，你背去埋了就是。那天下好大的雨哟，我用一个小背篋背着母亲去县城签子门埋，由于雨大路滑，母亲好几次从背篋上摔了下来，我流着泪又把母亲背起来，冒着雨继续走。两个民兵怕我跑了，一直拿枪押着我。



莫益庭老泪纵横

在签子门外，我挖了一个坑，用一床破席子把母亲埋葬了（莫益庭老泪纵横）。

母亲是民国元年（1911年）生的，刚活了40岁。

母亲毕业于县女子中学，娘家是忠县有名的书香世家，她为人淳朴正直。我们是大家庭，我出生时家里有祖祖、爷爷、奶奶、姑姑、叔爷、婶娘、侄儿、侄女等，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母亲从没和谁斗过气吵过架，也从不搬弄是非，遇到小事就忍了，大事就交给我父亲，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辈子勤勤恳恳，很是贤惠。解放后她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毛主席是很喜欢年轻人的， you 会有前途的。”我现在还记得。

我父亲的文化没母亲高，他是个生意人，从当学徒一步步走出来。我家在解放前被强盗偷过，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但是对外还是硬撑起，不敢说家里没钱。其实我们家没有多少田地，主要是靠父亲做小生意，算不上什么地主，土改时我们家仅有的钱财都交完了，还说没交，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和舅舅天天被弄到城关镇去干扫大街，埋死人之类的活。父亲走投无路寻了短见，他出走那天是1950年农历8月13号，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因为他生日是8月17日，离他的生日仅有四天。他比母亲大三岁。

我埋葬了母亲后，那两个民兵又把我押到了长凶河，关在母亲住过的破草房里，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要我说出家里有多少好多钱好多好多金银，放在什么地方。我家里哪里还有什么金银财宝，再说就是真有，我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啊。

那天晚上，他们开大会斗争我，院坝里的马灯很昏暗，可以说没有什么光亮，但是人很多，有的呼口号，有的喊打，有的叫把他升（即吊）起来。结果真的把我吊起来了，他们捆着我的脚趾头和手指头，一下吊到了空中，那个钻心的痛啊，我身子单薄，受不了，痛得惨叫。周围的人都在高喊口号，我记不清楚过了多久，放下地来我就昏死了，爬不起来。那个吊法厉害得很！

我的手指头脚趾头都吊烂了，左脚趾头吊残了，留下终生残疾。我脱给你们看……（莫益庭脱掉鞋袜，56年前的伤痕清晰可见）。

他们把我关到正月二十几号，看我的确拿不出金银财宝，才把我放了。我回到家中，家里已经不像个家了，父母都没有了，弟弟妹妹也不知去向，家里一贫

如洗，留给我们的是厕所旁的一间很小的房子，要垮要垮的。我无法生活，也无颜见亲戚，只有出去讨饭，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去了望水乡下的么姨家。在么姨家住了几个月，觉得也不是办法，就到忠县师范学校去要求复读，因为我在忠师尚未毕业。我向学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学校竟然答应了。那时读师范不要钱的，我的生活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三年后毕业，我被分到云阳，从此离开了故乡。我的弟弟妹妹是否还活着，我都不知道。

那一天，我的姨妈

严学珍（忠县望水乡农民）

陈英是我妈妈的亲姐姐，我的姨妈。土改时有一天，民兵把她押到我们家来，他们说，陈英交代，金银财宝放在我们家里。那些民兵（都是当地的农民），在我们家翻箱倒柜，连床下都挖了这么深。哪儿有什么金银？

我妈说：“姐姐，你怎么说金银藏在我这里呢？”姨妈哭着说：“妹妹，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想见你最后一面，只有这样我才能见你。”

民兵没有找到金银，他们不敢打我妈，因为我妈是军属，我哥哥严学智刚当兵去抗美援朝了。于是他们就把姨妈往死里打。我亲眼看到，她已经走不走了，是拖起走，拖到地坝跪起打，那些农民打人气力好大。那一整夜姨妈都跪在地坝挨斗打，要她交金银。他们倒桐油烧她的手，叫“烧灯火”，在手心这几点火烧，手这些地方都烧烂了。我妈说，姨妈的奶子头都被吊扯落了，她后来向我的几个舅舅说起就哭。

姨妈整死后民兵还把她儿子（莫益庭）抓到长凶河逼金银。莫益庭也被关押了几个月，他脚这些地方都是被桐油烧烂了的，他后来在我家休养了几个月才走。



我在钟家隐姓埋名几十年

钟定云：

父母死后，哥哥下落不明，家里只剩下8岁的我和4岁的妹妹。留给我们的那间小破房子里连床都没有，我和妹妹晚上就靠在墙角过夜，冷得牙齿打颤。妹妹虽然小，可是很懂事，我把衣服脱给她，她又拿来盖在我身上。白天我们兄妹就出去讨饭，出去讨饭更苦，狗咬，蚊子咬，心肠好的给一点饭，心肠不好的拿棍子打我们。寒冬腊月打霜下雪，我和妹妹只有一身单衣服，又破又烂，光着脚，

又冷又饿，那个日子无法形容。而且我们怕得很，话都不敢说。讨到一点饭，我妹妹都让给我吃，哪怕是一点野菜，也让我吃，她就有这么好的心。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在街上见到我们两兄妹，不敢接济，怕受连累，那些日子硬是不敢回想，这么多年来我也不敢对人讲。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我和妹妹不是饿死就是冻死。那天，我们在河坝铁匠炉讨饭，遇到一个中年女人，她仔细看了我妹妹很久，说愿意收养她。妹妹却舍不得我，不愿去。我说：“妹妹，你去吧，没办法，要生活，一点吃的都没有，活活饿死呀？”妹妹哭着跟那个女人走了，一路走一路回头看我，走多远都还望着我……（钟定云说不下去，泪水涌上来）走多远都还望着我……

那个女人是往长江上游方向走的，她姓什么，住哪里，我都不知道。从那天分手后，我再也没见过妹妹了，后来找也找不到了。我估计她活不出来，妹妹生下来就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她从城里被带到乡下去，做不来活路（农活），她被带走时只有四岁多，她要嘛是受虐待而死，要嘛是饿死，要嘛是病死，只可能是这三种。妹妹肯定是死了，我每年七月十五和正月初一都要为妹妹烧纸，我忘不了她。

妹妹走后，我们这个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社会压力大，我怕得不得了，话都不敢说也不敢问，怕别人晓得我是地主子女。后来，一个挑军粮进城的丰都县董家场的农民把我带走了，他把我交给一个姓胡的铁匠喂养，因为铁匠没有儿子。我是城里的孩子，做不来农活，连放牛都不会，姓胡的铁匠就又把转给了忠县凌云乡岩坪村钟家湾一个姓钟的农民，我就是这时改名叫钟定云的。钟家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在钟家隐姓埋名几十年，闭口不提以前的任何事情，钟家的养父去年去世，活了90多岁，老人到死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不敢讲，怕暴露我地主子女的身份，那真的是恐怖。你们年轻不晓得哟，地主子女在农村，一句话不对头，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打，拉去斗，所以我什么话都不敢说，心里是整怕了的。

养父挑米进城，曾经把我带进城去，我走到下南门，就想起我的家，从下南门往那条熟悉的巷子上去，就是我外婆家的“春华秋实”大院子，再往上，就是我们莫家院子，只要从下南门路过，我就禁不住站着往巷子上面望，但是我不敢说，那种心情啊。

养父很穷，讲阶级，脾气也暴，毕竟我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还是让我上了学，



这是一张在网络上感动了无数人的照片。六十多年前，它真实地发生在钟定云兄妹身上。

我很感激他。1961年，我进了三汇中学，有一天，我在学校里看到一个人好面熟，经过我悄悄观察，断定她就是我离散十年的姐姐莫益英，当时我好激动，但是我马上就害怕起来，我不敢和姐姐相认，我怕暴露了自己的地主子女身份，我恐惧得很。

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嫁了，姐夫叫苟远达，当时是三汇中学的老师，姐姐跟着住在学校里。姐夫在众多学生中发现了我，他回家对姐姐说，有个学生好像莫益庭的样子，连动作神态都像得很，但是又姓钟，不知是怎么回事。姐姐听说后也暗暗来观察过我，也不敢贸然相认。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有勇气认我姐姐。十年了，我没有亲人的任何消息，忽然见到姐姐，而且在同一个学校里，是多么欢喜啊，可是我却将欢喜压在心里，硬是吓成那个样子，怕！这种心情现在哪个还能理解？

毕业回家后我结了婚，但是心里还是经常想着姐姐。我将这件事悄悄告诉了我的老婆，她对我么舅子说了，么舅子来劝我，要我去相认，我还是不敢，怕呀。

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三汇中学认姐姐了，我们姐弟哭得说不出话来。姐姐这时才知道小妹妹在十多年前就没有下落了。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姐姐告诉我，哥哥还活着，在云阳县教书。

我马上给哥哥去信，很快就得到了哥哥的回信，我好高兴。我又得知，外婆家还有人，么舅还在。

我借口进城卖姜，去城里找到了么舅，么舅喊了我一声“莫二”（小时人们都叫我莫二），就眼泪直流。通过么舅我又找到了么姨家的人。就这样慢慢找到了许多亲戚。

这一切我都不敢让钟家知道，否则我贫下中农的身份就保不住了。

我恨不得马上到云阳去找哥哥。

我和老婆商量后，想法撒了个谎，就进城赶轮船到了云阳。哥哥是在离城很远的梅峰小学工作，我到了云阳不知道怎么走，正当我在车站抬头看墙上的地图时，旁边有个人说他也是往那里走，我就跟着他走，路上我把随身带的饼子给了他两个，他很高兴。记得爬上一个垭口还走了好久，在中午12点的时候才到了梅峰小学。哥哥见到我已经不认识了，分别时我才八岁呀。哥哥看见我提着一罐忠县豆腐乳，猜出我是忠县来的，仔细看，样子和他相像。我们兄弟相见，那才是又悲又喜，双双都哭了起来。

莫益庭：

1963年，我和弟弟联系上了，我写信叫他来，弟弟最初还不敢，因为那是毛泽东时代，讲阶级斗争。后来他悄悄来了，当时我在梅峰小学教书，我们两兄弟在小学见面，不敢在学校说话，那个时候不敢公开说家里的事，我们躲到后面

的山坡上抱头痛哭。我说，我现在多一个亲人了，但是我没法帮助他，我一月只有30多元钱，还要供养妻子的家，我只得把我买的公债券给了弟弟。第二天我请假，带弟弟到团坝乡去见我家人，那时没车，要走一天路，住一夜，又赶回梅峰小学。弟弟不敢久留，我们匆匆就分手了。

以前那些事难得说，刚解放时，忠县有名的大老板杨星五还举个旗旗去欢呼游行，说现在太平盛世来了，结果后来饭都不给他吃，还是把他整死了。忠县整死的好多呀！

我本来写了点东西，不敢邮寄，怕邮局检查，我是怕呀，怕弄得不好，到这把年龄把饭碗整脱了。

采访时间：2006年5月5日 / 9月23日 / 12月3日
地 点：忠县拔山镇 / 忠县吊钟坝 / 云阳县大雁路

采访后记

这篇文字采访的对象是三个，时间前后跨越三个月，空间跨越数百里，不过，讲述的却是同一个悲剧。

钟定云(莫益成)住在钟家湾一个很偏僻的山林中，一路上荆棘丛生。到了钟家湾，他却不在家，几经周折，找到他时已经是下午在10多公里外的地方。

从8岁抱养到乡下后，钟定云已经在农村度过了50多年，他不善言辞，十分悲惨和感人的往事他简简单单几句话就交待了，但是，他讲到他同妹妹分别时流出的那一行老泪，却让人刻骨铭心。

钟定云说，他在云阳的哥哥更清楚母亲惨死的经过，于是，两个月后我们来到云阳县。

老人说到当年的经历，老泪纵横，但一看到照相机，他的面部神经忽然紧张——他害怕。

“我是怕呀，弄得不好，到这把年龄把饭碗整脱了。”



钟定云家

补记：钟定云已去世，时间不详。朋友陈先生为此篇采访出了不少力。

父亲还是被杀了

讲述人：谢启宣

1934 年生



我父亲谢时宽，又叫谢辉，毕业于杨森部队的军校，1949年前他是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也当权，管好几个区。在我们谢家湾，他买得有100多亩田土，因此也是地主。

共产党快打来时，他的一个亲戚专门回来叫他走，那个亲戚是国民党财政部的副部长，在汉口同董必武有关系。父亲不走，他舍不得这个地方，他说，中国这么多人都能活，哈哈，他就是这样遭了的。共产党的部队来之前，他还带人去接——把共产党的部队接到万源来。

正因为如此，头两年没整他，土改时他回来做庄稼。当时我初中快毕业了，还考起了土改工作组，我有文化，他们需要人搞查田评户。父亲不要我去，他说最好不要跳到政治舞台上，政治上双方争斗，总有一方对你不满，于是我就没去。农民对他很好，因为他一直做善事，也肯帮助人，最初杀好几批人没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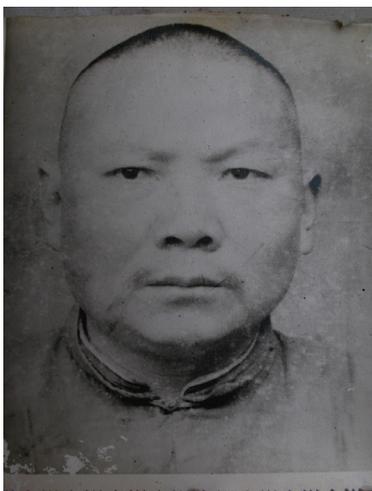
土改搞得凶，有个叫冯立朝（音）的大地主被骇死了，我堂哥谢启善自杀了，有一个姓熊的女地主被抓去斗，冬天往她身上泼水……



谢启宣（50年代）

没收地主“五大财产”也整得彻底，什么都收缴：房屋、土地、家俱、衣物、铺盖、农具……一个铜茶壶也要拿走，连饭碗都收缴，全家按人头一个人只留一个碗。那个工作组是个文人，他叫我帮他写土地证，他给我们家留得还算可以，他见我家有一套《古文观止》（那是我父亲的），还有《三国演义》，他没要《三国演义》，把《古文观止》拿走了。

我父亲后来还是被杀了，那是1952年2月，在万源城里打的。我那时已经17岁了，亲眼见到，那一批打了十多个，吓死人了（头一年腊月还打了八个）。打



谢时宽

我父亲安排在凌晨，我去收的尸，当时天还没亮。为啥在那个时候？他们怕农民去保他。父亲为人很好，不仅没得人斗他，他被关押后，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条沟里的农民，纷纷都要去保他。这些都是贫苦农民，当局不好说什么，于是就在夜里下了手。

那时打（杀）人随便得很，吼你怎样就怎样，不由你分说，当了点权的都杀，一个保长都要枪毙，清匪反霸打了那么多，土改又打了那么多。农村里恶一点的，推出去就打了，群众一吼，喊杀就杀。当然，群众要喊保（即“刀下留人”），也可能保下来。我有个老师，已经插了标牌，推进了杀场，群众坚决要保他，于是就把他推到一边，说，莫忙打，调查一下再打，先判他一个缓期执行，打下一个。我老师运气好，这一“调查”，就遇到上面政策变化，上面觉得人杀多了，要宽松一下，老师因此捡回一条命。

那个年代，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要杀人，莫得办法。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1日

地点：四川万源县太平镇水窝子村

采访后记

曾听一位同事提起，说在她的老家有一个地主，具体情况不详。想到还活着的地主已经极少，于是我专程去了四川万源县。

到县城后，搭乘一辆摩托车，沿一条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颠颠簸簸来到了大巴山里的谢家湾。

可惜，该“地主”已不是真资格的地主，而是地主的后代了。更可惜的是，谢“地主”不仅耳朵聋了，而且对那段苦难也淡忘了。说起他父亲的冤死，他看不出一点痛苦，“哈哈”地笑几声，说：“那个年代，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要杀人，



初中时的谢启宣（前排左二）

莫得办法。”

两个多小时采访，谢“地主”要嘛听不见，要嘛答非所问，要嘛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大巴山的寒风，嗒嗒作声，土屋里的热炉，温暖怡人。过去的，早已过去，眼下的日子，还要热乎乎地过。听不见也好，淡忘了更佳。庆幸的是他居然还保存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在经历了那么多残酷的岁月，一个“阶级敌人”的照片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在我对土改的采访中还很少遇到。



谢启宣的土房



河南省某县桑庄区桑庄乡农民分到了一百零五头牛。选自“中南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